

第一章 緒論

※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

----前德國總統 理察·魏茲賽克*

第一節 研究緣起、文獻回顧、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緣起

人類自從有歷史以來已歷經數千年，但在這數千年之中大半都是處在戰爭恐懼、極權體制之中。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以及 1945 年聯合國提出的〈人權宣言〉，所強調人類應享有居家無慮、言論自由、社會正義等觀點，也是這一、兩世紀以來才有的事。到今天為止，追求達到公義的社會，都還是人們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台灣自從西元 1543 年，因葡萄牙人航海發現後開始進入世界的歷史，其後經歷了荷西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國府時期，其實不難發現上述這些時期的統治者大半抱持以殖民統治的方式在治理台灣，也因此台灣長久以來主體性一直無法被建構、彰顯出來。既然抱持著殖民統治的方式在治理台灣，當權者對於人民實施威權式的管理，不可能過度開明以及給予太多的權力，否則「養老鼠，咬布袋」，將貽後患。因此以往的評論家對於

* 本句話摘錄自周全譯 (Scholl, I. A. 著)，《白玫瑰：一九四三》(Die Weisse Rose) (台北：左岸，2003)，書封底。

台灣歷史常描述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認為台灣人民風強悍、不可理喻，殊不知在執政者這種淫威的統治，人民又無抒發的管道之下，老百姓的生活困苦最終導致的結局往往是官逼民反，人民只好「竹竿接菜刀」與上位者搏命。

這終究是需要有勇氣的！畢竟往往處在不公不義的環境時，一般人常常還是選擇息事寧人，也不想無端惹禍上身。但總還是有人會站出來打抱不平、伸張正義。雖然有些人有勇無謀、暴虎馮河，不值得效法；¹也有人最後鬱鬱寡歡不得志，含恨提早歸西；²或是做個不容當權者所討喜的知識份子；³還有為了追求理想而捨身取義的。⁴於是當我們今日處在言論自由的台灣，擁有這樣一個民主、開放社會的時候，實在不應該忘記這些前人「拋頭顱、灑熱血」，為爭取一個公義社會所做的犧牲奉獻。而以上述後三者的行為典範作為「知識份子」的判準，相信一點也不為過吧！

本研究即立基於上述所討論到「知識份子」的基準之下，檢視台灣近代的學生運動。學生，從小即被稱作「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社會的棟樑」、「知識份子」；學生除了被培養成具備生活所需的知識、良好的品行道德之外，還應加上對社會關懷、批判的能力。以大學生為例，一般人所說的必修三大學分：課業、愛情、社團，但如此似乎太過膚淺，應再加上培養大學生具有對社會關懷的熱忱、對不公不義的狀況提出批判的精神、與理想熱情的追求才是。古人也曾云：「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因此要身為一位知識份子，不能老是守在學術的象牙塔內，對

¹ 以日治時期西來庵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或噍吧哖事件）為例，余清芳等人想要藉由復仇或迷信召喚烏合之眾打倒日本政府，但毫無長遠規劃，如此結果終究造成悲劇收場罷了！而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中也談到從 1907 年（明治 40 年）北埔事件到 1915 年（大正 4 年）西來庵事件的武裝運動蜂起，多屬民眾的盲目行動。詳見王詩琅譯註，《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 1 冊：文化運動》（台北：稻鄉，1988），頁 4。

² 例如蔣渭水 42 歲即英年早逝。他曾經在《台灣民報》138 號（1927.1.2）提出台灣民族運動的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無奈最後台灣文化協會仍在諸多因素之下宣告分裂。

³ 例如台灣菁英人士中第一位教育博士林茂生於二二八事件中失蹤，屍體至今仍未尋獲。

⁴ 鄭南榕當年為了追求人民應有言論自由，爾後執政當局以涉嫌叛亂為由要逮捕他時，他宣示「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之後自焚而死。詳見江瑞添，〈那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專訪邱義仁談鄭南榕的精神境界〉，收於自由時代周刊編，《焚而不燬·台灣魂：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紀念集》（台北：自由時代周刊，1989），頁 90，未出版。

自己的研究成果、作品自得其樂、洋洋得意，應走入人群去關懷整個社會才是。林玉体曾言：

「知識份子」(intelligentia or intellectual) 這個名詞在社會學上有其嚴謹的定義，但不外乎要滿足兩項條件，一是要具備「冷靜的腦」(calm brain)，以便作分析批判之用。……一是「火熱的心」(moral passion)，也就是說，路見不平，必有挺身而出的激動。……這兩項條件兼備，才夠資格稱為「知識份子」。⁵

楊國樞也認為知識份子需符合下列八個條件：⁶

- 一、要有豐富的知識見識。這一點是最基本的，是做一個知識份子的先決條件。
- 二、要有崇高的無私理想。要有一點兒理想主義，甚至一點兒使命感。
- 三、要有強烈的獨立精神。不盲目或是基於個人的利益去贊成或反對什麼。這種獨立精神並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總是站在一個對立的立場。基於自己的判斷、理論或看法，認為當道者、政府或所談論的對象是對的，照樣可以站在贊成它的一邊。獨立精神並不是否定精神。
- 四、要有旺盛的批判精神。不老是說好話，具有批判的傾向，能看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甚至有「吹毛求疵」的能力。當然吹求的不盡是小疵，而是大處著眼的問題。
- 五、要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否則，只是叫叫口號，講不出道理來，就會缺乏說服力。
- 六、要能真正的志〔智〕慮精純。目標要正當，意圖要純潔，心思要真誠。
- 七、要有足夠的社會關懷。意即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
- 八、要有堅韌的抗壓能力。身心皆有足夠的強度與韌性，能夠忍受或抗拒外界的不當壓力或誘惑。

西方學者 E. W. Said 在《知識份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⁵ 林玉体，〈序〉，收於林逢慶編，《知識份子與反對運動》(台北：前衛，1993)，頁 3-4。

⁶ 楊國樞，〈台灣知識份子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代序〉，收於中國論壇編委會編，《知識份子與台灣發展》(台北：聯經，1989)，頁 2-3。

一書中也曾言：

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知識份子這麼做時根據的是普遍的原則：在涉及自由和正義時，全人類都有權期望從世間權勢或國家中獲得正當的行為標準；必須勇敢地指證、對抗任何有意或無意違犯這些標準的行為。⁷

至於學生所學為何？汲汲於一己私利，還是為蒼天眾生奔波勞苦？讀書人應該像范仲淹一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境界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或許太沈重了。但是「路見不平，挺身而出」，對於社會上不公不義的情況敢提出異議，而不是當「沈默的羔羊」，這應是一位知識份子所要有的表現。學生難道不應追求這種知識份子的情操嗎？⁸否則，誠如《儒林外史》中有云：「仗義泰半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讀書人只會在情場上風流倜儻，到社會上卻不敢仗義執言。果真如此的話，我們教育學生所要達成的目標，只能說是完全失敗吧！

因此學生運動指的是學生對於校園內、社會上不公不義現狀有所不滿時，所表現出的具體行動。這種「學生運動」行為也符合知識份子所應有的表現。林玉体曾對學生運動下定義，且粗步作了分類：

一般我們說的學生運動中指涉的學生，當然是指大學校園內的大學生。學生運動之所以產生，理由很簡單，大學教育主要宗旨就是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獨立判斷的能力，學生有理想熱情的追求，在求學過程中為配合其知識探求，必然會對現狀不滿，大學機構行政單位若有不當管束壓制，學生必然也會反抗，規模較大人數較多就形成所謂學生

⁷ 單德興譯 (E. W. Said 著)，《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1997)，頁 48-49。

⁸ 葉啟政將知識份子區分成批判神聖性的、冷漠神聖性的、批判世俗性的、冷漠世俗性的這四種。本論文所指學生應致力成為一位批判神聖性的知識份子才是。詳見葉啟政，〈現代工業社會中的知識份子〉，原載《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13 期 (1979)，收於葉啟政著，《社會、文化和知識份子》(台北：東大，1984)，頁 149。

運動。

依我個人在國外經驗，學生所抗議的首要對象往往是大學教師，大學生因大學教師所用的教材與教學方法產生不滿心理，而發生集體抗議行動；其次是大學行政當局，針對行政措施、教育體制、科層體系運作的缺失等提出抗議。如果前述兩層次問題都因學生運動結果而得到解決，在此情形下，學生運動可能進一步擴大其運動範圍，更具體地說，他們可能會針對整體社會問題提出批判。⁹

因此承接上述，本研究分析台灣當代學生運動目的，乃欲藉由史料的分析來檢視學生運動的發展起因、脈絡、經過、影響等，試圖從中得到教育意涵。當時的學生在面對國家強權統治、社會不公不義之時，如何表現出思考、行動，所提出來的呼籲、訴求、抗議，是否堪稱為知識份子、足以作為今日我們的表率。從史料的分析過程中，除一方面釐清當時整個社會環境背景對學運的影響之外，並進一步探討學運在當時及對後來所展現的衝擊與影響。

貳、文獻回顧

一、與台灣學運「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

最早一篇是彭琳淞《政府遷臺後臺灣學生運動變遷之探討----以四個重要因素之互動關係》，¹⁰此研究是將時間斷限分成 1949-1970、1971-1980、1981-1988.4 三個時段，探討學生運動在學生的知識份子情懷、校園控制機制運作、台灣社會變遷、國際局勢轉變四項因素的互動關係下進行。彭琳淞雖嘗試以整個社會環境與校園內控制機制的解析互動企圖來說明學運的走向，但從內容來看似乎仍較偏重在校園內機制解析來作探討，學運走向的分析反倒變得其次。

此外，彭琳淞試圖藉由丘為君所編《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以及

⁹ 從這段話可看出學生運動所表達的議題不應只是侷限在學術院牆之內而已。詳見〈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座談會〉，《中國論壇》24卷3期（1987.5.10），頁16。

¹⁰ 彭琳淞，《政府遷臺後臺灣學生運動變遷之探討----以四個重要因素之互動關係》（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1988）。

各校學運團體之地下刊物，將 1949-1988.4 所發生的學運均予以介紹，結果造成內文有零碎之感，以及較重大的事件卻隻字未提；¹¹針對一開始彭琳淞所強調先初步整理出學運發展的脈絡，在內文中似乎也無看到。

晚近則有孟繁忠《臺灣地區解嚴後學生運動之研究》，¹²其研究目的有三：一是從政治、經濟、社會、校園環境等因素，觀察台灣學生運動的形成背景；二是透過個案的比較（以野百合運動為例）、社會運動理論分析（學生運動也是社會運動中的一種），了解學生運動的形成過程、基本特徵、訴求與反對運動的關係；三是透過「大學生參與政治改革活動意見調查問卷」，分析學生個人對政府施政滿意度、學生個人特徵、學生個人政治態度（主觀意識）、學生個人社會化環境因素，這四個變項與學生運動間的關係。孟繁忠的論文，整體著重在問卷的量化數據分析上（亦即目的三），同時也沒有交代時間斷限，因此題目名為探討解嚴後台灣的學生運動，但不能算是歷史研究。

孟繁忠的研究，在討論學生運動的生成因素上，非常詳盡；該研究還分析學生運動整體發展的脈絡，但遺憾的是最後研究發現部分，卻只是輕描淡寫帶過；此外孟繁忠花了相當的篇幅在解釋其量化研究方法、步驟、過程，以及第二章學生運動相關理論的介紹，但是這些西方的理論並未與隨後的內容相契合，以致於變成各唱各的調。嚴格說來，孟繁忠的論文只能說成功處理了上述目的第三項而已。

最新一篇是徐文祥《台灣地區學生運動之研究（民國 38-83 年）》，¹³該論文是比較難以理解的一篇。以時間斷限及研究空間來說，徐文祥在第四章探討中國學生運動（從民國前回顧、1919 年的五四學運、1944 年十萬青年十萬軍到 1989 年六四天安門學運等，均發生在中國大陸），但在第五章談論 1949-1979 年戒嚴期間台灣地區學運、第七章則是分析野百合學運。但是第四章與第五、七章似乎是各吹各的調，徐文祥並未對中國大陸的學運與台灣

¹¹ 例如文中談到服裝表演會事件（頁 16）、人情味與公德心（頁 17）等，這是否為學生運動一環，實有待討論。但像 1970 年代美麗島事件之後，學生開始投入反對運動；1970 年代釣魚台事件爆發，隨後引發台大校園一連串學生抗爭事件，以及哲學系事件等，在彭琳淞的研究中並未看到，這似乎有本末倒置之感。

¹² 孟繁忠，《臺灣地區解嚴後學生運動之研究》（桃園：國立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碩士論文，1991）。

¹³ 徐文祥，《台灣地區學生運動之研究（民國 38-83 年）》（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學運間的關係作辯證，如此一來跟其題目似乎又無法產生任何關聯。在講到相關文獻與理論時，則是將孫中山自決主張與 H. Marcuse 的批判理論¹⁴放在一起來談，顯然相當突兀。¹⁵

此外徐文祥對於台灣學運的史觀似乎持較多負面的評價，例如在對聲援學運教授群的建言，寫道：

教授負有教育青年、導正青年的責任，學運發生未及時疏導、勸阻已屬不當，反而從旁聲援，介入主導，實有失師道。¹⁶

稱楊國樞、瞿海源、陳師孟、李鎮源、邱垂亮、夏鑄九、管碧玲等教授為「以衛道者姿態自居且直接投身學運活動行列。」¹⁷對於當時學運學生與民進黨合作，寫道：

周柏雅吸收的社會異議青年，個個心胸狹窄，走極端台獨路線，積極地與各校學運串聯，幕後策劃主導多次學運。¹⁸

甚至對於學運份子所給的建議竟是：

新新人類行為充滿快速感、自私心和反叛性。……。筆者願在此列舉出一些年青〔輕〕一代新新類人的行為特徵，以為大家共同省思的參考，積極地為他們的偏差行為負起教育和導正的責任。¹⁹

至於對於學運的評價，則出現如下的敘述。可知徐文祥對學運採取相當負面的觀感：

學運的部分動機是要克服社會大眾行為和他自己所持理念之間的文化

¹⁴ Marcuse 是 1960 年代影響歐美學生運動非常重要的一位學者，他在加州大學任教時，受到許多學生跟隨，其人格與思想相當受到學生敬仰；Marcuse 主張世界要進行「革命」、強調「意識解放」的重要性，因而特別看重知識份子和學生（未來的知識份子），所以大力支持「學生運動」，冀望這群人能夠改造世界。詳見徐鍵，〈學生運動的導師--馬庫色〉，收於沈清松主編，《時代心靈之鑰--當代哲學思想家》（台北：正中，1990），頁 74-93。

¹⁵ 徐文祥並沒有辯證孫中山自決主張跟學生運動間的關聯，因此閱讀到這部分會有些突兀。

¹⁶ 同註 13，頁 3。

¹⁷ 同註 13，頁 260。

¹⁸ 同註 13，頁 228。

¹⁹ 同註 13，頁 237-238。

鴻溝，以樹建自己菁英主義的地位，提高自己的文化優越性。

學運與非理性主義之間可以劃一等號，學運也具有世代性的殉難意義。

學生們開始尋找和老一代衝突的原因，他們會把所有大學內及社會上的議題加以「政治化」。

學生的角色只是暫時性的，誠如列寧所說的：「學生運動的本質蘊含了悲劇性的結局。」²⁰

透過以上三本論文的分析，可約略歸出以下幾點：

- (一) 若僅就學位論文而言，目前探討學生運動均集中在 1949 年國民政府來台到 1987 年解嚴，以及 1990 年野百合運動。但若仔細探究，日治時期的學生運動並非沒有人研究，而是多半被放在民族運動、反抗日本政府議題中探討，²¹因此不能端從關鍵字「學生運動」就判斷目前研究成果。
- (二) 台灣終戰後的學生運動，從關鍵字「學生運動」搜索到上述三筆論文之外，若是包含其他相關研究也可找到不是以學運為主題，但是有探討到學運的研究。²²
- (三) 目前一般論文及專書，在探討學運時仍以日治時期或國府時期為主，因此本論文嘗試將日治時期與國府時期連貫起來，期望更能夠探討學運的脈絡；此外，以往學運探討的對象常集中在官方發起的動員學生（例如獻機報國運動等），或無關緊要的花絮（例如

²⁰ 同註 13，頁 230-232。

²¹ 例如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臺原，1993）。此書乃作者 1985 年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台灣的民族抗日運動團體--台灣文化協會之研究（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修補而成的。書中第四章文化協會之影響，即談到青年運動、學潮。

²² 例如郭紀舟，《70 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1999）。此書乃作者 1994 年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一九七〇年代臺灣左翼啓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修改出版的。書中主題雖環繞在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運動的再現，而以夏潮雜誌為分析重點，但內文仍有相當篇幅在討論當時的外在環境，論及到釣魚台事件以及所引發的學生運動。

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等)，²³因此筆者有意把以往被忽略或輕描淡寫帶過，但事實上對於整個社會影響很大的學運事件，作為研究主題；最後，目前論文、書籍內容對於學運的研究，仍停留在敘述、考證而已，對於當時的文宣、海報、發表文章等作資料蒐集，或作口述整理等，並未從學理上來作分析。所以本論文嘗試對於台灣學運的發展脈絡作出整理以及分析，並提出個人觀點加以批判。

二、與台灣學運「間接」相關的研究成果

日治時期部分，除了上述註腳 21 林柏維的著作之外，還包含：

簡炯仁《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抗日運動--台灣民眾黨之研究》，²⁴論文重心是討論日治時期抗日陣營中，台灣民眾黨的角色地位；張正昌《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²⁵論文以林獻堂一生為論述的主軸，探討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間的關聯，以及林的歷史定位；黃樹仁《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意識型態與角色之研究（1920-1927）》，²⁶論文主要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反抗運動中，知識份子不同的抗日想法、以及為何會有這些想法，這也導致了後來抗日陣營的分裂；周婉窈《日據時代台灣設置請願運動之研究（1921-1934）》，²⁷論文重心分析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產生的原因、過程，其中一部份談到台灣本島以及海外留學生的參與其中；吳春成《日據下台灣知識份子反殖民之意識研究台灣民報--台灣民報（1920-1927）個案研究》，²⁸作者將台灣民報

²³ 這裡有個問題值得去探討的就是台灣究竟有無學生運動？林玉体認為就學生運動的自主性來看，80年代前台灣實在並無所謂的學生運動，即使有，也只能算是由官方授意發起的一種被動的集體行動，或是聯合好幾個學校一起由官方指揮行動的。若參照國外的學運來看，國外的學運發展已有一段時間，學生關心的議題從單純的校園問題大到社會、國家、世界議題，且學運有一定的規模、組織，這的確是台灣無可比擬的。林玉体，〈序〉，同註 5，頁 17。但若就廣義的學生運動定義來看，台灣學生對於社會上的議題也曾去關心、參與過，至於如何將層級從學生抗議事件、學潮提升到學生運動，則是留待大家日後所要共同努力的目標。

²⁴ 簡炯仁，《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抗日運動--台灣民眾黨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1977）。

²⁵ 張正昌，《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0）。

²⁶ 黃樹仁，《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意識型態與角色之研究（1920-192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1980）。

²⁷ 周婉窈，《日據時代台灣設置請願運動之研究（1921-193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1）。論文修改後出版：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晚報，1989）。

²⁸ 吳春成，《日據下台灣知識份子反殖民之意識研究台灣民報--台灣民報（1920-1927）個案

內容作量化分析，得出 27 個意識概念，再將 1920 年代反日運動分成 4 個定點，兩者交叉比對，觀察每個意識在各定點發展情形，以及參與者的心路歷程；戴振豐《葉榮鐘與台灣民族運動（1900-1947）》，²⁹則是與張正昌的論文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研究對象則從林獻堂換成葉榮鐘；朱珮琪《台灣日治時期菁英教育的搖籃--以台中一中為例》，³⁰探討台灣第一所專供台人子弟就讀的中學校，台中一中，其成因以及發展，這所學校在日治時期所培育的菁英，在社會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林淑芬《日治時期台共對台灣社會運動的影響》，³¹論文主要探討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的共產主義思想形成原因、當時台灣共產黨對工農運動、文化協會有何影響，以及台灣共產黨對台灣主體性的主張。

至於國民黨政府來台初期的部分，則有幾篇研究：

王峙萍《暴動與抗爭的迷思--論二二八事件中的校園與學生反抗運動》，³²主要研究國府初期的台灣校園中，身為知識份子的教師與學生，在面對台灣困境所表現出的積極與熱誠，造就其抗爭的動力，對於台灣民主史上的發展，具有推波助瀾之作用。論文當中對於二二八事件中的校園與學生反抗運動重新闡釋，使其不再被指稱為「暴」或「亂」的代言者。

黨化教育時期的部分，除了上述註腳 24 郭紀舟的著作之外，還包含幾篇研究：

李泰翰《黨團、軍事與教育--1950 年代學生軍訓進入校園之研究》，³³作者追溯學生軍訓教育何時、如何進入台灣的校園當中，從國家教育單位、軍事單位、救國團三方面的觀點來闡述，以及《自由中國》的反對聲浪；王啓

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²⁹ 戴振豐，《葉榮鐘與台灣民族運動（1900-194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

³⁰ 朱珮琪，《台灣日治時期菁英教育的搖籃--以台中一中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³¹ 林淑芬，《日治時期台共對台灣社會運動的影響》（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³² 王峙萍，《暴動與抗爭的迷思--論二二八事件中的校園與學生反抗運動》（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

³³ 李泰翰，《黨團、軍事與教育--1950 年代學生軍訓進入校園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明《1960年代反叛文化對台灣的影響》，³⁴其中第4章〈60年代民主運動對台灣的影響〉，作者認為196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黨外運動），最主要受到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學生運動以及中國五四運動的抗議方式所影響。在這之中，作者認為黨外運動與新聞媒體的相處之道，似乎也變得非常重要。

解嚴之後的歲月，則有幾篇研究：

吳介民《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台灣1980年代》，³⁵作者主要處理關於1980年代台灣自力救濟行動風潮的性質，將社會抗議置於政治體制轉型的歷史架構中，而以威權統治者對社會的控制這個概念，作為討論與分析的軸心；薛曉華《八〇年代中期後臺灣的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社會」的分析》，³⁶論文主軸以國家（掌權者）與社會（民間力量的興起）兩者的辯證，試圖分析1980年代中期後，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的興起原因、過程，其中也包含台大、文化等多所大學的校園抗爭。

參、研究目的

歸結上述研究緣起以及文獻回顧之後，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幾點：

- 一、分析從日治時期到解嚴之後（1920-1994），台灣這段時間一波波的學生校園、校外抗爭行動，論證「台灣有無學生運動」。
- 二、藉由史料的運用，嘗試建構日治時期學生抗日運動（1920年代）、國民黨政府統治初期的四六事件（1940年代）、釣魚台事件後的台大校園（1970年代）、1991年野百合運動以及之後的校園抗爭（1980-

³⁴ 王啓明，《1960年代反叛文化對台灣的影響》（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

³⁵ 吳介民，《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台灣1980年代》（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1989）。

³⁶ 薛曉華，《八〇年代中期後臺灣的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社會」的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1995）。論文修改後出版：薛曉華，《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與社會的分析》（台北：前衛，1996）。

1990 年代)，串連成一部「台灣學生運動史」。

三、將台灣各時期的學生運動，與同時期的國外學運作一初步比較、探討。

四、從林玉体對學生運動抗爭的三種層次分析，檢視台灣學運發展過程當中，學運所呈現的層次、代表性，以及意義。

五、探究台灣各時期的學運發展之後，歸結成「民族主義」、「左翼思想」、「社會力」三種論述，分析學運興起的歷史背景，以及發展的主軸。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壹、時間斷限、範圍、研究對象與學運定義

本研究時間斷限：1920-1994 年。時間起點以台灣留學生於 1920 年開始協助在日本東京成立新民會（1920.1.11）、台灣議會請願運動（1921.1.30），³⁷這是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部份。在台灣，1920 年因為謝文達的「飛行訪問」，而開啓台灣本島學生運動的開始。³⁸而終點則是野百合學運（1990.3.16-22）、清大學生廖偉程等人的獨台會案（1991.5）、甚至到文化大學的草山學運（1994.4）才告一段落。³⁹空間方面則是聚焦在台灣本島；至於海外部分，包括：

³⁷ 第一次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於 1921.1.30 舉行，其後到 1934 年為止，前後 14 年共請願 15 次。

³⁸ 關於台灣最早的學生運動於何時、何地、事件為何，目前並未有一致的共識，例如藍博洲認為 1913 年當時醫專學生蔣渭水與杜聰明、翁俊明赴北京刺殺袁世凱為揭開近代台灣學運的序幕。詳見藍博洲編著，《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 年）》（台北：時報，1993）。但筆者選定從 1920 年開始，乃認為當時學運已初具規模，也略有初步組織，因此以 1920 年作為起始點。

³⁹ 本研究即在探討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脈絡以及學運與國家機器之間的抗衡，1987 年台灣

台灣留學生在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等所引發的學運，或是外國大學所爆發的學運，則是分析、比較對於台灣學運的關連及產生的影響。⁴⁰

台灣學運發展的過程，可以圖 1-1 說明。日本於 1930 年代軍國主義盛行，入侵亞洲各國，到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對於殖民地台灣遂實施強制的皇民化政策，對於台灣社會菁英、學生的抗爭不利於日人在台的政權，日本政府於是無所不用其極打壓這些聲音，所以塗黑來表示這段時期學運的空白。

1950-1960 年代則因為中國國民黨政權在經歷二二八等事件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白色恐怖時期，肅清異己、強力鎮壓反對聲音，校園服膺於政府，只能算是「動員學生」，因此也應以塗黑來表示學運的缺席。

到了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這段 10 多年時間的學運過程，則視為連貫、一氣呵成的。除了一方面認同鄧丕雲將此時期學運視為連續性的論點之外，鄧同時區分成：醞釀期（1980-1986.6）、突破期（1986.7-1988.6）、蛻變期（1988.7-1990.2）、野百合學運（1990.3-1990.6）這四期；⁴¹一方面也認為 1980-1990 年代台灣學運的基本主軸在挑戰、衝破校園、國家的威權體制。



圖 1-1 台灣學生運動時間簡圖（黑色部分代表學運空窗期）

資料來源：筆者自編

宣布解嚴，但台灣整個政治空間真正徹底解嚴，嚴格說來應該要到 1994 年。而當打倒中國國民黨之後，學運所關心的面向也變得多元化，所以野百合學運前後則是學運發展最關鍵、最高潮的轉折點。野百合學運後的十年今天，當初這些學運份子的心路歷程或許可在何榮幸，《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2001），一窺究竟。

⁴⁰ 筆者一方面不諳日語，一方面認為範圍過大的話，實在無法作全面性的分析，而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但在此必須強調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有受到海外影響與衝擊，或跟海外學運來往密切。

⁴¹ 詳見鄧丕雲，《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1993）的目次分類。

再次強調上述所言，1930 年代、1950-1960 年代學運的空窗期，並非表示當時完全是一片噤聲，但在日本殖民政府、中國國民黨政權強力鎮壓之下，也容不得有大規模自主性學運產生。因此除一些零星點綴之外，也有一些當時無關緊要的花絮，既無法激起大規模的波瀾，也不能撼動當時整個社會，如此一來在檢視台灣整個學運的發展脈絡時，並無直接幫助，因此直接捨棄視為空缺，在此說明。⁴²

當然，上述這一點就涉及了研究對象的選取與認定問題了，即使在所要探討的時期內，也無法包山包海作全盤性介紹，因為深怕成為流水帳的敘述而已。因此只能選擇判定何者為激起大規模的波瀾、撼動當時整個社會、影響時日較久的學生運動個案。⁴³如此一來，除了從鉅觀的角度分析台灣學生運動的脈絡之外，同時也比較會有一個清楚的架構、概念產生，另一方面個案代表也較能將主題聚焦、充分反映當時學運的發展。

至於「學生運動」的定義，筆者在翻閱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Encyclopedia Britannica、Grolier Academic Encyclopedia、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幾套百科全書後發現，書中並沒有對「學生運動」作出定義（倒是有對「社會運動」作定義）。誠如 G. W. F. Hegel 所言：何謂哲學？只要了解哲學史，就知道哲學的輪廓。因此筆者在論文每一章中先行探討各時期的學生運動，最後一章結論則是統整歸納前面幾章，並在分析與批判的過程中嘗試對「學生運動」作出定義。

⁴² 例如在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一書中，將社會服務運動(1971.12)、百萬小時奉獻運動(1973.3)、獻機報國運動(1975.4)納入學運的範疇裡，但是對於當時學生投入美麗島事件，以及釣魚台事件之後，大學校園要求民主的學潮卻似乎避重就輕帶過。

⁴³ 誠如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上)》(台北：玉山社，1999)，在其前言就說到：

在選定這 100 個事件之前，確實讓我煞費苦心，舉棋不定，躊躇良久。可能有人要問我，我的所謂「大事」的標準是什麼？在第 100 個事件和第 101 個事件之間是如何取舍的？甚至有人可能會以實際的事例直接質問我，為何某某事件沒有列進去？

我確實很擔心回答以上的問題，因為這牽涉到主觀的「歷史解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然而這些問題勢必要面對。

筆者在選定各年代主要學生運動的代表個案時，其實也遭受到這樣的困難不知如何取舍，因此在每一章中也將會充分說明選取的個案理由。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茲說明如下：

一般史學著作應分為史實與史觀兩部分。史實是在重建過去所發生的事，史觀則是史學家對於史實的評論。一部好的史學著作在敘述時能文字流暢、平易近人，而史學家在評論時的觀點必須中肯、真誠，不隨波逐流也不攀權附貴，留給後人一個好的楷模。

教育史的著作更應該如此，除有上述的條件之外，更應該要有教育意涵存在，不但使人能夠心有戚戚焉、深有同感之外，更因此時時砥礪、反省、與內鑠自己，最終能達到實踐、解放的地步，但不是使用權威式的灌輸、教化來達成。

基於上述，首先針對史料進行蒐集與考證，將日治時期至解嚴後的學生運動，選取每個世代足以供代表的個案來彰顯當時學運的發展、走向、特色，進而鋪陳出整部台灣的學生運動史。其中，歷史淵源、涵蓋面較廣的因果關係等均是討論的重心。爾後，在每章小結中提出分析與批判，最後在結論一章，從林玉体對學運分析的三個層次，以及從「民族主義」、「左翼思想」、「社會力」三種論述，來歸結台灣學生運動史的發展脈絡，並提出筆者對學運的看法。

至於史料文獻預計選用方面，說明如下：

一、探討日治時期（1920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

專著部分包含：

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1-5冊》；⁴⁴

⁴⁴ 本套書另有譯本，乃為王詩琅譯註第一冊：文化運動；翁佳音譯註第五冊：勞工運動、右派運動。均為稻鄉出版社發行。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連溫卿著（翁佳音、張炎憲編校），《台灣政治運動史「原題：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
葉榮鐘著（葉芸芸、藍博洲主編），《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
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史〉。

至於期刊雜誌部分，記載台灣人抗日運動的重要刊物：《台灣民報》（包含《台灣青年》），則是借重的史料之一，關於當時海內外的抗日事蹟，以及理念的宣傳，均可在《台灣民報》中搜尋到。

二、探討 1940 年代，政權更迭之下（國民黨政權初期）的四六事件為例：

校方所做成的調查報告書：台大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台大四六事件考察：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總結報告〉。這本書對於當時經歷四六事件學生進行口述訪談。

官方所做成的調查報告書：賴澤涵主持、吳文星採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五〇-七〇年代文獻專輯（之四）：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四六事件」〉。這本書收錄了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所發函師院極具關鍵性的公文，並對兩位經歷四六事件的學生進行口述訪談。

民間所出版的專著：藍博洲《天未亮：追憶 1949 年四六事件（師院部份）》、《麥浪歌詠隊：追憶 1949 年四六事件（台大部份）》、《幌馬車之歌》3 本專著，以及調查報告書《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對於當時的受害學生進行口述訪談，有助於釐清當時的情況。

報紙部分：當時《中央日報》、《公論報》、《台灣新生報》對於四六事件均有報導（1949.4.7-4.30）。

口述訪談部分：謝東閔、劉真、當事學生趙制陽，接受報紙的口述訪談；彭孟緝接受中研院的訪談，這些均有助於釐清當時四六事件的來龍去脈。

三、探討 1970 年代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的學運，以釣魚台事件後的台大校園為例：

丘為君所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這套書有 3 本），對於 1950-70 年代的校園事件（止於釣魚台事件後的台大校園抗爭），有詳細的紀錄，其中包含當事者學生宣讀的文稿，以及台大學生刊物的重要文章（如台大學生要求民主而舉辦的座談會記錄）等。

回憶錄部分則有：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70 年代台大學生運動》；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

至於台大哲學系事件參考史料：

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

趙天儀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

報紙部分：當時《中央日報》為貫徹黨化教育所刊登的文章〈南海血書〉（1978.12.19-1984.10.27），以及打擊學生運動，由孤影所寫〈一個小市民的心聲〉（1972.4.4- 4.9），均是所要借重的史料。

四、探討 1980 年到 1991 年間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解嚴前後）的學運，以發生於 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為例：

一手報導部分：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啓，《台北學運：1990.3.19-3.22》；

林美挪編，《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抗議記實》。

這 2 本書均是作者當時在現場的直擊，直接記錄下來。林美挪書中甚至蒐集了當時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文宣、通訊等，對於野百合學運的來龍去脈，可獲得相當清楚的瞭解。

鄧丕雲，《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
范雲編，《新生代自我追尋》。

至於這 2 本書乃受到台灣研究基金會贊助所完成。前者將 1980 年代以來台灣的學運作一回顧性的描述，後者則針對前者所陳述的事件，蒐集當時的文宣、當事人所撰寫的文章，十分珍貴。

此外，當時報章、雜誌對於野百合學運也有相多大篇幅的報導，例如《中國論壇》30 卷第 1 期（1990.4.10），即對於五人教授顧問團專訪，這部分可補充只以學生觀點評論野百合學運的不足。

回憶錄部分：何榮幸所著《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訪談了 42 位當時參與學運的靈魂人物，這些人的訪談內容可彌補還原野百合學運時的相關細節。

參、論文章節架構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說明研究緣起、文獻回顧、與研究目的；第二節則交代研究方法、時間斷限、研究範圍、研究對象、與史料選用等。

第二章〈始於 1920 年代--日治時期的台灣學生運動〉：主要探討日治時期的學生運動，包含當時學運發生的背景因素、發生過程，以及造成的影響等。當時的台灣學運發生在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本島，範圍甚廣，因此本研究除探討在台灣學生運動，對象也包含在日本東京以及中國大陸的台灣留學生。此時期學生運動嚴格說來，算是抗日運動史一部份，所以內容將涵蓋台灣本島的學生抗日行動（依附在文化協會之下）、學校內的抗爭行爲兩部分，以及日本東京、中國大陸的台灣留學生籌畫組織進行抗日的行動。

第三章〈時代更迭下的悲劇--1940 年代的四六事件〉：主要探討發生在 1949 年當時的師範學院、台大的「四六事件」。1940 年代對於台灣來講，這短短的十年是非常關鍵性的十年，因為 1945.8.15 台灣結束長達 50 年又 4 個

月日本統治，當時由蔣氏政權暫時派人治理。在這政權交替最初幾年，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1949年發生四六事件，國共交戰結果又使得國民黨政府於1949年撤守來台、政府宣布戒嚴，均對台灣往後30、40年造成非常重大影響，對於學運甚是如此！四六事件雖是冰山一角，但在四六事件之後台灣學運遭到國民黨政府強力打壓、以各種理由羅織罪名，從此學運在戒嚴時期噤聲，直到1970年代才又開始冒出頭。因此以四六事件來探究整個1940年代的學運應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四章〈美麗與哀愁--1950-70年代的台大校園運動〉：主要探討1950-60年代政府的「動員學生」，以及1970年代何以學運再次冒出頭。當時在國民黨政府強力控制下，大學校園不能算是自由民主的，大學生正值人生黃金時期，卻只能將青春耗在書本上，落寞的學生在校園裡不是等著就業就是出國唸書。直到釣魚台事件發生後，學生的關懷層面走出校園來到社會，從最初的支持政府到最後擦槍走火演變成質疑政府，甚至要求政府開放校園民主、言論自由，都是始料未及的，所以說釣魚台事件可算是1970年代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嚴格來說保釣事件還是受到國民黨在操控，不完全是學生自主性地運動）。隨後學生的聲音又被國民黨政府強力鎮壓，學運也宣告無疾而終。但火苗終究是會再滋長的，威權體制終究禁不起民主潮流的衝擊，1970年代前人的努力已悄悄為往後1980-1990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埋下伏筆。本章一方面受限於史料蒐集，一方面也是當時學運幾乎以台灣大學為主體，因此本章的內容以台大校園所發生的抗爭事件為論述主體。

第五章〈我們來創造歷史--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主要探討1980年到1994年左右這10幾年的學生運動。當時國家威權體制已逐漸鬆動，在民主潮流的衝擊之下，校園學生從北到南也已經展開一連串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學生關心的議題不管是校園內的要求：改革不合理制度（如學生刊物的送審制）、學生自治、校園民主等；校園外包含走入民間、社區，關心社會議題，諸如參與鹿港杜邦事件調查，甚至幫助反對運動人士助選。學生運動終至1990.3野百合運動抗議軍人干政、要求解散萬年國會等議題，達到最高潮。1991.5廖偉程等人「獨台會案」、1994.4文化大學的草山學運，隨著政治空間完全的解嚴，1994年之後學運的聲音逐漸減弱。本章探討在這風起雲湧、眾聲喧嘩的10幾年，學運的發展過程、內外在因素，以及往後的影響，為免探討議題失焦，將以野百合運動為分析重點，再參酌其他學運事件以構

成本章內容。

第六章〈分析與結論〉則是分成三個部分：一、分析從日治時期到解嚴之後，台灣這其間一波波的學生校園、校外抗爭行動，論證「台灣是否有無學生運動」。二、從林玉体對學運的三種層次分析，檢視台灣學運發展過程中，學運所呈現的層次，以及代表性為何；此外，在探究台灣各時期的學運發展之後，嘗試歸結成「民族主義」、「左翼思想」、「社會力」三種論述，分析學運興起的歷史背景，以及發展的主軸。參、在完成這份論文時，針對台灣的學運發展，以及研究過程提出研究者的省思，也算是為自己在生命成長中留下一點註記。

第二章 始於 1920 年代-- 日治時期的台灣學生運動

※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蔣渭水勉台灣抗日人士之語

本章首先從文獻史料中，分析影響整個學運的時空因素。再者，歸納日治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的過程，其中又分為台灣本島的學生運動（校園內與社會上），以及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台灣留學生引發的學生運動。嚴格來說，日治時期的台灣學生運動史，也算是台灣人抗日運動的一部份。最後，從「民族主義」的史觀來分析日治時期的台灣學生運動史，並與當時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作一初步比較。

第一節 學運的緣起與發軔

本節旨在整理和分析學運的緣起，分成海外以及台灣本島內，並說明以 1920 年代作為學運發軔的原因。透過了解學運形成的原因，有助於釐清學運的發展過程、後來所產生的變化，以及對學運所造成的影響。

壹、海外台灣留學生引發學運的原因

日本統治台灣最初的 25 年間，統治的權力大部分放在經濟方面，對於教育並不重視。⁴⁵當時供台灣人念的學校不但少且收容人數有限，因此台灣的資產家對子弟教育熱心的人，就把達到學齡的子弟逐漸送到日本就學。根據《警察沿革誌》記載，早在 1901 年（明治 34 年）留日的風潮即已開始，且逐年增加，直到 1922 年為止（大正 11 年）總數已達 2400 餘名。⁴⁶

在專制政治的國家中，反抗性的政治運動，通常都先在國外組織起來，台灣亦然。台灣民族運動的先驅者是一群東京留學生。⁴⁷至於當年促使海外台灣學生的覺醒，歸結起來有幾個主要因素：⁴⁸

一、辛亥革命的影響：《警察沿革誌》中談到這些到日本東京的台灣留學生都努力跟日本的風俗習慣同化。對社會問題、政治運動等事並不在意和關心，所以常被中國留學生以及朝鮮留學生嘲笑，說他們是：「維維是諾，屈從於日本統治下之愚」，也不敢起而抗辯。⁴⁹以葉榮鐘自身留學日本的經歷所寫下一段文字，或許可一窺端倪：

辛亥革命以前，祖國祇是使人洩氣的存在，不但不能做臺人的靠山，反足以增加臺人的恥辱，日本人辱罵臺人的口頭禪就是「清國奴」。所以一部分留學生在東京，常有一種自卑感，盡可能去掩飾自己的身份，雖然其志可鄙，其心情卻是可憫的。……。因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留學生心中燃起希望的燈光、激發民族意識、消滅自卑感，對祖國的向心力滋長茁壯，同時對祖國的強盛抱有信心，把臺人增取自由、獲得解放的殷望寄託在祖國的將來。甚至有些被稱謂「祖國派」的留學生，主張回大陸去為祖國的建設效勞，俾祖國早日強盛起來，臺人的解放才有可能。⁵⁰

⁴⁵ 周憲文譯（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1985），頁 144。

⁴⁶ 王詩琅譯註，《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 1 冊：文化運動》（台北：稻鄉，1988），頁 41-42。

⁴⁷ 同註 1，頁 176。

⁴⁸ 整理自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台中：晨星，2000），頁 98-101。

⁴⁹ 同註 2，頁 42。

⁵⁰ 同註 4，頁 98-99。

留日學生後來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刺激，他們的思想開始有所轉變：「台灣非屬於台灣人的台灣不可。」⁵¹喚醒了他們的民族意識，他們時常聚集討

論

如何提高台灣人的地位。雖然當時分有「溫和的民族自決」、「共產主義的激進台獨」不同主張的兩條路線，但「民族抗日」還是優於當時曖昧不明、講也講不清的中國與台灣間「國家認同」問題。⁵²不過這終究只是暫時的，隨著越來越多年輕一代學生接受共產主義思想並化為行動之後，兩派人馬終究還是因為想法的南轅北轍而導致決裂，不但影響文化協會的分裂，也分散了

台

人抗日的力量。

二、民族自決主義的影響：美國威爾遜總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1918.1）發表 14 條和平條件的原則，雖在巴黎和平會議均遭否決，惟民族自決主義這條原則獲得確認。事實上威爾遜的政治思想--新自由主義比起 14 條和平條件的原則影響要來得大。此項主張啟發了台灣留學生的民族意識，增強了他們對民族自決主義的信心。

三、日本民本主義運動的影響：東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於 1916 年在雜誌《中央公論》寫了一篇名叫〈談憲政本質並論其成功之道〉的文章，倡導民本主義（Democracy），極受進步知識份子的歡迎。1920 年吉野與福田德三教授組織黎明會，展開如火如荼的運動，同時適值「大正民主時期」（1920-1927 年），自由民主思想蔚成思潮主流。台灣留學生耳濡目染，受到新思潮的刺激，決心將這種新思潮作為解救台灣的啟蒙運動。

四、朝鮮獨立運動的刺激：1919.3.1，朝鮮發生要求獨立的大暴動（世稱「三·一運動」，韓人則稱為「萬歲事件」），在短短的 3、4 月間在朝鮮的 618 個地方發生 332 回暴動。雖然他們的起義終歸失敗，但影響卻非常廣大，尤其是東京留學生。因為台灣於 1895 年成為日本殖民地，韓國則是於

⁵¹ 同註 4，頁 99。

⁵² 中國與台灣的关系，葉榮鐘曾說在他 18 歲當時的意識裡，同胞的觀念非常強烈，但祖國（指中國）觀念卻很稀薄。等到赴筭日本留學，祖國的觀念油然而生。而這種經驗在葉榮鐘這一代裡，凡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沒有特別造詣的人，年輕時都應該會有相同感受。見葉榮鐘，同註 4，頁 98。因此中國與臺灣的關係，並非絕對是附屬關係，而臺灣也並不必然完全是中國文化的延伸。

1910 年被日本併吞；同樣都是日本殖民地，台灣卻多了 15 年之久。即使台灣被殖民時間比韓國長，在財政、教育等方面也比韓國來得進步，但政治、待遇等卻比韓國來得差，這是台灣人所怨不下的一口氣。因此當朝鮮人起而反抗，刺激到台灣人，更是紛紛起而效尤。

雖有以上幾項因素促使東京留學生的覺醒，但是一來留學生對於台灣的情勢不夠明瞭、二來要有經濟的支援、三來要有傑出的領導者，尤其最後一點更是留學生所欠缺的，林獻堂與蔡惠如則是適時出現彌補了這重要的空隙。⁵³

除上述幾項因素之外，當時刺激東京台灣留學生的民族自覺，可能還包含幾項因素：

五、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這場以反帝國主義，標榜社會主義、倡導無產階級及殖民地解放的革命，在 1918 年連當時避居上海的孫文也電賀列寧革命成功。俄國的例子同時大大地影響了台灣學生的思想，於是他們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想研究會，企圖以這種思想作為解放台灣的指南。⁵⁴

六、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影響：愛爾蘭雖為英倫三島之一，但有其歷史與民族先天因素，因此 1154 年在教皇將愛爾蘭「贈與」英皇之後，便一直尋求獨立。從最先武裝革命到後來以和平手段進入議會杯葛英國政府政策，終至 1937 年成立「愛爾蘭共和國」，1949 年獲英國承認。林柏維稱其為「愛爾蘭獨立運動模式」。⁵⁵

何以愛爾蘭這段建國史會對當時台灣產生影響呢？原來這是有段淵源的。話說梁啟超曾在歐洲待過一段時間也涉獵過關於西方的歷史。1910 年林獻堂赴日本東京，某日到橫濱新民叢報館訪梁啟超，梁恰好不在，林一行人歸途在奈良打算住宿旅社，竟在旅社內與梁不期而遇，於是當面向他請教關於台灣抗日的問題。梁說：

⁵³ 同註 4，頁 101。

⁵⁴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上）》（台北：玉山社，1999），頁 129；陳少廷，〈導論：學運在台灣民主運動中的角色--台灣學生運動七十年〉，收於洪三雄著，《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台大學生運動》（台北：自立晚報，1993），頁 5。

⁵⁵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臺原，1993），頁 28-29。

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人如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乃舉例說，英國漫畫家繪兩位愛爾蘭人，以一條繩索各執一端，將英首相絞殺，這意味著愛人議員在英國會議席雖不多，但處在兩大黨之間，舉足輕重，勢固得以左右英內閣之運命，你們何不效之？⁵⁶

由以上這段話可知日後產生的議會請願活動、台灣文化協會、東京台灣青年會等都是採取和平的方式進行抗爭，不同於 1907-1915 年間所進行的武裝抗日，雖說這些運動的影響因素很多，但也不能不說「愛爾蘭獨立運動模式」有其一定的影響。

貳、台灣本島學運的發軔

探討海外台灣留學生的學運興起原因之後，接下來分析關於台灣本島學運的發軔。在本論文第一章說到藍博洲在《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年)》一書中，將 1913 年醫專學生蔣渭水、杜聰明與翁俊明赴北京刺殺袁世凱，和隨後在麻豆文旦下毒欲毒死日本皇室、高官，視為近代台灣學生運動的發軔；⁵⁷而矢內原忠雄則是除了認為台灣民族運動的先驅者是一群東京留學生之外，也提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發端應該為 1914 年 11 月板垣退助的前來台灣。⁵⁸

但筆者則是比較贊同謝春木的觀點：

……1920 年秋天，台灣的第一位飛行家謝文達回到台灣做「鄉里飛行

⁵⁶ 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收於羅萬俤等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台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60），頁 28-29。

⁵⁷ 詳見藍博洲，〈序曲：台灣醫學生的暗殺行動〉，《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台北：時報，1993），頁 8-13。

⁵⁸ 同註 1，頁 176。

訪問」時，醫學專門學校內之李應章、吳海水、何禮棟和師範學校之謝春木、盧丙丁、蔡扑生等人乃在蔣渭水的幕後指導、聯絡下，利用此一機會，「使向來分離之各校，相互提攜的召開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啟開了學生運動的機運。⁵⁹

當然若是繞在這個議題一直原地打轉的話，恐怕最後還是沒有交集的。事實上近代歷史學者們多以 1915 年西來庵事件為分界點，也就是說 1895-1915 年多屬武裝抗日行動，1915 年之後進入 1920 年則為新民會、文化協會相繼成立，除了採取較和平的方式進行抗爭之外，也有較具規模的組織，⁶⁰抗爭屬於全面式而非個別單一地點的暴動，且有目標規劃而不是以宗教迷信來武裝暴動。1930 年代進入二次世界大戰前哨，日本皇民化急遽進行，加上嚴格取締當時左翼思想已相當濃厚的學運，逼得學運份子不得不走入地下持續抗爭。因此前文提到聚焦在日本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事務的推動、共產主義對學運的影響，為 1920 年代的背景與發展脈絡，主要道理是在此的。

第二節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背景

本節將日治殖民統治台灣背景，分成教育、政治、經濟三方面，探討台灣當時的時空背景如何影響學運的發展，以及和學運的關連，作為第三節分析台灣學運的發展時，有更清楚的概念。

壹、教育方面

⁵⁹ 同註 11，頁 66。(原文參照：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1)，頁 15。)

⁶⁰ 按照李筱峰的說法，這種分期比較周延的解釋應該加上「就平地人抗日而言」的前提，因為霧社抗日事件是發生在 1930 年，與當時一般和平抗日的運動顯然有異。見李筱峰，〈莫那魯道 vs. 武士道〉，《自由時報》，2004.2.9，15 版。

教育方面分成當時的教育制度、政策，以及台灣學生在學校的受教狀況，共兩部分。

首先，關於當時的教育制度、政策部分，由於現今的研究成果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教育狀況的描述（包含學校制度、教材內容、學校日常生活等），可說是汗牛充棟，因此筆者不再贅述。從林茂生《日治時期台灣學校教育的發展--歷史與文化的分析》（*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⁶¹、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幾本書中，約略可推敲出日本政府制訂教育政策的方向與目的。

從林茂生書中分析來看，當時的台灣學校制度更改、學校設置與裁撤幅度很大。大體來說台灣人所念的學校依序分別為：初等教育為「公學校」；師範教育有「國語學校師範部（台北師範學校）乙科」、「國語學校講習科」、「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中等教育有「國語學校國語部」、「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台中中學校（只招收男生）」；實業教育有「工業講習所」；專門教育則有「台灣總督府醫學校」。⁶²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日本政府，將台灣菁英學生的出路限制在當老師或是醫生，不讓他們進入法政相關科系就讀，目的應是怕台灣學生將來會從事顛覆政府工作。

再從台灣人受教總數、以及平均教育程度來分析，可以清楚得知日本政府不願意台灣人念太多書，以免從書中得到「覺醒的意識」，進而挑戰日本政府；初等教育的普及純粹是站在統治更有效率的觀點上所進行，就像職業教育的實施一樣，雖然使得台灣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但是大量台灣勞工遭受剝削，卻也是不爭的事實。似乎印證了矢內原忠雄所說：

日本統治台灣的各種政策，一向是以發展經濟為主要項目，不，日本對於台灣的經濟要求，是決定統治台灣各種政策的最有力原因。⁶³

⁶¹ Mosei, Lin, *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Ph. D. Dissertation(NY: Columbia University, 1968).

⁶² *Ibid.*, pp.40-69.

⁶³ 同註 1，頁 1-2。

再者，台灣學生在學校的受教狀況，可從 E. P. Tsurumi（派翠西亞·鶴見）所著《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⁶⁴一書的研究，可略知一二。

Tsurumi 在研究台、日籍學生在學校的教育狀況時，透過口述訪談也發現，不只是台籍學生遭到歧視、不公平的對待而已，即使同樣是台籍學生，「同化」的學生常遭到「未同化」的學生鄙視、日籍學生也很看不起那些「同化」的學生；台籍學生在畢業後進入社會差別待遇依舊存在，不因他有高等學歷文憑而有所變化；當台籍學生愈往上爬，差別待遇愈明顯。可見當時整個社會環境確實存在著「日人高高在上，台人屈居在下」的現象。

依據 Tsurumi 書中的描述：

一個小學校畢業生回憶著，當他畢業前幾個月父親曾告訴他，如果順利通過入學考試，他將進入台北第二中學。他嚇了一跳問說：「為什麼不是進入台北第一中學呢？」畢竟他知道自己是一位優秀的學生，而且每個人都知道台北第一中學是最好的。他父親直言不諱的說台灣學生只能進去二中而不是一中，這給了他無情的打擊。他說道，在他生命中第一次瞭解到，他終究是台灣人而不是日本人。⁶⁵

從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描述，主角胡太明（學校教員）的眼中看到學校教育在日人教員、學生，與台人教員、學生之間，其實是呈現一種緊繃的狀態，茲以一段話為例：

每天早晨，照例舉行教職員朝會和學生朝會，這段時間太明覺得最苦惱，因為校長在朝會中的訓詞，總是非常偏激的，他幾乎用訓導的態度來對付教職員。校長的訓詞從不懂「國語」（日語）的人缺乏「國民精神」說起，然後說到本省籍教員，必須把自己的家庭「國語化」，凡不能教育自己家庭的人，便不配當教員……。他總是用這一套宏論來責難教員們的情緒低落。太明聽了這些話，自己也像受到責難似地，感到非常不快。還有，值星教員規定必須每日調查學生的行為，並須

⁶⁴ Tsurumi, E. P.,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MA: Harvard University, 1977).

⁶⁵ *Ibid.*, pp.157-158.

於教職員朝會中提出報告，遇到有人在報告中指摘本省人家庭的廁所不清潔，便把弄污學校廁所的事，歸咎本省籍的學生，並且大加訓斥。再如初入學的新生，由於說話的能力較差，回答口試時難免吞吞吐吐地說不清楚，於是又激起級任導師伊藤的小題大作，主張舉辦什麼家庭調查……。對於這些，時常使太明感到非常難堪。⁶⁶

太明已漸漸地對教育發生懷疑，也許這種懷疑只限於對教育的方法。仔細地想想，很多事情使人不能安心：譬如日人小學從來不採用體罰，同樣能收到教育的效果，但台人國民學校卻辦不到；又日人小學一切依照學則辦理，台人國民學校卻把重點放在農業教育上。不過，太明對於這些，也只茫然不解其中奧秘，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改革意見。⁶⁷

即使深處在異族的統治之下，學生也能感受到自己與異族的不同，但身份、族群、乃至於國家認同卻使他們混淆著。彭明敏在他的自傳回憶錄中說道：

自從孩童時代，身為台灣人，使我在心理上愈來愈感複雜。我講的日語完美無缺，在學成績也不錯，但總是太清楚地自覺與日人同學不同。我的名字也使我尷尬。中文「彭」字，在日語發音為「何」，每次在課堂被叫到，總引起哄堂大笑。母親穿的是旗袍或是洋裝，每當有公開場面，她來到學校，總令我尷尬不已，因為她看起來與其他日人學生的家長那麼不同。⁶⁸

所以在這樣被歧視、遭受不平等的對待之下，遇到有人起身反抗，自己也會感同身受，從以下這段話便可看出：

大正 12 年 4 月，新竹中學校某台籍學生的日記記有：「閱讀今天的報紙，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很多人的照片，連忙一看，原來就是應該獨立的台灣恩人蔣渭水先生、蔡培火先生等十五六位先輩的照片。……啊！我們很喜悅，我們台灣能夠養出這樣的人物……心喜，心喜，我台灣的獨立已在眼前了，啊！台灣生出了甘地了。」⁶⁹

⁶⁶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1995），頁 62-63。

⁶⁷ 同註 22，頁 64。

⁶⁸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台北：前衛，1995），頁 33。

一般來說學生比較具有理想性，有抱負、有熱忱，加上又無太大後顧之憂，加入抗日組織、發起學生運動更可見一斑。當時的高等教育中，台人就讀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北師範學校所培養出來的菁英份子，更是成為日後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核心人物，在第三節將探討當時這些學生所引發的學生運動。

貳、政治、經濟方面

除了教育方面的影響之外，政治、經濟方面對於當時的學生運動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究竟政治方面如何影響到學生運動的開展呢？這應該要追溯到「六三法」的實施。⁷⁰因為六三法的實施，所以當時台人如林獻堂、蔡培火等人發起「六三法撤廢運動」，在日本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很認同這項行動。在這種情況底下，1920.1.11 正式成立「新民會」，新民會其中一項具體表現就是「六三法撤廢運動」的推動。

但是當時就讀明治大學的林呈祿則持不同的觀點，發表了〈六三問題の歸著點〉一文，⁷¹主張應該為台灣議會的設置請命才是，爾後行動至此轉向，改為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主要目標。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 1921 到 1934 年為止，共計 15 回合。⁷²而在請願過程中學生的參與也算是重要的一部份。

⁶⁹ 同註 2，頁 309。

⁷⁰ 關於「六三法」制訂的起源、過程、以及後來詳細的沿革等等，由於在諸多史料當中有詳細記載，例如：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1971），頁 53-65；近代也有一些研究成果發表，例如：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晚報，1989）；加上這部分與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學生運動似乎關連不大，因此關於「六三法」本身就不再贅述。

⁷¹ 林呈祿，〈六三問題の歸著點〉，《臺灣青年》第 5 期（第 1 卷第 5 號），1920.12.15（大正九年）。收於蔡培火主編，婁子匡校纂，《臺灣青年（1）》（台北：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73），頁 24-25。

⁷²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詳細經過與分析可參考王乃信等譯註，《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2 冊：政治運動》，頁 24-35。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若要大書特書的，應該要算是第 3 回合的請願後所發生的「治警事件」吧！話說 1922.2.16 第二回合請願結束後，在蔡培火、蔣渭水等人幾經考量之下，組成了「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而這個同盟會日本執政當局一直不承認其合法性，在第 3 回請願結束後，1923.12.22 台灣總督依違反治安警察法將蔡培火等人送交台北地方法院檢查局。

有趣的是，初審判決時被告竟全部獲判無罪，檢察官三好一八於是不服上訴，二審才宣判蔣渭水、蔡培火四個月刑期、蔡惠如等 5 人三個月刑期、鄭松筠等 6 人罰金百圓。⁷³

這些被判刑的菁英，文筆都非常好，服刑時寫了非常多的詩作。其中一首蔡培火的〈台灣自治歌〉，每逢筆者在閱讀時，心中總是五味雜陳、感觸良多：

蓬萊美島真可愛，祖先基業在，
田園阮開樹阮栽，勞苦代過代。
著理解，著理解，
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
台灣全島快自治，
公事阮掌才應該。⁷⁴

之所以引起筆者如此感觸良深，乃是因為當時在日人殖民統治之下，民眾教育程度不高，執政者放縱老百姓愚昧，且又經常壓榨他們。人民往往只能屈從，無力也不敢向掌權者作合理抗爭。從這首〈台灣自治歌〉歌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這些帶頭抗爭者，多麼希望老百姓能夠自覺、醒悟，而站出來與他們一起抗爭。⁷⁵

⁷³ 同註 28，頁 60-61。筆者之所以認為有趣，那是指當時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檢察官、法官、連為蔡培火等人辯護的律師清一色全是日本人，對於蔡等人非常不利的情況之下，律師和法官公正的依法論法而判他們無罪，不因被告是台灣人而誤判，這在當時確實引起一片譁然。筆者認為平心而論，日本在脫亞入歐學習歐美的律法之後，雖「殖民」台灣，但像上述事件日人就事論事的態度，這點確實是值得我們肯定。

⁷⁴ 李筱峰，同註 10，頁 136。

⁷⁵ 另外一點很深的感觸是，在教育領域中一直崇尚西學研究，但往往沒有落實到台灣來，因而本土化的研究停滯不前。怎麼說呢？國內於 1990 年第一位研究 P. Freire，而拿到學

從上述可得到一個結論，即當時日人在殖民統治台灣時，欲將台灣「內地延長化」，所實施的六三法造成台灣知識份子的反動而有抗爭事件，因而連帶激起學生的參與，走出校園加入抗爭，這可說是政治方面影響學運的一大因素。

至於經濟方面對學運的影響，誠如前面所述，矢內原忠雄認為日本佔領台灣的最初 25 年間，統治的權力大部分放在經濟方面，對於教育並不重視。這種說法並不令人意外，畢竟統治者統治殖民地必定著眼於軍事、經濟等等的考量，這在當時全球的殖民國均是如此。

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一書有非常詳盡地描述到日本如何建設台灣、透過剝削台灣人，生產經濟的產品、勞力，進而增加日本政府國庫的收入。當時人民的教育程度不高，受到殖民者的剝削不知也無力抵抗，因此有句俗話說：「第一釐，種甘蔗乎會社磅」，一方面凸顯日本政府不合理的經濟剝削，另一方面卻也顯示人民的無奈。

在日本將資本主義引進台灣後，雖然使得台灣開始步入工業化的社會，

位論文的是王秋絨所著《弗雷勒批判的成人教學模式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1989)。Freire 為巴西人，當年教導鄉下農民識字，識字的目的乃是希望農民能夠吸收知識，並轉化思考而對社會作出批判，不再盲目屈服於統治者的腳下。近年來在台灣，Freire 學說的「critical pedagogy」，似乎成為顯學，不但有中譯本上市：方永泉譯(P. Freire 著)，《受壓迫者教育學》(高雄：麗文，2002)；甚至中正大學在 2003.12.9 成立弗雷勒研究中心：<http://www.ccunix.ccu.edu.tw/~coledu/chinese/index.htm> (2004.3.26)。近年來教育界學術圈為了「critical pedagogy」應翻成「批判教育學」或「批判教學論」，許多教授們為此還打筆戰。

但是當教育界大部分學者都在討論離我們相當非常遙遠的一位巴西成人教育學者的思想時，何不也來關心台灣也曾出現這樣一個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呢！這無關涉及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問題，筆者也不是在否定那些研究 Freire 的學者，但不會因為今天研究 Freire，就說台灣的學術多有全球化，而在談到台灣文化協會時就說眼光多麼狹隘。甚至還有人說教育學家是要研究 Freire 的，而文化協會則是留給歷史學家在研究的。這種說法不是很可笑嗎？

不過教育學界知道 Freire 而不知道文化協會的人的確佔大多數，這是不爭的事實，的確令人感慨。倒是聽過美國成立研究 J. Dewey 思想的學術機構 (Dewey 是美國人)，而對中正大學花大筆經費竟「跨過太平洋」(這個詞是筆者想要強調 Freire 為巴西人)，來成立研究 Freire 思想的中心感到不解。這對於研究台灣史的學者來說，近年來喊得漫天價響的「在地全球化」，說穿了多數的學者仍舊是披著「西化」的衣服來欺騙別人罷了。當我們以西方學者作為研究對象甚或奉為圭臬時，是否也應該想想，台灣過去的歷史當中是否也有可供作為省思、惕勵的人物或事跡呢？不能只以單純的歷史事件來看待而已，重要的是「身為台灣人，應知台灣事」！

但另一方面卻也造成台灣的階級化問題，包含台灣人內部階級的區隔，以及台灣人與日本人間的階級關係，所以台灣的階級問題是與民族的對立錯綜複雜的。⁷⁶也正因為如此，階級問題所引起的抗爭有兩條路線，前者 1907 年開始，由於資本家企業的勃興，乃使台灣人逐漸發揚民族的自覺自營之念，於是對於資本家遂有反抗運動發生；⁷⁷後者則使得近代的農民及勞動者的組合運動產生。⁷⁸

關於工農運動則在《警察沿革誌》中均有詳細記載，⁷⁹但回過頭來工農運動與學生運動間有何關連呢？原來，當時共產主義學說主張的是，勞工與農民能如 K. Marx 所言，起來打倒資本家、資本主義進而走向共產世界，此時又正逢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因此也訴求打倒日本這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罪魁禍首。共產主義不只號召工農民而已，也向青年、學生、婦女、甚至是兒童招手。在他們的報告書裡頭記載著：「台灣學生運動猶未振興，對島內學生運動更須加大努力。」⁸⁰因此學生有兩件事亟待加強：一、應在各地組織籌設聯合會、組織會，讓學生向心力加強，宣揚共產主義；二、學生組織應該和工農組成的讀書會多接觸，瞭解工農是如何遭到日本政府不合理的壓榨剝削，進而認同共產主義，與工農站在同一陣線。因此往後的工農運動組織的領導者或成員，有高學歷的文憑或運動中有學生參與，也就不足為奇了。

基於上述，可見經濟因素乃透過共產主義、工農運動而間接影響學生運動的發展。

⁷⁶ 同註 1，頁 84。

⁷⁷ 同註 1，頁 129。

⁷⁸ 同註 1，頁 97。矢內原忠雄解釋：「這種運動的形成，本身就是台灣資本主義化的證跡，又為其必然的產物。」當然這是從馬克思主義或左派觀點來看待工農運產生的背景與進程所作的推論。但是若從日本殖民台灣掌控經濟的背景去分析工農運的誕生與抗爭，顯然又是另一種解釋，因此筆者認為工農運的產生有其複雜的環境因素，不能從單方面作思考。

⁷⁹ 王乃信等譯註，《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4 冊》的第 6 章有詳細描述農民運動；而王乃信等譯註，《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5 冊》的第 7 章則是對於勞動運動有詳細記錄。根據史料來看，當時資本主義下的台灣，社會階級差異日漸擴大加上左翼思想的引進，使得工農運動蔓延開來，日本右翼親政府組織「皇道會」的政府報告書裡頭稱這是統治台灣目前的五大問題之一。詳見王乃信等譯註，《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5 冊》第 8 章：右翼運動，頁 21。

⁸⁰ 王乃信等譯註，《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3 冊》第 3 章：共產主義運動，頁 72。

第三節 風起雲湧的海內外學運

日治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的史料及書籍，包含：以《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第 1 冊：文化運動》為主，其餘 4 冊則約略提到；此外，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 年）》等，都有這方面的記載。本節分成台灣本島、日本東京、中國大陸三地，運用這些史料來分析當時的學生運動史。

壹、在台灣本島的學運

台灣本島的學生運動分成兩股支流：一方面是社會上的抗爭；另一方面則是校園內的抗議。

前述 1920 年秋天，台灣的第一位飛行家謝文達回到台灣做「鄉里飛行訪問」，開啓了台灣的學生運動。但是學生全面動員則是在 1921.10.17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後。文化協會與學生，尤其是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生有深厚的淵源，例如杜聰明、蔣渭水均是醫專畢業。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加入會員的各校學生整理成如表 2-1 所示。

當時合計共 279 人，約佔會員總數的 3 成，其後增至數倍，由這一事實可以知道學生對文化協會熱烈支持的程度了。⁸¹尤其是醫專學生在蔣渭水的影響下，長期成爲協會的中心勢力；台北師範學校學生能夠佔得這麼多數，則可視爲蔡培火係高等師範出身之影響。⁸²學生熱心參與文化協會的活動看在日本政府高層眼裡很不是滋味，深恐早晚會爆發學運。果不其然在隔年，

⁸¹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頁 367。

⁸² 同註 2，頁 302。

也就是 1922 年爆發師範院校的抗爭事件，於是政府藉機施壓，使得參與抗爭事件或相關連的學生被迫退出文化協會，事情才告一段落。

表 2-1 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加入會員的各校學生人數

學校名稱	人數
台北醫專	49
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後來的高等農林學校）	30
台北師範學校	136
台北工業學校	3
台中商業學校	61
總人數	279

資料來源：王詩琅譯註，《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 1 冊：文化運動》，頁 302。

回過頭來，1899 年台灣的民政局長後藤新平規劃之下，成立了「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即現今的台灣大學醫學院前身），所培育出的醫生成了文化運動最有力的人士，不管還是在學生階段、或是畢業後出了社會，均直接參與文化協會的事務、面對社會群眾，親自策劃、推動文化協會的各項事業。

林柏維同時也指出，文化協會的領導群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和海外留學生出身者居最多數，由此可以解釋，此乃台灣本島以出身醫學校為主的本土民族運動和海外留學生的民族運動相結合的表徵。⁸³

上述是社會上的抗爭（主要是學生參與文化協會的活動），至於校園內的抗議指的則是，發生在台灣當時各地的罷課事件。

由於在異族統治之下，學生受到不平等對待，因而起來抗爭。根據記載 1920 年代規模較大的計有：1920.11 台中商業學校罷課事件；1922.2 台北師

⁸³ 同註 11，頁 74。

範學校圍困警察事件；1922.3 台北第二工業學校罷課事件；1924.11 台北師範學校罷課、罷食事件；1925.4 台南師範學校退學事件；1926.10 台北商工學校罷課事件；1927.5 台中第一中學擾亂及罷課事件；1928.3 台南女子中學校罷課事件；1928.11 台中師範學校抗議教師侮辱事件。⁸⁴

從上述可看出師範院校的抗爭最為頻繁。茲以「1924.11 發生在台北師範學校罷課、罷食事件」為例來作說明，⁸⁵用以突顯出當時日台共學中，學校的緊張氣氛，以及台灣學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一、遠因：1922.2 台北師範學校圍困警察事件

1922.2.3，幾位北師的台灣學生，因為在路上行走時靠右（當時規定走路靠左），遭到巡查斥責。後來一名巡查到學校說明事情經過，不料被聞風而來的學生包圍在舍監室。後來經由總督府學務課長出面斡旋，學生才逐漸散去。

不料 2 月 4 日，共有 45 名學生遭到逮捕，並在 2.16、2.18 兩天，由檢察官提訊。事實上這 45 位學生，普遍是文化協會的會員，由此可知根本就是政府藉機為難文化協會。也由於這件事，總督府學務課強迫各校在學學生不准參加文化協會，導致 200 多位學生退出協會。這件事讓台灣學生非常不滿，對於日人更是仇視，成為 1924.11 罷課、罷食事件的遠因。

二、1924.11 台北師範學校罷課、罷食事件

台灣學生原本在學校就常受到欺凌，經過 1922.2 台北師範學校圍困警察事件之後，雙方更是劍拔弩張，校內衝突更是不斷。

1924.11，學校按照往例舉行寒假的修業旅行，但是校方採行日本學生的建議到宜蘭，卻漠視大多數台灣學生主張到南部的意見。過程當中一位叫許吉的學生因為說出：「我並不是有意反對學校命令，只是不願意服從舍監個人的命令而已！」因而被校方認定「態度不遜」。11 月 17 日旅行前一天，不料

⁸⁴ 吳文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8）：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頁 136。

⁸⁵ 台北師範學校兩次的學運事件參考自藍博洲，同註 13，頁 26-39。

許吉卻被校方處以退學，更被以武力驅逐出學校。

這件事驚動了全校學生，11月18日旅行當天，三年級台灣學生共123人，乾脆就不起床、也不參加旅行的活動。這當中由於志保田校長態度非常強硬，擺出強人姿態，造成四年級台灣學生居中斡旋失敗，於是乾脆加入罷課行列；趕來的學生家長也是委曲求全，替學生謝罪，同樣遭到校長拒絕，因而忿忿不平離開學校；校友也出面替學生講話，但校方仍然堅持嚴懲學生，於是一場茶壺裡的風暴，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最後校長逕行宣布全校停課。

當時文化協會成員蔣渭水等幹部也介入此一事件，在11月26日（停課最後一天）發電報給全校學生，要他們在學校尚未給予合理交代前，11月27日千萬不要回到學校上課。校方在11月28日，一方面將30名學生退學、64名學生停學，一方面告知其餘學生已經沒事了，要求隔天回來上課。但是誰都看得出這是校方在玩兩面手法，因此學生並沒有人回到學校。

這時校方只好施壓在這些學生的家長身上。12月2日學生家長在彰化召開會議，謀求解決之道。雖然會後推派家長代表在12月3日與志保田校長交涉，但是校長仍不改堅硬的立場。家長只好在12月4日轉向與內務局長、總務長官交涉，可能因為當天北師的台灣學生200多人發起絕食，總務長官於是答應會妥善處理這件事，到此事情才告一段落，學生也全數回校上課。

沒想到在12月28日被遭到停學的學生當中，居然有6名學生被校方強迫提出退學自願書，很明顯是校方的秋號算帳。當時家長只好再向校方、內務局長求情，校方竟認為1922年爆發第一次學生抗爭事件時，就是因為沒有人被退學，學生行徑才變得如此囂張，因此堅決將學生退學。最後結局如藍博洲所言：

此一空前的集體退學處分，雖然引來了輿論與學生家長的激烈抗爭，終因當年投考師範學校者多屬清寒家庭子弟，一身進退立刻影響家庭的未來生計，其餘學生及家長因而不得不隱忍一時。⁸⁶

這些學生後來在文協安排下到東京和中國大陸留學，學成歸國後，有不

⁸⁶ 同註13，頁38-39。

少日後也成爲台灣社會運動的戰將。

不只是北師如此而已，1927 年台中一中因爲學生與炊事長中村，爆發糾紛，最後擴大成爲校園內的罷課學潮，共有 60 多名學生被勒令退學、以及自願退學。藍博洲敘述：

這些被退學的學生及「自由退學」的學生，日後也都全部志願前往日本內地或中國大陸留學，成爲台灣社會運動的重要份子。而學校裡頭的其他學生，終於被校方的嚴厲處置所懾，一場學潮終於結束。⁸⁷

台中師範學校也發生類似抗爭事件。由於中師體操教員小山重郎，在校常因學生說台灣話，終於在 1928.11 爆發衝突。不同於以往，學生這次的抗議活動表現得很謹慎，因此也沒有學生受到退學處分。藍博洲認爲：

學生們的自我約束，可能還受到去歲（1927 年）台中一中事件中有近 40 名學生被勒令退學的悲劇性結局的心理影響。畢竟，當年的師範生大都家境清寒，生計壓力很大，顧慮自然不得不比一般中學生要多一點。⁸⁸

因此從北師、中師所發生的校園抗爭，導致學生被退學一事，一方面可看出當權者藉由師範學校本身的功能來強加控制學生，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師範院校生在從事學生運動時所面臨到的困境。

師範院校制度最早出現在德國，當時統治者認爲國家的國防安全靠的是軍事武器，而國家的心防則是必須靠師範院校制度培育出順從的教師，在學校中透過教育灌輸學生要保家衛國、效忠領袖。這一套制度的成功使得各國紛紛起而效尤，日本政府也希望皇民化政策也能夠透過學校教育實施，能更爲成功。此外師範教育還有一個特色、重點，就是培育教師的經費由國家支付，私人不准介入，且一旦畢業後分發到學校，工作有保障，因此吸引許多家境清寒的學生就讀。

⁸⁷ 同註 13，頁 74-75。

⁸⁸ 同註 13，頁 49。

當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進入師範院校就讀的學生通常還有背負一項使命，就是「改善家裡經濟狀況」。因此在「只要不妨礙到我的大好前程」這個前提之下，即使制度多麼不公平、外在社會有多麼不公義，這種狀況一般人都願意忍受的。有時還必須忍氣吞聲，尤有甚者，「拿人手長，吃人嘴軟」，還一度成爲威權者攻擊學運的幫兇、抓耙仔。瞭解到師範院校的起源與目的之後，就不難理解爲何後來「北醫」會比「北師」在學生運動當中，規模來得更大，影響也較更爲廣泛的原因了。但也正因爲如此，師範院校的學生敢站出來更是令人無限佩服（例如就讀北師畢業的簡吉，後來帶領農民運動與日本政府抗爭）。

貳、在日本東京的學運

至於海外的台灣留學生所發起的學運，下述則是分成日本東京和中國大陸兩地。

1922 年，台灣到日本留學的人數已達 2400 餘名，這些學生也成爲台人在日從事抗爭的最主要份子。在日本東京的台灣學生活躍的原因在前面已略微提到，但學生開始全面有組織性且大規模的動員，應該是始於 1920.1.11 新民會的成立。⁸⁹新民會的方針包含：一、爲增進台灣人的幸福，進行台灣統治的改革運動；二、爲廣爲宣傳吾人之主張，啓發島民，獲得同志，刊行機關雜誌；三、圖謀聯絡中國人同志。⁹⁰因而新民會往後則有幾項重大事蹟推動，包括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創辦《台灣青年》雜誌、協助台灣文化協會活動等。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最初因爲日本政府在台實施六三法，所以林獻堂等人發起「六三法撤廢運動」，當時林呈祿認爲不妥，因此整個請願活動主題改爲設置台灣議會。往後每一次的請願書的簽署及請願委員赴東京，宣傳運動都由學生們負責，對這請願運動擔任了重要的角色。⁹¹

⁸⁹ 1919 年成立的啓發會爲新民會的前身。

⁹⁰ 同註 2，頁 48。

⁹¹ 同註 2，頁 55。

若從「量」的角度來看，究竟有多少學生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連署呢？周婉窈指出，從表 2-2「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學生署名調查表」可看出學生參與人數逐漸減少，到最後三回已經沒有學生參加連署，她推測原因認為學生是運動初期的主力，第六回合以後，因為運動深入社會加上初期運動健將漸次學成，於是逐漸被社會人士所取代。⁹²

表 2-2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學生署名調查表

請願回數 地方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台	專門學校以上	71			36			82		5		
灣	中等學校以上	69			1		25	28						123
日 本	專門學校以上		75	70		52			38	10	13	3	6	267
	中等學校以上		72	76	13	17	95		1	2	1		2	279
	不 明		1			3								4
中 國	專門學校以上					1				1			2	4
	中等學校以上					9				2				11
專門學校以上合計		71	75	70	36	53		82	38	16	13	3	8	465
中等學校以上合計		69	73	76	14	29	120	28	1	4	1		2	417
每回學生連署合計		140	148	146	50	82	120	110	39	20	14	3	10	882
簽署總人數		178	512	278	71	230	768	1948	2375	2031	1905	1314	1382	18528

資料來源：依據王乃信等譯註，《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 2 冊：政治運動》，頁 28-29 整理而來。

- 1、第 13 回簽署總人數：2415 人、第 14 回簽署總人數：1773 人、第 15 回簽署總人數：1348 人，均無學生連署。因為版面關係，此 3 回不臚列出來。
- 2、原表格有些地方數字加總錯誤：日本中等學校以上合計一欄原為「280」

⁹²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 173。

應為「279」；第 2 回合中等學校以上合計原為「74」應為「73」，因此合計原為「418」應只有「417」。

由此表也可以看出，台灣的學生簽署在第一、四、六、七、九回合，日本的留學生則集中在第二至十二回合（第七回合除外）簽署，恰巧錯開，令人玩味。整體而言，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比起中國的台灣留學生、以及台灣的學生連署來的較為踴躍，但當時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有 2400 名左右，相形之下，每回簽署人數最多也只不過 148 名，似乎微不足道。對於這樣狀況，周婉窈認為在當時台灣總督府軟硬兼施、威脅利誘之下，不方便簽署，因此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所受到的支持及它的影響，恐怕不是以上的統計數目所能顯示的。⁹³所以若從「質」的角度來看，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在這方面仍有其一定貢獻。

誠如周婉窈所持的觀點，雖然學生充滿理想、熱忱與抱負，但日本政府使用親情等各種威脅利誘攻勢，無所不用其極；加上學生深怕一旦被貼標籤，恐怕將來工作難覓、前途飄渺。尤其師範學校更是被嚴密掌控，因此敢怒不敢言，最多也只能打從心裡支持，不敢公開表態。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事實上也有很多學生是站在「安心立命」的立場，意即「反正我只要過得好就好，我才不管外在環境如何」，「功利主義」的觀點在此表露無遺。⁹⁴

回過頭來，當時為了配合新民會的第二點方針，於是 1920.7.16 以蔡培火為主任的《台灣青年》雜誌就在日本誕生了。這份具有歷史意義的雜誌，成立時背後有則溫馨的小故事。

⁹³ 同註 48，頁 175。

⁹⁴ 筆者在史料蒐集與整理過程中發現，台灣從日治到解嚴後的學生運動，往往是由一群少數的人在參與，所以無法引起大波瀾，進而撼動整個社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多數人選擇沈默，寧願當「順從的綿羊」，而不願當「擇善固執的牛虻」。或許在威權體制之下，有身家財產擔憂之危，但是在今天享有充分言論自由、包容多元觀點、互相尊重的社會底下，多數人卻汲汲於自身的利益，尤其是現今的學生更是被稱為「對社會冷漠的世代」。尤有甚者，當起極權專制者的「打手」、「抓耙仔」，對那些站出來出聲的學生進行迫害、打壓，真的是患了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非常可悲。筆者在往後的內容當中也會相繼的提到，還盼能引發新生一代的反省。

話說 1920.1.11 新民會創立總會上，林仲澍、彭華英二人提議創辦雜誌，得到多數人贊同，但發刊費用顯難募集，因而延宕下來。3.6 蔡惠如前往北京前，在東京車站慷慨拿出 1500 金交給林呈祿，說：「你們可將此款充作創刊之費，雖是發刊一兩號亦定要實行云。」⁹⁵林呈祿等人深受感動，於是一份為台灣人發聲、記載台灣人抗日運動的報紙就這麼誕生了。⁹⁶

《台灣青年》在創刊不久後，便改名為《台灣》，同時為了讓台日兩地能互相呼應，台灣人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言論機關，1923.4.15 在日本東京另外創立了以大眾性白話文為內容的《台灣民報》，《台灣》則改為理論雜誌。因為《台灣民報》日漸發展，於是將《台灣》廢刊，集中全力到《台灣民報》去。1925.7.12《台灣民報》從原先的半月刊改為週刊（每星期日出刊），1926 年左右，發行量達到 2 萬份以上。1927.8.1 開始遷入台灣發行，1930.3 為了替發行日刊作準備，除了增資改組，也改名為《台灣新民報》，1932.4.15 正式在台灣發行日刊。⁹⁷

當時的《台灣民報》除為民喉舌之外，與學生的互動頻繁也是重點之一，從以下一篇社論，名為〈敬呈畢業生諸君〉中的一段話或許可以看出抗日人士對學生的期許：

台灣本是台灣住民的台灣，萬般的事業和施設，皆要以台灣住民為本位的，而且萬般的事情都要靠仗台灣民眾自身的力量去做，才會徹底才有誠意的。唉！台灣人的地位，全靠著諸君來挽回了！台灣教育的普及全賴諸君的努力了！台灣衛生界的改革全待諸君的指導了！台灣的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也在期待諸君的鼎力了！替台灣民眾向諸君

⁹⁵ 林呈祿，〈對蔡惠如氏平生的感言〉，《臺灣民報》第 262 號，1929.5.26（昭和四年），3 版。收於妻子匡主編，《臺灣民報（9）》（台北：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73）。

⁹⁶ 關於這一段，不只是林呈祿深受感動，如果當時在場者沒有一絲絲感動的話，真的是不配當作是人了！當時蔡惠如經商失敗，手頭非常拮据，但仍願意拿出一筆為數不少的錢出來，顯見他非常支持學生們的構想，也願意用行動來表達，而不居其功，令人感到動容。雖然一般在談到錢時總難免讓人覺得俗氣，但是一旦沒有錢，空有理想的窮學生們恐怕也只是坐困愁城吧！另一方面學生運動當中，若有人願意在背後支持，用具體行動表達，當他們最穩固的靠山，如此一來學運動要再繼續傳承下去機會才是比較大的，同時這些人也是值得我們敬重的。在近代台灣的學運中不乏這些人的存在，也讓學運得以在台灣社會上一波接著一波吹起，藉由論文的寫作，也希望這些感人事蹟能夠更廣為流傳，達到發人省思的效果。

⁹⁷ 整理自王詩琅譯註，同註 2，頁 54；李筱峰，同註 10，頁 142。

述幾句的希望，並祝諸君前途的健康和進步！⁹⁸

此外，當時留學生也常趁返回台灣之便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講演，除了讓老百姓能夠獲得外界的資訊之外，另一方面也讓他們培養了抗日的意識。

誠如張炎憲所言：「意識型態不同，導致分裂，是近代政治運動的一個特色。」⁹⁹ 後來共產主義思想傳到日本，使得學生在接觸到左翼思想之後也分成兩大派別。其中信奉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當時新民會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基調太過溫和，這些團體包含文運革新會、南盟會、留東同鄉會（前身為東寧學會），以及色彩最為鮮明的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當時為了搶奪社會科學研究部總會裡的主導權，激進派的研究部和溫和派的青年會兩方人馬槓上，雖在過程中雙方都各曾獲得過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權力，但在這一來一往之間無形之中卻也消耗掉台灣人團結的精力了。

參、在中國大陸的學運

在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也發起一連串的學生運動，有許多學生組織出現。當時在上海所成立的包括：上海台灣青年會（後來改組成「旅滬台灣同鄉會」）、台灣自治協會、平社、台韓同志會、與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在北京則是有北京台灣青年會的成立；閩南地方則有廈門尚志社、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等組織；南京則有中台同志會的成立；廣東則是成立了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¹⁰⁰

這些學運組織成立背後的推手則是蔡惠如等人。1920年蔡惠如參與完林獻堂在東京的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後，便到中國大陸各地去報告台灣留學生在東京的運動狀況。在這稍早之前，蔡惠如、林呈祿、彭華英等

⁹⁸ 〈敬呈畢業生諸君〉，《台灣民報》第51號（第3卷第11號），（大正14年）1925.4.11，1版。收於婁子匡主編，《臺灣民報（2）》（台北：東方文化書局復刊，1973）。

⁹⁹ 張炎憲，〈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收於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153。

¹⁰⁰ 詳見王詩琅譯註，同註2，第四節：在華青年學生的想運動，頁121-248。

人便與中國國民黨、朝鮮人革命團體時有接觸。上述的這些中國學生組織便在蔡惠如等人的推波助瀾之下，成立了讀書會（例如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讀書會）、發行雜誌（例如台灣革命青年團發行名為《台灣先鋒》雜誌）等多種刊物，其目的有二：一、譴責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種種不是；二、希望各地的民族運動能夠宣揚民族自決，打倒帝國主義，最後進而促使台灣獨立。

北京在 1921 年初期台灣留學生不超過 30 位，他們在 1922.1 組成「北京台灣青年會」，並與台灣的文化協會保持聯繫，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相當支持。由於謝廉清與謝文達的努力，大多數青年會員都傾向共產主義。¹⁰¹

至於廣州，1927 年國共分裂之前一直是國民黨的根據地，但也是共產主義最活躍的地方，這種情形可以說明為什麼台灣學生可以同時接受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1926 年年底北伐開始的幾個月後，中山大學校長戴季陶指導成立了「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1927.3，以聯合會成員為基礎，成立了「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成員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但出版《台灣先鋒》雜誌，並且都送回台灣。直到 1927.4，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展開鬥爭，一些左傾的學生同時也遭到日警逮捕，學運才被迫平息下來。¹⁰²

支持台灣獨立，也是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台灣學生努力的目標之一。1928.4.15 在上海所成立台灣共產黨，即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首宗目標。從以下這段文字便可看出當時對「台灣與中國」未來的看法：

中國關係將來的問題，我們祇確定一個原則，那就是：「中國不可能採取帝國主義政策，而以台灣作為殖民地。」根據這種原則，中台間未來的關係，由是完全決定。台灣解放成功之後，台灣所得到的，一在自決權。所謂自決權，就是使台灣成為如一個獨立自由的邦土之意，也是與台灣獨立無異。萬一因為種種關係，兩地民眾認為中台應成為聯邦，或有合併的可能時，則應依照台灣全體民眾自由決定，這種原則是我們確守不渝的。¹⁰³

¹⁰¹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台北：前衛，1989），頁 39。

¹⁰² 同註 57，頁 40。

¹⁰³ 同註 2，頁 204。這段話可看出當時在中國的台灣留學生，受到共產主義思想影響而支持「台灣獨立」或「台灣未來由台灣人民自決」。然而，令人莞爾、啼笑皆非的是，當年

第四節 日治時期的台灣學運：民族主義的延展¹⁰⁴

本節將日治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的歷程作一評析，說明這一時期學運的特點並加以批判。最後與當時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作一初步的對照比較。

壹、日治時期學運本質上為民族抗日的一環

日治時期台灣校園內所發生的抗爭，不外乎導因於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教師因種族歧視而產生言語或行為上的摩擦、衝突，進而擴大成為台灣學生集體抗議或罷課，但往往最後倒楣的還是台灣學生，多半被記過甚至退學。但是這樣的學運不斷發生，相形之下社會上兩個民族間的對立氣氛也隨之升高，甚至後來學生運動因為思想因素而與政治運動合流（例如學生受到社會主義影響，而加入共產黨），推動了整個抗日陣營的轉變，影響甚鉅，這也是本時期學運的特色。

陳新在分析日治時期的學運時，得到三項結論：

一、日據時期的台灣島內學生反抗事件，主要導因於對種族之間差別

這些人奮鬥的目標，今天變成台灣島內台獨人士的具體行動，或是 2004 年台灣總統大選一併舉行的「全民公投」時，竟遭到中國大陸當局表示不排除武力威脅的可能。不知道是人們比較健忘，容易忘記歷史，還是誠如 Hegel 所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任何教訓。」當年共產主義所致力達到的目標，如今卻被中國共產黨與台灣內部一些自翊為左派、隔海唱和的人，「以今非古」、無情打壓，讓筆者有種「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感慨！

¹⁰⁴ 這裡所指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如葉榮鐘在探討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時，所使用的「中華民族」、「中國人」這種意涵。相反地，筆者借用「民族主義」一詞指的是當台灣受到外國入侵、欺壓時，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抗爭、抵禦，在研究上算是「後設分析」。

待遇的不滿、與民族意識高漲後對日本教育當局的抗議。但學潮的發生多半是個案的、單獨的、片段的型態；並未形成組織串連或有具體理念訴求。其最大意義在顯示青年學生對異族統治政權心理上的不滿與行動上的抗爭。

二、留日台灣學生與中國台灣留學生有組織與思想意識的學生運動，充分顯示是時代潮流下的產物，接受著中國、日本、甚至世界思潮的訊息，而與時代同步。

三、由於處在異族統治的背景下，日據時期台灣的學生運動免不了成為整個抗日運動中的一支，並且難以排除與政治運動合流的必然性。青年們的熱忱、易感、理想與實踐性格，甚至是為抗日運動注入新血，帶動變化；形成相互影響、相互循環的關係。¹⁰⁵

因此若從林玉体對學運三個層次的分析，可看出最初學生的抗爭屬於第一、二層次，由於交雜著政治因素，加上外在環境一直無法作改變，正好世界潮流的思想引進，因此學生走出校外，學運跟政治運動合流，這時的學運已屬於第三層次了。

再者，以「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論述當時的學生運動，或許可以稱之為「台灣人的意識抬頭」。陳芳明認為：

台灣民族的存在，是在歷史的壓迫過程中塑造起來的。外來的侵略與威脅愈強烈的話，台灣民族意識就越鞏固。¹⁰⁶

施正鋒也說道：

台灣人意識的產生，主要是對於日本殖民與國民黨高壓統治的直接反彈。兩個外來政權的伎倆如出一轍，在政治壓迫的同時，採取強迫同化；在貶抑土著(native)文化的同時，否定其集體的自我認同感(self

¹⁰⁵ 陳新，〈日治時期台灣學生運動〉，《南方》11期（1987.9.1），頁32。

¹⁰⁶ 陳芳明，〈殖民地革命與台灣民族論--台灣共產黨的1928年綱領與1931年綱領〉，收於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1994），頁310。

identity)。民族的自尊往往就是在這種被壓抑的過程中孕育出來的，比如蕃薯仔精神、水牛精神，或者壓不扁的玫瑰花。¹⁰⁷

跟一般台灣人一樣，在遭受到殖民統治者不合理的壓迫時，如同學生在校受到日本人的欺凌、鄙視，群起的抗爭是可以想見的結果。因此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分析當時的學生運動，認為學運是民族抗日運動的一部份，其道理是在此的。

蘊含「民族主義」本質的學生運動，起至日治時期，終至 1970 年代的保釣運動。關於這部分的論述，留待第六章〈分析與結論〉再作深入探討。

貳、北醫與北師二者的發展

日治時期培育台灣菁英的兩所名校--台北醫學校和台北師範學校，戰後的發展則有明顯的不同，¹⁰⁸卻也決定了台灣近代高等教育學府的影響地位。

在日治時期的學運中，兩校參與學運的人數都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師範學校普遍都有一個特質，那就是學生家裡經濟多半都非常不好，選擇念師範院校除政府定期有零用金、不用繳交學雜費之外，畢業之後政府還會直接分發教職。在這些優惠之下，進入師院的學生其實也是背負著整個家裡的希望與寄託。因此在學運爆發之初，日本政府對抗北師學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威脅處以退學處分。一旦退學成立，基本上這個學生與他的家庭，幾乎就無後路可走了，因此久而久之，學生的壓力不只來自學校，同時還包括家裡。在

¹⁰⁷ 施正鋒，〈編者序：台灣民族主義的意義〉，收於施正鋒編，同註 64，頁 6-7。

¹⁰⁸ 台北醫學校後來併入帝國大學（台灣大學的前身）；至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前身則為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成立於臺北市，地址為臺北市，制學。於臺人舍制學學
1946年6月5日，就日舊校改大改大
和平高利等學校為一段
擴充立高利等學校為一段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成立於臺北市，制學。於臺人舍制學學
1955年6月5日，就日舊校改大改大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成立於臺北市，制學。於臺人舍制學學
1967年7月1日，就日舊校改大改大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成立於臺北市，制學。於臺人舍制學學

家裡長者的耳提面命之下，再怎麼多不公平，都必須忍耐。長久下來，師範院校的「保守」、「安定」風氣，就這樣型塑出來了。

不知是有樣學樣，還是國民黨政府深信，因為學生與共產黨往來密切，才會導致中國大陸淪陷。因此在來到台灣之後，對於師範院校進行嚴密控管，這部分不比日本政府來得差，在第 3 章所分析的四六事件會再詳述。因此在整部台灣近代學生運動史當中，師範院校學生的聲音事實上是非常弱的，即使在解嚴之後發生的野百合學運，所展現眾生喧嘩的聲音當中，師範生的聲音仍然是微弱的。¹⁰⁹

至於北醫部分，可以察覺出與北師有明顯的不同。北醫在日治時期就有很多學生、畢業後執業的醫生，從事抗日運動。戰後，國民黨政府來台，台大醫學院（前身為北醫）仍不改其問政、關心社會的作風。也就因為如此，北醫在學及畢業的學生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被國民黨政府抓去判刑、槍斃的人數，簡直無法勝數。

即便如此，台大醫學院對於「社會事」仍舊非常關心、積極參與。已過世的前台大醫學院院長，李鎮源教授（鑽研蛇毒世界級權威）生前也熱心參與廢除刑法 100 條，拖著年邁身軀與學生在外靜坐，精神令人感佩。

由此可知道，一所大學的校風型塑，是有其悠久的歷史。北醫後來改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改為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院的「入世精神」與台灣大學的「自由、開放」校風，相輔相成，終究使得台灣大學在近代史上，不管是作育人才、培育菁英，或是學生運動的發展，成為不可或缺的主角。

北醫和北師在日治時期的差異，到了戰後台大和師院爆發了四六事件，更是拉開了兩者的差距。雖然當時執政者極力整肅二校，但由於二位校長的做事態度、性格不一，使得兩校面臨到相同問題，但確有不太同的結果。如今在比較兩校的校風，會發現有所不同，這是歷史長期發展下來的結果。第

¹⁰⁹ 印象很深刻的是筆者在 1997 年進入高師大，當時解嚴正好 10 年，而且台灣歷經多次的選舉，社會早已呈現多元的聲音。但那時一些黨外活動，例如討論公投、核四案、國家正名等，往往學校教官或老師都會苦口婆心希望學生不要涉入其中，理由不外乎：活動與教育無關，學生不必太過雞婆；學生參與恐遭有心政治人物利用；學生應多花點時間在自己的課業上等似是而非的藉口。因此對於師範生在這部分的缺席其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何提高師範生更能走出校園，關心社會、國家大事，不再是「冷漠的草莓族」，這會是更有迫切性的課題。

三章所分析的四六事件，或許會更一目了然。

參、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學潮/學運

從 19 世紀末葉到 20 世紀中葉，中國的學生運動比較受到注意的，大約有四個時期，包括：辛亥時期、五四時期、抗戰前期、及戰後時期。其中，呂芳上針對「後五四時期」：五四之後到北伐之前（1919-1929）的學運，進行研究。¹¹⁰

呂認為：

五四運動之前的風潮，重心全在學校的校園裡頭，風潮的範圍也限於學校內部的校長、教職員，課堂或餐廳，風潮結束，往往學生的活躍份子記過或開除，校長、教職員或留或去，校園又重歸平靜。……。五四運動是以學校為中心而擴散到政治與社會的運動，從此之後，在民族主義的思潮下，學生的政治意識已大為高漲。……。到了五卅運動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五卅運動是具有社會革命性質的民族主義運動，學校的學生雖仍是主要的活動份子，但領導和中心的理念則深具勞動者的意識。從此之後學生運動的重心幾乎全移到學校以外，學校風潮大抵受校外政治社會勢力的指導和推動，也就是說五卅以後的學運、學潮，明顯的變成了革命潮流的一部份。……。民國十三、四年的學運有了從「學生運動」轉變為「運動學生」的明顯趨勢。政治在學界影響的深化，政黨各自在學運中取得不同程度的經驗和教訓，而學術界、教育界受到政治的干擾，學術獨立受到考驗，校園也長久難於得到安寧。¹¹¹

¹¹⁰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呂芳上引用白蕉的話指出：

學運是對於國家社會以群眾利益為出發點，於當時及以後有巨大影響的一種含有革命性的學生運動，學潮是指學校內部鬧的風潮，不論他的背景與結果如何，直接在學生本身絕對是無益有害，間接於國家社會學校有巨大的損失。

詳見頁 1-2。呂在書中內容則是兼及學運與學潮兩方面。

¹¹¹ 同註 67，頁 3-4。

他將時間斷限分成四個時期：五四式學運時期（1919-1922）、學界與北京政府對抗加劇時期（1923-1924）、政黨運動學生時期（1924-1927）、學運消沈與中挫時期（1927-1929）。

第一階段所謂五四式的學運，大體是偏重於力爭外交權益，另外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含有「解放」與「改造」的本質，學生受此感染，也開始對學校校務產生興趣。第二階段學生所關心的問題延伸到了國家內政上，使得教育當局爲了「整頓學風」，不免對學校時加苛責，導致後來學生與北京政府決裂。第三階段則由於中國各派政治勢力興起，吸收青年學生爲黨員，致使「學生參加政治」、「學生入黨」成爲風潮，學生組織與團體開始受到黨派的注意，政黨動員學生成爲這時期的特色。第四階段因爲學生運動涉入政治太深，被譏爲「中政治毒」，讀書變成「課外作業」，更因政派爭執而導致內鬥分裂。1928.8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在中國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提案取消青年活動，1929.10 中央訓練部命令學生總會停止活動，這一時期的學運也因此告一段落。¹¹²

由呂芳上的研究得出，當時中國的學運，受到國家的內政、外交問題，以及政治鬥爭而興起。除此之外，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則與這些因素交雜著影響學潮，而五四之後的學運，對於中國的影響，則是更爲全面性的。¹¹³

將中國與台灣同時期的學運比較可以得出：

- 一、中國大陸當時局勢是動盪不安的，台灣則是受到日本殖民統治。
- 二、中國大陸的學運是全面性的，包含內政、外交層面，而台灣的學運則是屬於校園內族群衝突，以及想要擺脫日本統治這兩層面。
- 三、中國大陸與台灣當時的學運則都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並且學運均涉入政治面（中國的學運是分國民黨、共產黨兩邊站；台灣的學運主要是脫離文協，改走激進路線）。

¹¹² 同註 67，頁 27-30。

¹¹³ 楊默夫編譯（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1981），頁 398-400。

四、中國大陸的學運對當時的政經環境有一定的影響，然而當時受到日本統治的台灣所引發的學運，不管是校園內的抗爭或是學生參與社會上的抗日運動組織，所帶來的影響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必須提出來說明的是，受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吹進東方的影響，連帶當時各地學運互相交流，而非各自獨立運作。這在前述分析台灣的學運時，雖分成台灣本島、日本東京、中國大陸三地，但彼此之間卻互相影響，尤其台灣的學運也深受中國大陸方面的學潮所影響，這是必須再次重申的地方。

第三章 時代更迭下的悲劇-- 1940 年代的四六事件

※麥浪、麥浪、麥成浪，救苦，救難，救飢荒。

----楊逵歡迎麥浪歌詠隊至台中公演而興詩

194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可以當時發生在台大、師院的四六事件為代表來加以說明。研究這時期的學生運動，必須探討的是：在日本殖民政府撤退離台，而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失利撤退來台，兩個政權更迭的同時，台灣的人民如何度過這動盪不安的年代？台灣人如何徘徊在「日本人」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之間？學生運動又如何在這兩個政權更迭之下發展，以及學運所關心的焦點為何？本章試圖解答這些問題。

第一節 斷裂的 1930 年代，「消失」的學運

上一章所探討關於日治時期的台灣學運，何以在 1920 年代末期逐漸消逝呢？解答此一問題，則必須釐清 1930 年代的時空背景，因為該背景的探討，將有助於分析 1940 年代的學運發展關連，並建立較為一貫的歷史脈絡。

壹、從蔣渭水的一篇文章說起

蔣渭水在 1927 年（昭和 2 年）曾寫了一篇名為〈今年之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文章，內容如下：

……惟是一般同胞，尚未十分曉悟這個道理。設使我臺四百萬同胞，個個都能覺醒團結起來，那就無論有多麼大的魔力，我們都可以抵制他，那末吾人便不患環境魔力之強大，而所患者惟吾人不能團結哩。所以我敢斷言：團結是我們唯一的利器，是我們求幸福脫苦難的門徑。團結之力量如此之絕大，而本來持有團結之本能的人類——吾們四百萬同胞，竟不能利用這個團結之力來求幸福，真是我們台灣人之恥辱呀！故我不得不再大呼特喊：「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¹¹⁴

單從這篇文章表面所看到的是，蔣渭水呼籲大家要團結起來抵抗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但是若去細究，便不難發現當時的抗日陣線事實上已趨近分裂。蔣氏就是體認出有此種危機，才迫切的要求同志須團結。

最初文化協會成立之時，學生們對於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是寄予厚望的，也認為在他們的帶領之下會出頭天，政府當局雖不願但也不會強加禁止，除非是太過「煽動」的行爲（例如在演講場合上痛罵日本政府等）。也就因為這樣，初期加入文化協會的學生成員相當的多。

但自從諸多學校校內發生學生抗爭事件之後（詳見第二章所述），政府當局強烈要求文化協會不准收受學生為會員，因此學生只好另起爐灶。另外一方面，由於文化協會長期以來所走的溫和路線，造成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每回都吃閉門羹，使得學生認為「台灣人出頭天」的機會遙遙無期；此外很多學生接受的共產主義走的是激進革命路線；加上台、日學生在學校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仍持續存在，因此更激烈的抗爭也油然而生。

例如 1924 年台北師範學校學生許吉要求校方改變旅行地方而遭到退學，

¹¹⁴ 蔣渭水，〈今年之口號「同胞須團結 團結真有力」〉，《台灣民報》第 138 號，1927.1.2（昭和二年），11-12 版。收於婁子匡主編，《臺灣民報（5）》（台北：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73）。

校內台生遂全面罷課。初期學生曾對社會發表關於事件之〈內容腐敗之實情〉、〈吾人之決意〉二文，但卻遭到報紙與雜誌社封殺。〈吾〉一文主張：

吾人此次之所為乃正義之道也，吾人促求當局迅速改革學校之根本方針，倘若不改變方針，雖死亦不回校，使當局有所覺察本島之將來，而解決此件，希望志保田校長及無資格之教官一齊知恥，引咎辭職。¹¹⁵

〈內〉一文更是將校內台生在校內所受到的不平等對待分成 4 段 36 項，仔細閱讀過後，筆者對於校方作法感到非常憤慨。除了同情台生之外，對於台生激烈的罷課作法，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了：

第一為「校長及教師對學生干涉事件」----

- 甲、校長常抱威嚇態度，若生徒之服裝形式上稍有缺陷，便大聲辱罵叱責，是故學生一見學長如遇無常即跑開逃避；
- 乙、無考慮學生之將來，僅注重形式，制限讀書，例如太陽，中央公論皆被禁止，讀書及一般書籍（參考書以外）如非經許可斷不准閱讀；
- 丙、一學期中有數回檢查學生之所有物，甚至搜索學生衣囊；
- 丁、學生病臨危時不許歸省及入院療養，學生遇此難關以致死亡已有數名，如吳丙龍致死於車中，如詹漢基方入院即告死亡；
- 戊、學生有過失時指導改悛為當然，而先生則視學生如囚人；
- 己、對於無罪科之學生視為現行犯人，常對其灑潑墨水。

第二為「內臺學生之差別事件」----

- 甲、對於新入生之待遇，若為內地（日本人）學生則給與新鮮寢具及其他用具，本島生（臺灣人）則不如此；
- 乙、內臺學生之間發生事件，校長及教師全體皆代內地生辯解，並作有利之處置；
- 丙、忘卻共學精神，自修室與授課室居在一起，但寢室反而有別；
- 丁、對於低級學生皆置室長（四年本島生），然而低級內地生不以四年

¹¹⁵ 連溫卿著（翁佳音、張炎憲編校），《台灣政治運動史》（原題「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台北：稻鄉，1988），頁 310。

- 生（臺灣人上級生）為室長；
- 戊、寢室之分配順序不循學生學級之次序，只以內地生為一處；
- 己、使內地生接受有實力學校畢業之最好教官授課指導，對於臺灣人則以無資格無實力之人任為教師；
- 壬、先生與內地學生之間真如父子，與本島生之間則冷落恆常疏遠，無任何親切慈愛，因此師徒間意思甚有阻隔。

其中關於父兄及社會事件所述如下：

- （一）內臺生父兄訪問學校之際，舍監招待內地生家長至舍監室優遇之，以求其滿足，對本島生父兄則放置於面會室，使小使守衛（日本人工友）接待之，極為冷淡，所以我儕父兄不平不滿，不願來校，常有嫌惡感想；
- （二）不信任家長，雖有疾病危篤之電報到，舍監不信為真，則謂：「你父親不會如此快死，果若死我到你家賠不是」，其語非先生所應言，實有非人情之口吻；
- （三）有自南部父兄來北，我儕要出去會晤，甚不容易，舍監並不信任我儕之說，對我儕說：「你父兄若到學校就可以得見」，豈有如此不懇切者；
- （四）教師在教授上常有輕蔑本島人之風俗習慣，及反對本島人之人格並加以侮辱嘲笑，真令人難堪。

第三為教授方面事件----

- 甲、因所聘請教師都為無資格無學識之教師，致受我儕質問不能回答時，常臉紅耳赤說：「待我調查後，再教給你們」；
- 乙、僅依教科書教授，使學生讀解，不過為依樣畫葫蘆聊將充塞責任，徒費時間而已，失卻讀書光陰，實為不忠實之教師也；
- 丙、因注意練習口音（五十音發音練習），以致不能兼顧充實內容，徒費許多時間，誠可惜也；
- 丁、教授上常指摘學生日常生活之問題以為冷笑；
- 戊、教師只用點數壓迫學生，無實心教授指導之。

第四為「校長對職員間之事件」----

- 甲、校長甚寵愛善諂媚之教師，而且亂放權利假，若有資格，有學問之教師不合校長之意者，被校長常常以卑劣言語叱責之，甚至勸告其辭職；
- 乙、在生徒面前校長大聲叱責侮辱職員，又有嘲笑以前校長；
- 丙、若教師與生徒親密之時，校長對此會懷抱疑心，一直怒責教員，希望教師與學生有所阻隔；
- 丁、欲循守正義人道之教師對校長稍有感情衝突時，即受勸告辭職，因此益增添無資格無學識之教師；
- 戊、對於校長不相干之教師言行，校長亦要干涉亂用權利，擴行形式，只可稱為官僚式校長主義；
- 己、依我儕觀之，校長之對其職員宛如對小使（工友），或給仕（工友）相同，此為太刻薄性質方能表現焉。

第五為「關於偏重形式內容不充實事件」----

- 甲、例如上官巡視學校及學察時並無珍惜重要教授時間，使我儕大掃除；
- 乙、投鉅大金錢設幼稚並無內容之學級文庫，使學生於一週間要念一冊，念完後又要提出感想文以誇示於外界，此為校長之強制，壓迫以至今日；
- 丙、學生之散步區域本屬狹隘，校長不管之，形式上不使在校門附近散步，制定散步區域束縛之，令人悲痛；
- 丁、忘卻運動精神若今回之競爭不能得勝利者不許參加競技；
- 戊、校長平常假裝有資格有學識，其實絲毫都無，例如炊事夫、校庭丁、小使、給仕等雖無過失，校長亦叱責毆打之；
- 己、命令校長不在之時對校長室亦要敬禮（經數次嚴命），假若無行禮就為背犯規則，若為校長目睹者便被毆打叱責固不待言，或命令歸省謹慎，或禁止外出，此種必置令人難服。¹¹⁶

從上述諸多學校內差別待遇的行徑來探討，若以教育社會學所談「教育機會均等」概念來看，一開始台、日生的立足點就不平等，加上教育過程中所外加的不平等，如此根本毫無公平、正義可言，怎能稱為「教育」呢！再以教育哲學所談的「教育愛」來看，一位教育人員對其學生不懂得要用愛與

¹¹⁶ 同註 2，頁 310-313。

關懷，一再打罵與叱責。誠如 St. Augustine 在 72 歲時，有人問他願意等死還是返回童年生活，這位大神父說他寧願選擇前者，因為學校嚴苛的體罰常使得人長大後回想起來仍餘悸猶存。¹¹⁷而「書越念越呆」的情況下，那麼接受教

育的目的又為何呢？¹¹⁸

因此也不難理解，憤慨的學生在接受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之後，會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同時也與採取溫和派主張的人士漸行漸遠，最後取得了主導文化協會的主導權，也宣告文化協會的分裂。¹¹⁹

上述已提到，一開始文協的行動看在政府高層眼裡雖是不滿，但只要不過份逾越，當局並不會使用武力鎮壓，畢竟日本仍是個講求法律的國家。但後來當抗日運動逐漸走向激烈之時，政府也不得不使用強硬的手段大規模逮捕台人，加上此時抗日運動勢力的分裂，日人趁機從中分化，再加以一一擊破。

進入 1930 年代，隨著日本等國殖民野心、帝國主義的擴張，整個世界局勢動盪不安，終於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日本對於其殖民地——臺灣，管制日趨嚴格，全面取締抗日運動，迫使學運必須轉至地下，最後只剩零星小規模的持續抗爭。

貳、日治末期的左翼學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日本對台灣的政策也有所調整，其中教育政策走向「軍國民主義」及實施「皇民化運動」：效忠天皇，即使犧牲性命也在

¹¹⁷ 引自林玉体，《西洋教育史》（台北：文景，1980），頁 71。

¹¹⁸ 矢內原忠雄似乎替我們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臺灣教育的現狀，歸根到底，是在確保日本人的支配地位。周憲文譯（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1985），頁 153。

¹¹⁹ 文化協會分裂的原因非常多，非上述所言而已。而張炎憲也認為意識型態不同，導致分裂，是近代政治運動的一個特色。張炎憲，〈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收於張炎憲、李

筱峰、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 153。

所不惜；台灣人要徹底同化成爲「皇國民」。在這樣情況之下學校的教育已淪爲御用的工具，成爲「灌輸」、「洗腦」的場所，學生也僅只能當「順從的子民」，如此一來 1920 年代台灣所出現的學生運動在 1930 年代爲何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也就不難想像了。

在吳濁流的著作《臺灣連翹》、《無花果》均有敘述當時的教育狀況。在《無》一書中有幾段文字值得細讀：

首先，他們想撲滅中國的色彩。寺廟廢止，禁穿臺灣服，禁用臺語等命令相繼頒布，這是全面否定臺灣人的傳統，藉此灌輸日本精神。家家戶戶都被迫奉祀「大麻」，說的必需是日本語，並以「滅私報國」的口號，讓臺灣人從事「勤勞奉仕」。尤其青年，開始被強制動員。

……。臺灣的為政者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把台灣人驅向戰場。另一方面向青少年們鼓吹對中國的憎恨與敵愾心，把公學校畢業生全部納入青年團的組織，加以訓練。……

這訓練每週舉辦一天，上午，以軍事教練為主，配以訓話，講那一套日本精神、國體明徵、大義名分等，下午則從事勞動奉仕。訓練都是軍隊式，天天都毆打喝叱，教員室成了刑事審問室。不難看出，有的人祇是被無謂的憎惡感驅使著，向青年們施凌虐。

這種情形不久便影響到學校教育，那種殺伐野蠻的作風也肆虐到純真的兒童們身上，體罰雷厲風行。¹²⁰

無怪乎吳濁流會說了這麼一句重話：「特別是在這種戰時，教育根本就不像教育，與狼狗訓練差不了多少。」¹²¹多半學生則是敢怒不敢言，逆來順受，但有幾個學生竟敢站出來與校方爭論。例如鍾里義在回憶大哥鍾和鳴（鍾和鳴、鍾里義與作家鍾理和爲同父異母的三兄弟）年輕時在學校情形，有這段描述：

¹²⁰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1995），頁 81-82。

¹²¹ 同註 7，頁 90。

在雄中時，和鳴依舊喜歡和日籍老師辯論，那些日本人常常被他質問得無力回答。那時候，和鳴已經在偷偷閱讀《三民主義》了。有一回，和鳴在課堂上偷閱大陸作家的作品，被老師當場抓到而遭到辱罵，但和鳴亦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辯護道：「作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中文書。」

日籍老師惱羞成怒，舉鞭抽打和鳴並大罵道：「無禮！清國奴！」

和鳴不堪其辱罵，隨手抓起桌上的書，擲向那日籍老師。事後，校方通知家長到校約談；但父親並不理會日本人，於是就由里虎兄前去。到了學校，里虎兄直截了當地告訴校方管理人員說：「子弟既然送給學校教育了，好、壞都是學校的事，與我家無關。」¹²²

所以還是有部分學生敢跟校方反抗的。回過頭來，在 1936 年中日爆發戰爭到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這段期間，若要嚴格論斷的話，仍是有零星的學生運動。這些學運的性質乃因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學生不滿日本政府，因而作出抗爭。

其中包含：1936 年起的台北二中學生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林水旺等學生籌組抗日組織、毆打日本人，所謂的「台北二中青年思漢事件」；1944 年起的醫生謝娥與台北二中唐志堂、陳炳基、郭宗清、黃雨生、劉欽琅，台北工業學校劉英昌、傅來會，兩校共 7 名學生預謀反日，稱為「謝娥反日事件」；1942 年起的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生蔡忠恕、郭琇琮與其他高校近千人因密謀反日而遭到逮捕，稱為「台北帝大蔡忠恕反日事件」；1943 年起的台北經濟專門學校的學生雷燦南與其他人密謀要到大陸參加抗戰，不幸被日人所補，稱為「台北商校雷燦南抗日事件」。¹²³

然以上四件臺灣抗日學運，學生乃因不滿日本政府殖民統治台灣，因而群起所作的反抗。對於藍博洲在書中所言：「因為這些學運事件使得這些組織分散、不同學校的學生提供了擴大串連與團結的機會。」¹²⁴此種論點，還算

¹²²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1991），頁 56。

¹²³ 以上四件學生抗日運動細節請見藍博洲編著，《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 年）》（台北：時報，1993），頁 370-383。

¹²⁴ 同註 10，頁 383。

持平，但是他的另一句話，則大可商榷：

終戰後，這些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再度以郭琇琮為中心集結起來，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陣營，為台灣的在解放與中國的統一而奉獻、犧牲！¹²⁵

畢竟這些人戰後已不再是學生身份，而且當時的抗日學運當中也並非完全贊同台灣與中國統一，重要的是「左翼史觀」並不同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¹²⁶

第二節 政權更迭下的教育背景

上一節探討 1930-1945 年當時的教育狀況，以及學運發展。本節則接續探討日本政府在戰敗退出台灣、國民黨政府接收的 1945 年，直到國民黨政府 1949 年在中國大陸戰敗來台，這 4 年間的社會情勢與教育狀況，作為下一節分析「四六事件」時，有更為清楚的概念。

壹、政治及社會情勢

在日本政府統治，積極實施同化政策之下，為何台灣人在日本政府撤走之後竟會歡欣鼓舞要迎接國民黨的到來呢？莫非日本統治 50 年，甚至到後來

¹²⁵ 同註 10，頁 383。

¹²⁶ 陳芳明認為台灣由於島內思想與言論尺度的放寬，台灣的統派學者終於不再掩飾他們對北京政權的靠攏。在教條的政治信仰指導下，他們也採取一種貌似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台灣歷史。基本上，在這方面的研究，「統」的味道遠遠超過「左」的精神，政治氣息則高高凌駕於學術訓練之上。詳見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1998），頁 17。

幾年的皇民化運動，都無法使台灣人認同自己是日本人，因而協助日本抵抗中國。日本的認同教育真的是失敗的嗎？

箇中原因當然很多，但從以下這段客觀的文字分析或許可以解答不少的疑問：

我們有足夠的證據相信，在台灣的殖民期間，大多數的台灣鄉紳及菁英分子，是相當認同日本人的世界觀的。然而，我們也不能一口咬定，在他們心中，日本文化已經全部取代了中國文化。台灣人仍然繼續接受中國傳統的習俗，尤其在尊崇父系家譜和祖先敬拜上更為忠誠。有些人甚至於專志於中國語文的學習，以及歷史文化的鑽研。何況，日人對於台灣人並沒有以同等地位相待，而且也拒絕授予台灣人較多的政治實權之舉，心中不無怨懣之情。他們對中國的愛國心，當初表現在反抗日本殖民者身上，雖然因為日人長期不斷的統治而消匿了，但是從他們對國民政府光復台灣一事的欣喜來看，他們對中國的愛國熱情，並沒有消失殆盡。¹²⁷

因此當時全島的人舉國歡騰迎接「回歸祖國」、祖國的軍隊到來。但是在基隆的港口，卻是看到令人震懾的畫面：

看到陳儀的跟班、隨從與破陋士兵時，台灣人簡直不知道如何去辨認這群無可形容的人物之奇異結合。他們幾乎呆住了，只能喊出事先想好的口號：「高興重回祖國，歡迎你們協助我們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人很快就知道這些新來征服者的權力是多麼巨大而全面，以致他們來後不到數個月，台灣人的命運就幾乎全部改寫了。失去的是島上生活的穩定，是社會的結構與組織；失去的也是超過一半以上庫存的武器、機械、穀物、衣服、化學品、鹽、糖等等。¹²⁸

也難怪原本寄予高度期望的台灣人，在看到眼前陳儀與他的軍隊這副模樣時，驚訝的不知如何說才好。接下來的幾個月，陳儀所領導的政權不僅無

¹²⁷ 羅珞珈譯（賴澤涵、馬若孟（R. H. Myers）、魏萼著），《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台北：時報，1993），頁 79-80。

¹²⁸ 林宗義，〈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收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北：前衛，1989），頁 34。

法符合台灣人的期待，而且還為非作歹，張旭成便歸納了三點：

- 一、殖民地統治的延續：陳儀被派任為行政長官，卻將行政、立法、司法等大權攬於一身；不但在重要公、教人員任用方面不信任和排斥本省人才，他還留用了不少日本官員，繼續讓他們佔據重要位置；接著又藉故拖延地方自治選舉，導致台灣人心生反感。
- 二、「專賣」、掠奪，與民爭利的經濟體制與政策：陳儀和他的屬下實行專賣制，設立專賣局和貿易局等機構以掠奪資源，控制貿易和其他經濟活動；佔據很多壟斷性的公營事業，和從台人手中徵收的國有土地和其他財產，如此一來讓企業家（本省人）非常不滿。
- 三、貪污、腐敗和無能的政府：陳儀和他的屬下貪污弄墨、大飽私囊，部下不但官商勾結，還幹起走私活動；因公共衛生工作不重視，導致台灣也流行起鼠疫、霍亂等病疫；加上到處搜刮人民財產、大量安插大陸來的難民到公營事業上，導致接收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整個台灣社會的經濟出現危機、大量台灣人失業。¹²⁹

人總是會「比較」的。雖然日本政府是在「殖民統治」台灣，但畢竟日本還是個講求法治的國家，行政效率高、官吏貪污少，重點是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生活也較安定；相較之下，陳儀與其行政團隊根本就是在「剝削」台灣，而且還帶來了「走後門」、「賄賂」等官場陋行，不禁讓台灣人懷念起當時日本的統治。也因此，台灣人從戰後對祖國的想像，可說是滿懷熱望，然後逐漸冷卻，轉而失望。¹³⁰在這樣忍無可忍、無處發洩情緒的情況之下，加上 1947.2.28 取締私煙意外地擦槍走火，終於爆發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衝突——二二八事件。

根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從口述歷史資料及文獻檔案分析，大體來說二二

¹²⁹ 張旭成，〈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響〉，收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頁 114-117。

¹³⁰ 台大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台大「四六」事件考察——四六事件資料小組總結報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7），頁 24。

八事件約略分成以下幾個方面：

- 一、就「政治」方面來說：根據受訪耆老的口述，以及學者的研究，大略可歸納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置的不當」、「大陸人士壟斷權位」、「外國勢力的介入」、「受日人宣傳的誤導」、「接收人員的優越感」、「共產黨的煽動」、「官員的貪污腐化」等多項因素。
- 二、就「經濟」方面來說：根據受訪耆老的口述，以及學者的研究，大略可歸納為「糧食缺乏」、「通貨膨脹」、「金融市場的獨佔與壟斷」、「失業率嚴重」、「生產指數低微」、「日產處理不當」、「專賣制度」……等，是引發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因素。
- 三、就「社會」方面來說：「語言的隔閡」，是最直接的問題，其次，「台籍原日本兵看不起國軍」、「軍警人員的擾亂治安」、「失業者沒有出路」……等因素，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 四、就「文化」方面來說：台省同胞與內地同胞，在相隔 50 年後，彼此在觀念想法上有若干程度之差距，如語言、器物使用之認識、商品議價的認同等均有某種程度的差距，以致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 五、就「軍事」方面來說：據受訪者及學者，皆對光復初期來台接收之國軍部隊之儀容、紀律、裝備頗有微詞。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陳儀以台灣無顧慮為由，調六十二軍及七十軍開赴華北作戰，以及國軍未能好好發掘日人埋藏於地下之武器、物資，都是後來事件迅速擴大的重要因素。¹³¹

因此若從這幾個角度來看，當時台灣是處於一個非常動盪不安、政權非常腐敗的一個社會，任何衝突只要插槍走火，就有可能星火燎原似地立刻擴散開來，1947.2.28 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如此，1949.4.6 發生的四六事件亦復如此。

¹³¹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9-51。

貳、教育情況

戰後初期，由於日人尚未全面撤走，台灣又湧進許多外省人，使得台灣人、外省人、日本人一起生活在台灣，此種現象會不會造成彼此之間的隔閡，進而產生重大的衝突。

張旭成回憶道：

1945年10月，筆者已是小學三年級學生，當時在學校與同學牙牙學「北京話」，練習國歌，參加慶祝光復，歡迎祖國來台軍民等各種活動情況，記憶猶新，並沒有排斥外省人的心態。¹³²

可見台人當時應是抱持歡迎、好奇、願意接受的學習態度，並沒有對這「外來政權」充滿敵意。

當年就讀台大的許嘉瑩在接受訪談時，談到四六事件也回憶道：

傅校長對於不在警總欲擬名單上而被拘捕、但後來審訊後飭回的學生相當照顧。「叫我們去校長室，一人給我們一百塊，帶我們去吃麵線，說：『你們台籍學生，台北隨便找也可以住，所以宿舍都給大陸流亡過來的第一優先，你們暫時忍耐，宿舍我漸漸蓋……』」¹³³

這段話除了一方面看到傅斯年校長展現教育家的大愛精神，如父母般苛護學生，不因省籍而異之外；另一方面台籍同學也願意配合將宿舍禮讓給流亡到台灣的大陸籍同學，從理解、同情到配合，充分展現一位讀書人應有的風範。值得一提的是，四六事件發生時遭到逮捕的學生當中，台籍與大陸籍的學生都有，顯見學生之間應無互相歧視的現象存在。

但在社會上，一般人的情況也許不是如此。林正盛所執導的電影〈天馬

¹³² 同註 16，頁 114。

¹³³ 同註 17，頁 46。

茶房〉，裡頭有幾幕劇情可見端倪：

軍官身份的小寶一進入天馬茶房，女服務生脫口而出：「いらっしやいませ（歡迎光臨）」，小寶立刻瞪了他一眼。

小寶和六叔在談論事情時，大人因為隔天就要回京都，因此來茶房向天馬先生道別。正巧天馬先生人不在，因此大人如往常點了一杯無糖咖啡。服務生說：「能再為大人煮咖啡，我很榮幸。（日語）」

因為大人和有西用日語交談，使得隔壁桌的小寶非常憤怒，剛開始大喊：「不要說日本話。」但在六叔勸阻之下，還是站起來，同時拉扯大人，大吼：「滾（上海話）」、「混蛋（日語）」。跟大人同桌的有西，則擋著小寶，說：「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台語）」剛好進來店裡的阿進，見狀也擋著小寶，說：「長官，這是人家店裡耶。（普通話）」小寶推開有西和阿進，大叫：「你們好大膽子敢包庇日本人。（上海話）」阿進回說：「日本人就不是人啊！（普通話）」小寶此時掏出手槍比著阿進，喊：「日本人真不是人，日本人不把我們當人看，我把他們當人看。（上海話）」

當時來到台灣的大陸人非常痛恨日本人，所以看到台灣人有時還護著日本人時，一種厭惡台灣人的心態便油然而生。但台灣人其實是抱持著一種「同情」的心態對日本人（因日本戰敗），並不是認同自己是日本人。從天馬先生即使跟大人如此要好，卻始終不願加入「皇民化奉公會」這段對話，便可看出一些端倪。因此在校園中學生沒有因為省籍而互相歧視，也算是一種幸運吧！

另一方面則是探討當時大學生在學校的生活經濟情況。當時台灣已有數所高等教育學校，包括台北帝國大學（今國立台灣大學）、台北經濟專門學校（1946年升格為台灣省立法商學院，次年初併入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今國立中興大學）、台南工業專門學校（今國立成功大學）、私立女子專門學校，以及台北高等學校（於1946年就日治時期學校舊址成立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即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等六所，學生數共約數千人而已。由於地利之便，所以當時台大與師院的學生交流也頗為頻繁。

但是當時台灣經濟生活非常困頓，大學生生活飢餓也成爲常態（尤其是自費生），因此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求，幫忙解決度過難關。這些經濟困頓的現象，也成爲四六事件的背景因素。另外，台大的自治會曾要求改善「公共汽車管理辦法」，希望學生憑證半價優待，這些都足可描述當時生活狀況。¹³⁴

至於學生當時在學校的自主性應該算是相當高，辜寬敏表示：

當時台大的自治會活動，不只有學生支持，學生的自治意識也很高。自治會要召開法學院的學生大會，還是由自治會決定何時要開學生大會，我們就寫公文給訓導主任，蓋個章給教務主任。既然訓導主任已經蓋過章，教務主任也就一定會蓋章，差不多沒什麼問題。自治會決定明天要放假〔開會〕，明天就一定放假〔開會〕。當時自治會與學生、學校的關係〔不錯〕，如果沒有學生的支持，自治會沒有那麼大的權力，校方也是蠻尊重自治會。¹³⁵

當時的學生也並非完全浸淫在書本之中，不僅關切社會議題，也注重學生學習上遭遇之各類問題，辜寬敏說：

自治會也曾關心過學生的「課程」問題，像當時台大延聘許多大陸學者，但由於語言隔閡，對於學生聽課、考試造成極大困擾，聯合自治會也曾就此事件開會檢討，並與校方交換意見。¹³⁶

但是在四六事件之後，自治會也就此瓦解了。

學生在參與社團方面，在台大部分，主要學生社團包括：農學院的「方向社」和「耕耘社」，以工學院和文學院學生爲主的「麥浪歌詠隊」、「蜜蜂文藝社」和「台大話劇社」等，這些主要都是外省同學所參加的社團；而台灣學生則有一個專門唱聖歌的「Glee Club」，法學院也有一份名爲《台大人》的期刊。¹³⁷在師院部分，同學也在學生自治會主導下組成「大家唱合唱團」、「話

¹³⁴ 同註 17，頁 31。

¹³⁵ 同註 17，頁 26。

¹³⁶ 同註 17，頁 26。

¹³⁷ 藍博洲，《麥浪歌詠隊：追憶 1949 年四六事件（台大部份）》（台中：晨星，2001），頁 13。

劇社」、「社會科學研究會」等社團，以「團結就是力量」的行動為原則，提高了台灣學生對祖國文化的認識與體會。¹³⁸

其中麥浪歌詠隊乃因在國共內戰的困局，掀起了「反內戰、反飢餓、要和平」訴願的背景之下所成立的，其中也有部分師院學生參與，學生台灣、外省籍身份皆有。「麥浪」，這個名字是台大電機系的隊員張以淮和機械系的陳錢潮取的。之所以取名麥浪，是因為隊員裡頭有許多人來自中國大陸北方，他們都看過麥田快要收成時，隨風拂動的一波波美麗的麥浪景致。為此，張以淮特別作了一首詩，開頭一段是：

陣陣春風吹起麥浪，
麥浪、麥浪
夾帶著芳香
把金黃色的歡樂
帶給大地的兒女……¹³⁹

曾發表「和平宣言」的楊達也在麥浪歌詠隊到台中公演的一場歡迎會上以即興詩提及：「麥浪、麥浪、麥成浪，救苦、救難、救飢荒。」充分反映了麥浪歌詠隊的歷史使命感。學生當時也會發抒己見，表達對時事的關懷；或者基於對某種思想的認識為出發點，進而閱讀《新民生政策》、《社會主義》、《資本論》等書籍，但並不是因為政治目的而集結。但上述這些社團，包括麥浪歌詠隊或這些讀書會，都在四六事件發生之後，逐漸沈寂了下來。

歸結上述，台大四六事件考察小組認為：當時的社團活動，不似現在校園有優厚資源可資運用，但他們仍會透過壁報或出版小報，公告演出消息或縱論時局。當時大學生人數不多，而且和老百姓同樣置身困頓的生活條件下，或許較能真正產生「生命共同體」的意識；學生社團也經常組織合唱、戲劇等社團，於校內外巡迴演出，這是學生積極參與民間社會，並與老百姓產生互動的一種形式。¹⁴⁰

¹³⁸ 藍博洲訪談，〈一生列管四十年--李松盛的證言〉，收於藍博洲，《天未亮：追憶 1949 年

六事件（師院部份）》（台中：晨星，2000），頁 148。

¹³⁹ 同註 24，頁 16。

¹⁴⁰ 同註 17，頁 31。

第三節 「一齣荒謬的悲劇」--四六事件的始末

本節從近幾年所出版的官方調查報告書、口述訪談記錄，以及當時的公文檔案資料、報紙的報導，來分析當年發生在台大與師大兩所高等學府的「四六事件」，最後並加以評論。¹⁴¹

壹、四六事件前夕

當時處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加上國共內戰，使得國內百業蕭條，一切亟待建設。透過「台灣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演講團」的交流，台灣學生對於中國大陸政治局勢有了更加一層的認識，兩岸的學生運動也因此互相唱和。

尤其是 1948 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所屬的人民解放軍已經採行全國大規模的戰略進攻，國民黨在內戰戰場上節節敗退，軍事、政治、經濟面臨全面危機，因此加緊對台灣經濟上的搜刮、剝削，政治上，國民黨也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

在這樣動盪不安的時代之下，大陸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以學生運動為中心、愛國民主運動所掀起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遊行，也給了台灣學生直接的啓發和影響。在這樣歷史背景之下，1948 年師院也發起一場要求提高公費生待遇的「反飢餓」遊行。

¹⁴¹ 四六事件宛如二二八事件一樣，其發生原因、過程、及事後等細節，即使已有報告書出爐，但仍舊有諸多疑點尚未釐清。基於論文研究的責任，筆者有義務將整個事件從頭到尾交代清楚，然四六事件發生至今已 55 年，加上當時檔案並沒有全部很完整的保存下來，因此抽絲剝繭之下，難免還是會有遺珠之憾，這點是必須提出說明的地方。

但政府並非縱容、放任學生的行爲，事實上教育部也多次曾發函給師院，希望學校能管好學生。以底下的公文爲例：

密國家抗戰八年，繼以共匪倡亂、國庫空虛、民生凋敝，政府重視教育、愛護學生，不惜以萬難之中籌措經費，以維持青年之學業。現由政府支給之學生，公費及獎學金與匪區學生救濟金等其數目之鉅，幾佔全國教育經費總額之半，此種優惠恐爲世界各國所未有。國家對於青年之培育，可謂已盡最大之努力，凡青年學生自應恤體時艱、專心向學，以備將來獻身社會、報效國家，方不負政府爲國育才之至意。乃有極少數學生喪失理性、泯滅良知、是非不辨、正義不明，受國家之殊遇，不惜爲匪作僇，製造各種機會，煽動風潮、逾越常軌。迭經本部愷切曉諭、誥誡，不自省悟，近更公開反對政府、侮辱元首、派壞法紀、妨礙戡亂。本部爲維持學校秩序，愛護多數純良好學之青年，於上年七月曾電飭各校，將校內共產黨員，與接近共黨自私自利、危害學校之份子，設法肅清。在案茲奉行政院未篠（37）二機代電，飭將各校學生之重要現行犯，補送特種刑事法庭依法處理。除另令密飭切實遵照外，伺候凡被特種刑庭指控爲共匪、間諜之學生，學校當局應□□□開除學籍，倘經特種刑庭審判無罪者，在行核明取具保證後，可准復學。至過去經本部飭原校查明屬實，業經開除學籍之共匪學生，仍照原令處理。除分電外，合函電□遵照為要教充□。¹⁴²

從這份公文文字可看出當時國內經濟蕭條，學生的生活狀況亟待救助；另一方面由於學生大規模一連串的示威遊行，也使得政府擔心會因此造成暴動而一發不可收拾。因此表面上雖然不願得罪學生，但抬面下則早已經準備好等著抓這些滋事的學生了。

一位當年台大學生自治會的核心幹部在描述當時校園情形時，這樣寫道：

同學們對外間不安的時局，現在已逐漸敏感起來。一部份師生之間，常把國內時事作為課餘閒話和討論的中心；校內的空氣已不像過去那

¹⁴² 師院公文檔案教務第1卷第37號，民國37年8月17日。收於吳文星採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四六事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19-20。公文中並無標點，標點爲筆者所句讀。

樣和平恬靜，尤其是外省籍同學之間，他們都為自己家鄉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弄得情緒不安；校中平素活躍的及一些被認為好學的學生都參加了帶有政治色彩的活動；宣揚中共政策的印刷品，漸漸在校園中流傳開流；公開性質的學生刊物，也表現出鮮明的立場。¹⁴³一觸即發的態勢，終於在 1949.3.21 一場意外事件下爆發開來。

貳、插槍走火----「單車事件」的引爆

1949.3.20 晚上 9 點 15 分左右，台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師院博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大安橋附近被中山路（一說中正東路）派出所的謝延長警員看見，認為這兩名學生違反交通規則，於是取締並造成衝突。兩名學生被員警打好幾下，並被押送至警察局。

大約 11 點 10 分，其他聞訊趕來的師院和台大同學在第四分局門口抗議，並要求警察總局局長劉監烈出來道歉。由於劉一直未現身，所幸學生就將第四分局局長林修瑜、和前來調解的警察局督察長龔經筭兩人帶回台大宿舍的廣場（現今的金華國中），向其他同學報告事情始末。¹⁴⁴當時兩位被羈押的

同學早已被釋放，反過頭來倒是謝姓員警被勒令收押。

3 月 21 日早上 8 點左右，兩校學生集合，選出台大王惠民¹⁴⁵等 12 位和師院趙制陽等 6 名合組主席團，前往市警局。沿途合唱「團結就是力量」，並不時高喊「警察無權打人」、「反對法西斯迫害」、「反對內戰，要和平」、「反

對官僚作風」、「保障人身自由」及「吃公吃光」等口號。

¹⁴³ 藍博洲計畫主持，《五 0 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8），頁 90。

¹⁴⁴ 根據史料訪談記錄，林局長當時非常合作，直說：「你們年輕人不要這樣子啦！」，後來學生還把他和龔督察長關在圖書館（一說台大宿舍的閱覽室），直到早上遊行完後才放兩人走。詳見《台大「四六」事件考察總結報告》附件，頁 2。

¹⁴⁵ 又有「王惠敏」一說，但後來台大首批被捕黑名單是記載「王惠民」，因此筆者採行「王惠民」一說。

當事人李淑德在回憶起這件事時，這麼說：

那時師大約只有二十多個女生，參加該遊行者大約有十餘人，女生都排在隊伍的最前面，校長謝東閔先生知道學生有此行動，便在大禮堂前廣播告誡學生，剛開始以國語發表，我們大多聽不懂，後來才使用台語說：「你們這些不怕死的學生，槍都架在那裡，說打就打啊！你們這些女孩子都不怕死，還站在最前面。」¹⁴⁶

11 點左右學生隊伍抵達市警局，由於人數相當的多，因此由主席團成員與劉局長交涉。因為學生要求必須在 10 分鐘內立刻答覆，劉局長在「情勢比人強」的狀態下只好簽名，書面要求包含：一、嚴懲肇事人員；二、同學如有傷害，賠償醫藥費；三、警局局長登報道歉；四、請總局長向受害學生道歉；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學生得到滿意答覆之後，於 12 點 10 分左右回到學校。

這件事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已經得到解決，但暗地裡卻仍波濤洶湧。3 月 23 日《公論報》在「讀者的話」專欄，刊登了兩校學生以「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自治會聯合會」和「省立台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名義，共同發表的〈為何李二同學被毆事敬告各界〉。隔天 3 月 24 日，《公論報》在「讀者的話」專欄，也有警員投書，反駁學生的公開聲明。

當然，一件事情若只從自己的角度來看，那麼，別人就一定會是錯的嗎？在各說各話，又一昧指責對方的不是同時，雙方「認知差距」越來越大，「嫌隙」也越來越深，埋下往後四六事件的衝突。

參、山雨欲來風滿樓----青年節的「營火晚會」

3 月 29 日台北市大學和中學校學生聯合會宣佈成立「學生聯盟」，號召全省學生連結。並以「結束內戰，和平救國」、「爭取生存權」、「反飢餓，反迫害」等口號作為訴求，藉由「紀念黃花崗革命烈士」名義，當晚在台大法

¹⁴⁶ 吳文星訪談，〈附錄三--二：李淑德女士訪問記錄〉，收於吳文星採編，同註 29，頁 222。

學院操場舉行一場慶祝青年節的營火晚會。

晚會主持人是台大學生葉城松，除台大、師院、台北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踴躍參加之外，台中農學院和台南工學院也有代表前來。根據事後兩位當事人回憶當天晚會情形，這樣描述：

師院學生在學生自治會糾察部長莊輝彰的指導下，排成四行縱隊，女生領前，男生殿後，高唱著革命歌曲，走向會場，雄壯的氣勢贏得了有效同學的歡呼和鼓掌。¹⁴⁷

當天的營火晚會活動，以台大「麥浪歌詠隊」的歌舞表演為主，除了各種民歌之外，還演唱了〈你是燈塔〉〈你是舵手〉及〈王大娘補缸〉……等大陸學生搞學運時常唱的歌曲。當天的晚會簡直成了公開的「解放區」了！當「麥浪」成員在台上唱〈王大娘補缸〉的時候，全場連「秧歌」都扭起了……。¹⁴⁸

學生在這快樂的氣氛之下，殊不知國民政府因為大陸學運的經歷，老早結合黨政軍的力量，對於這些學運活躍份子進行嚴密監視。學生這一連串的舉動，更是震驚了高層當局，於是抓人變成只是遲早的事了。

肆、天未亮----警總下令圍捕滋事學生

3月16日應代理總統李宗仁電召，到南京述職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師令陳誠於4月初返台。當他知道知道台北學運的經過之後，氣得直跳腳，下令警總副司令彭孟緝負責，清查後準備抓人。

4月5日¹⁴⁹傍晚周慎源、趙制陽接連被誘捕。¹⁵⁰周慎源在被誘捕後，三

¹⁴⁷ 陳培基證言。引自藍博洲，同註 25，頁 18。

¹⁴⁸ 胡世璘證言。引自藍博洲，同註 25，頁 18-19。

¹⁴⁹ 為何會選在 4 月 5 日清明節呢？有人認為當時清明節放假，有很多人返鄉，因為校內學生較少，目標明顯。若平日進行逮捕，恐會造成校內師生驚慌，學生會作集體反抗。

¹⁵⁰ 趙制陽陳述自己是在黃昏時被誘捕。李青霖專訪，〈劫後餘生，趙制陽憶四六亂象〉，《聯

輪車行經台北公園旁（今公園路），台大青島西路宿舍附近時，看見很多台大學生在宿舍門口，便趁機跳車往宿舍方向跑去，並大喊：「救命呀！我是師院學生，台大同學救命呀！」雖然便衣警察曾對空鳴槍，但台大學生人數眾多，警察不敢貿然行動，於是周慎源便得救，隨後將經過告訴大家，並由台大學生護送他回師院宿舍。

隨後台大與師院的學生全聚集在師院的大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無限定期罷課，且明天一早要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綁架學生的暴行。另一方面，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省主席陳誠在得知學生的下一步之後，也立即代電給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表明要逮捕師院六名學生。電文如下：

迭據查報貴校學生：周慎源、鄭鴻溪、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朱商彝等計六名首謀，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居拘禁執行公務人員，肆行不法，殊屬居心叵測。該生等本（五）日晚，復又糾眾集議，希圖實施擴大擾亂。本部維護社會安全，保障多數純潔青年學生之學業起見，應即予以拘逮，依法偵訊。特電即請按明指交到案，以肅法紀。至于其他學生希善為撫慰安心照常上課，幸勿盲從附和致干法究為荷。¹⁵¹

當晚陳誠也找來了彭孟緝、傅斯年、謝東閔到家中來開會。嚴格來說，這場會議決定了整個四六事件的發展。但遺憾的是，這場會議並沒有被完整記錄下來，甚至多年之後，成為「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與會者似乎都避重就輕帶過，呈現對自己最有利的一面說詞。如今四位當事人都已過世，這場會議內容真相也石沈大海。

謝東閔在接受訪問時說：

事件爆發前一天晚上，我和傅校長以及當時的警備司令，名字我也忘了。我們三個人開會，提出因應之道；警備司令部堅持要動用軍隊進入校園內抓人，我和傅校長主張學生的事可以慢慢勸，不要用軍隊；後來司令部仍堅持軍隊抓人，我就告訴他，那能不能槍裡頭不要填子彈。¹⁵²

合報》，1997.6.11，6版。

¹⁵¹ 師院公文檔案訓導第11卷第9號，收文第257號（民國38年4月5日，特字第貳號）。收於吳文星採編，同註29，頁21。公文中並無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句讀。

但彭孟緝卻說謝東閔並沒有講：「不要用軍隊抓學生。」彭孟緝提到：「謝東閔向陳辭公（陳誠）鞠了一個躬，他說，師範學院的院長他不做。」傅斯年則是對彭孟緝講：「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緝回答：「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又說：

調來部隊，不拿槍，只拿繩子，士兵和警察把這些犯法的學生捉起來，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學生。¹⁵³

事實上很多人在回憶起這件事時，都說部隊有拿槍，逮捕過程中也有學生遭到毆打。至於被逮捕學生的數目，從一百多人、二百多人、三百八十多人，到彭所說五、六百人都有，至今都未釐清。

四個人在陳誠家開會的同時，軍隊也已經包圍師院男生宿舍，於是學生用桌椅將樓梯間堵住，說什麼也不把周慎源等人交出。其間謝東閔曾與學生面對面好言相勸，但不但得不到學生的依從，還遭到學生的批判。朱裔彝回憶道：

以鄭鴻溪為首的學生強烈質問謝東閔，對周慎源被秘密誘捕的事情作何感想？

謝東閔被批得受不了，最後，他說了一句：「我謝東閔今天還不如一條狗！」然後狼狽不堪地和陪同的訓導人員離開。¹⁵⁴

凌晨 3、4 點，在彭孟緝與保安處處長林秀欒親自督鎮指揮之下，攻陷男生宿舍，將學生押到軍用卡車上，載到陸軍第三部隊的營房（今中正紀念堂），整個逮捕行動就此告一段落。¹⁵⁵

¹⁵² 謝公秉訪談，〈謝東閔：我從頭到尾沒有把學校關掉〉，《聯合報》，1977.6.19，4 版。

¹⁵³ 賴澤涵、許雪姬，〈彭孟緝先生訪問記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口述歷史第 5 期：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337-338。

¹⁵⁴ 朱裔彝證言。引自藍博洲，同註 25，頁 30。

¹⁵⁵ 周慎源在這次逮捕行動中竟離奇的躲過追捕，從校園內逃脫。關於這段驚心動魄的過程，詳見〈附錄九--周宜勳寫有關周慎源逃脫警總包圍部份〉，收於《台大「四六」事件

伍、整頓與搶救----四六事件後雙方的行動

在逮捕行動過後，陳誠立即向社會各界發表〈整頓學風〉的聲明，官方報紙中央日報於4月7日刊出標題為〈政府決心整頓學風，拘捕首謀違法學生〉全文，¹⁵⁶說明將這幾位學生逮捕，乃因張貼破壞社會秩序之標語、散佈鼓動風潮之傳單、搗毀官署、私擅拘禁公務人員，爲了保護大多數純潔學生，只好勒令逮捕。

台灣省政府也同時代電給師範學院，要求即日起（4.7）全校停課：

查近來師範學院少數不法學生，張貼破壞社會秩序之標語、散佈煽惑風潮之傳單，甚至搗毀官署、私擅拘禁公務人員，擾亂秩序、妨礙治安，殊堪痛恨。為整頓學風，保障大多數純潔青年學生學業起見，不得已將為首學生居送法辦。茲著令該校即日暫行停課，聽候整頓，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再行定期復課。敕希該校轉知全體教職員暨各生家長，仰體政府整頓教育之居心，約束學生安分守法，不得再有越軌行動。除分電對合行電仰遵照辦理，具報為要。¹⁵⁷

至於社會各界果不其然，立刻響應陳誠的行動。中央日報連日刊載新聞，¹⁵⁸包括家長部份：〈家長協助整頓學風，昨集會討論將發表宣言〉（4.7）、〈家長會為整頓學風書告同學：各安本位努力學業勿受外界誘惑，勿以感情用事讀書以外心勿他求〉（4.8）；台灣省各部會：〈台大師院學潮，參會發表談話

考
總結報告》附錄9，頁1-2。 察

¹⁵⁶ 〈政府決心整頓學風，拘捕首謀違法學生〉，《中央日報》，1949.4.7，3版。收於《中央日報縮印本（1）》（台北：中央日報社，1980.4）。

¹⁵⁷ 師院公文檔案訓導第11卷第10號，收文第258號（民國38年台灣省政府卯魚府綜機字第20252號代電）。收於吳文星採編，同註29，頁22-23。公文中並無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句讀。

¹⁵⁸ 由於以下各筆資料來源出處均同於註42，且中央日報均將後續報導刊於第3版，因此不再重複贅述，直接以〈標題〉（日期）說明。

〉(4.8)、〈省教育會：擁護整頓學風，發表告教育界同仁書〉(4.9)；工會方面：〈限制入境·整頓學風：市各工會通電擁護，予奸徒單幫致命打擊，珍愛台灣教育光榮史〉(4.14)；師院部份：〈師院昨日成立整頓學風委會：劉真任主委兼代院長，謝東閔辭兼院長獲准〉(4.8)、〈師院積極整頓學風：整委會昨開第一次會議，劉兼院長定十一日接事〉(4.10)。

中央日報也立即刊登一則短評（類似今天的社論），名為〈法紀與治安〉(4.7)，最後兩段文字如下：

不幸近來有少數學生，竟受到京滬等地帶來的囂張風氣之傳染，屢次鼓動學潮，進而擾亂治安，破壞法紀。這種情形，如果聽任其發展，台灣的安定，便將毀損無疑。為著全省人民的福利，省政當局遂以必要的措施，來抑制這種不良風氣。我們相信，全省人民對這種措施，一定能瞭解其不得已的動機，而加以支持的。

我們竭誠盼望，大部分的青年學生能夠以人民的希望為希望，以人民的要求為要求，不要隨風附和，為人利用，類此的事情，就一定不致再度發生。我們同時更盼望學生的家長們，如果發現子弟染有不良的習氣，應該盡力勸導，重建純樸的學風。¹⁵⁹

當時台灣三大報，除了中央日報為御用報紙的報導，公論報、台灣新生報也都採取官方說法，¹⁶⁰也就是將這些被逮捕的學生，定位為「不法份子」，所以政府的行動是合理的。¹⁶¹

此時陳誠一方面要試探四六事件之後學校教師的觀感，一方面要藉由親民的作風來鞏固他的威權，於是 4.9 中午於中山堂光復廳宴請台大全體教職員共 170 餘人、4.11 中午在同樣地點宴請師院教職員共 90 餘人，中央日報分別予以刊載：〈台大教授應陳主席宴，一致贊同整頓學風，陳主席明邀宴師院

¹⁵⁹ 〈法紀與治安〉，《中央日報》，1949.4.7，3 版。收於《中央日報縮印本（1）》（台北：中央日報社，1980.4）。

¹⁶⁰ 關於公論報、台灣新生報的報導，詳見吳文星採編，同註 29，頁 97-143。

¹⁶¹ 台灣新生報前身即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民報（更早應為台灣青年），最初的台灣新民報言論幾乎是在挑戰日本政府的集權統治，後來的台灣新生報卻淪為與中央日報同一等級，成為統治者血腥統治的傳聲筒，真是令人歎噓！如果蔡惠如地下有知的話，不知作如何的感慨！

教授〉(4.10)、〈陳主席宴師院教授，說明整頓學風實非得已，希望迅速登記早日復課〉(4.12)。

至此陳誠的地位確定沒有因為四六事件產生動搖，加上四六事件也在官方強力護航、媒體一面渲染、社會一面支持之下，逮捕行動成為合法且合理，因此捲入事件當中的學生被當成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

然而事實上當時仍舊有幾位挺身而出替學生講話的教師，趙制陽筆述說道：

教育系林本教授與體育系主任謝似顏教授在「整頓學風委員會」開會時，以同情學生的態度講了話，結果林本教授幾乎被調離師院至編審會，後來教育廳長陳雪屏、台大校長傅斯年都替他說了好話，才得以繼續留任。(林教授也曾分別教過劉真、謝東閔)

至於對謝教授就不同了，遭解聘處分，剝奪了他的工作權。他的家庭立即陷於極度窮困狀態，子女失學，他終於潦倒悲憤而死。……¹⁶²

在這樣情況之下，又有幾位「不怕死」的站出來替學生說句話呢？

在4月6日學生遭到逮捕之後，僅剩的師院和台大學生也開始展開營救行動。例如台大教師雖常照常上課，但學生採取休課行動以示抗議。由於遭到逮捕的學生非常多，所以調查單位將可疑份子，以及先前名單上的學生收押之外，其餘學生在4月8日即通知家長領回。

當時所成立的「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此組織到當年11月15日才結束)也通過「師範學院學生學籍重行登記辦法」，4月16日至25日辦理申請登記手續。最後全校八百餘人，只有周慎源等36名，因為逾期未重新登記、偽造證件、甄審不予合格三項理由被開除學籍，其餘同學皆復學，4月29日師院正式復課。

四六事件至此似乎告一段落，但國民黨的組織才剛開始深進校園，伺機

¹⁶² 〈劉真談四六：未開革學生；當事人趙制陽則表示：不僅是學生，教師亦受其害〉，《台灣日報》，1999.1.3，3版。

而動。

第四節 學運的輓歌：灰飛煙滅的民主火苗

本節分成兩部分：首先是探討四六事件（包含事件當中的主角）的歷史定位，以及四六事件對於往後學運的影響。最後筆者嘗試將同時期，發生在德國的著名學運事件「白玫瑰」（1943年）作一初步比較。¹⁶³

壹、四六事件發生前後的校園

有人認為白色恐怖應從 228 事件之後算起，也有人認為應該從四六事件開始算起。但無論如何四六事件當屬台灣近代學生運動一項重大打擊，使得往後自主性的學運消失在校園長達 20-30 年之久。

前文已描述到四六事件尚未發生之前師院、台大可說是十分自由的，但是四六事件之後學校可說是變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涂炳榔回憶道：

劉真來整頓後的「師大」與以前大不同。以前的「師大」不論在課堂上或學生的生活都是非常自由，但事件後劉真馬上規定「師大」的學生每天早上要開朝會、朝會時還會派教官一個個點名，後來甚至連上課都要點名。劉真又因陳誠的關係，爭取到經費，也為方便管理學生，便大量擴建「師大」的學生宿舍。記憶中後來「師大」的學生一律要住校的樣子，整個學校的校風似乎變得非常有規律。¹⁶⁴

¹⁶³ 當時世界各地皆有學潮產生，例如日本的大學生為了反制政府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向世界各地侵略，因而引發了相當多的學潮、暴動。

李淑德也說：

若要比較四六前後的校風，我想謝東閔先生擔任校長時，「師大」校風較為開放，學生環境較自由，學生說話都較無禁忌。經過四六事件後，劉真奉派來接管「師大」，開始對學生有許多嚴格的要求，以前上課不像現在有課才來，而是每天都要到學校，所以劉真要求學生每天早上要到校升旗，上課也要點名，感覺上整個校園氣氛比較嚴肅。

經過四六事件後，幾乎都生活在白色恐怖裡，看到每個人都覺得怪怪的……¹⁶⁵

涂、李二人所言「師大」應為「師院」之誤。四六事件過後，經過大力整頓的師院校園，其實處在情治機構的監視與掌控中。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直接行文學校直接「點名要人」首開先例之後，學校已成為警總附屬的機關單位，直接聽命於中央。在劉真的軍事化管理之下，筆者不諱言指出，師院根本不能稱為「高等教育學術殿堂」。師大人文學社更認為：

四六之後，師大的校園戒嚴正式開始，師大校風由原先積極關心社會的自由開放，改變為保守，從此師生在高壓控制下，改革的聲音較少浮上檯面。

台灣師大長期以來被社會認為是台灣大學院校中，最為保守的校園之一，無論是在校園自身的改造過程中，或是在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的社會積極參與上，昔日都籠罩在低壓下。¹⁶⁶

為 臺 灣 省 立 師 範 學 院 ，
成 立 於 1 9 4 6 . 6 . 5 ， 但 隨
即 在 1 9 4 9 . 4 . 6 爆 發 四 六

¹⁶⁴ 吳文星訪談，〈附錄三--一：涂炳榔先生訪問記錄〉，收於吳文星採編，同註 29，頁 155。

¹⁶⁵ 吳文星訪談，〈附錄三--二：李淑德女士訪問記錄〉，收於吳文星採編，同註 29，頁 223。

¹⁶⁶ 〈師大學風保守，四六事件的錯！師大學生會建議將四六訂為師大學生紀念日〉，《自立早報》，1997.6.19，4 版。

事件，對於整個學校往後的發展，校風偏向「保守」，有極為關鍵的影響。誠如在第二章所分析，日治時期的台北師範學校所爆發的學潮，也在很多學生考量到公費生可以改善家境的前提之下，然後無疾而終。因此四六事件對於師大的學運發展是一項重大打擊，加上往後的數十年，外在所限制的因素（如公費制度、師資培育制度、師大缺乏自由派學者等），使得師大校風更加趨於保守。

再者是在四六事件中，四位關係重要人：彭孟緝、傅斯年、謝東閔、劉真的角色。

彭孟緝生前頗多爭議，歷經 228 事件、四六事件，常被受害者家屬指為「屠夫」、「劊子手」，尤其四六事件中，彭孟緝宣稱部隊不拿槍，但事實證明當時軍警均荷槍實彈，且有人對空鳴過一槍；答應傅斯年校長，驅離時，不會讓學生流一滴血，事實證明當時學生有遭到毆打。彭孟緝曾說：

其中師範學院（學生）就解散由家屬領回，台大是國立大學，我們不能管¹⁶⁷，所以我叫傅斯年負責台大的學生，後來他也叫家屬來領回去。……我這個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我雖然是軍人，但我對敵人很大方，對親人非常愛護……。¹⁶⁸

從這句話看出彭孟緝似乎在避重就輕，直往臉上貼金，並且只挑對自己有利的部份說詞。

至於傅斯年校長在四六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則為許多人稱讚，尤其他奮不顧身救學生的舉動，著實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要求彭孟緝在抓學生時不能有人流血，否則跟他拼命；替林本教授說話，使得林教授勉於災難，連當時是師院而非台大的學生趙制陽也說：

¹⁶⁷ 為何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動師院而不太敢動台大，官方當時也有一種說法：台大是國立的，不屬於省政府管轄範圍，但師院是省立的，且師院學生畢業後要當老師，所以品行更要端正。

¹⁶⁸ 同註 40，頁 338。

傅斯年的確是了不起的教育家，他當時得知學生被情治單位逮捕後，擔心學生被誤判犧牲，四處奔走，要求改由司法單位接手審判，很多受難學生才由情治機關轉到台北地方法院看守所羈押。¹⁶⁹

他非常佩服台大的傅斯年校長，盡力為營救學生而奔走，但師院校方卻要求所有學生重新辦理登記學籍，使許多被捕學生因而失學。¹⁷⁰

感化期滿，台大學生因校長傅斯年支持，都回到學校，生活困苦者，還安排打工纾困；師院學生就沒有這麼幸運，既不能返校，只能自求多福，很多人的境況都相當苦。¹⁷¹

趙制陽言談之中透露著對師院的不滿。其實不只是他，很多受訪者似乎對於謝東閔在事件中以及劉真在事件後的表現均深感極度不滿，兩人在後來四六事件報告調查時，也不願意配合，林玉体甚至認為，「這兩個人沒骨氣，沒有資格當校長。」¹⁷²

兩人似乎只挑對自己有利的說詞。謝東閔說在4月5日晚上，四個人開會他如何又如何，但後來彭孟緝接受訪談則否認謝有如此說，事實上謝只說他不作師院的院長。由此可見謝的軟弱心態。

謝東閔後來接受訪談時說：

學生被抓的次日，我怕學生出事，帶著香蕉、橘子探望學生。他們有些人還笑嘻嘻的說，院長你來看我們喔，我說，你們實在是太調皮了。我從頭到尾沒有把學校關掉，我年紀那麼大了不必要講假話。後來陳誠當行政院長時，找了當時立委劉真接師院院長，我才沒有兼這份職務。¹⁷³

但趙制陽卻也指出：

¹⁶⁹ 〈受難者話當年：「傅斯年組聯誼會救學生」〉，《聯合報》，2001.1.12，5版。

¹⁷⁰ 〈有人讀馬克吐溫入獄，有人唱愛國歌曲被抓〉，《中國時報》，2001.1.12，5版。

¹⁷¹ 同註37。

¹⁷² 吳寧馨，〈兩份四六事件報告書都在指控一樁悲劇〉，《新新聞週報》，1997.7.6，頁81。

¹⁷³ 同註39。

當時師院由省教育廳廳長謝東閔代理院長，他平常在校時間不多，加上公費少，學生伙食差，學生平時已有怨言，而在「三二一」之後，他們就未再見到院長。¹⁷⁴

因此或許可以說謝東閔如他所言並沒有說假話，但是他其實只說出了一部份（並非全部）的事實，而且似乎將師院的過推給劉真來扛，有逃避責任之嫌。

至於劉真，在事後的調查報告也不願意配合，甚至認為謝東閔比他清楚。但其實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四六事件過後師院整個校風轉趨保守，劉真軍事化的管理，也使得師院數十年來所培育出的老師，宛如 L. Althusser 所言，成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y state apparatus，簡稱 ISA）之下，宰制人民的觀念簡單性的忠誠執行者；而非 H. Giroux 所言，教師扮演跨越邊際的轉化型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¹⁷⁵

況且劉真當時也是「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委員之一，怎麼能說跟他無關呢？因此謝東閔跟劉真的推諉之詞，實在令人無法苟同。

貳、學生的主體性意識

一般認為 1949.3.21 單車雙載事件是四六事件的導火線，但若我們將格局拉遠一些，其實早先的「反飢餓」遊行就已經埋下導火線了。

¹⁷⁴ 〈「四六」報告提出，是否能平反？趙制陽：應比照二二八補償〉，《聯合報》，1997.6.19，4 版。

¹⁷⁵ 在討論教師的職業角色時，有兩派說法：一派認為教師是「專業」的（即教師具有自主意識的）；文化再製理論學者卻認為教師僅是「觀念簡單性的忠誠執行者」。西方學者 L. Althusser、N. Poulantzas、A. Gramsci 均提出，在國家的控制之下，透過教師這項「工具」，將有利於執政者的意識型態、知識，原封不動的灌輸給學生，使學生能服從國家，如此一來執政者可繼續確保他的優勢地位。關於這方面的探討，請參見：姜添輝，〈教師是專業或是觀念簡單性的忠誠執行者？文化再製理論的檢證〉，《教育研究集刊》49 輯 4 期（2003.12），頁 93-126；譚光鼎，〈社會與文化再製理論之評析〉，《教育研究集刊》40 輯（1998.1），頁 23-50。

怎麼說呢？從反飢餓遊行、三二一單車事件後的示威抗議，演變到四六事件大規模的學潮，所牽涉到的學生相當的多，在這過程中也有非常多的學生參與。但是學生都是這麼單純且認同這些活動嗎？

這似乎要打個問號，因為在口述訪談所得到的資料顯示，似乎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推測，其實很多活動都是共產黨學生在裡面鼓動，目的不外乎是訴求「反內戰、反飢餓」。政府當局其實也明察這點，中國大陸那邊還在國共內戰的同時，台灣這邊表面上雖然沒對學生怎樣，但檯面下已經變成國民黨在追捕共產黨學生了，而共產黨的學生也很精明老早就跑了。

從一位接受口述訪談的當事人與訪談者的對話，得到這樣描述：

答：……反飢餓就不上課，那麼到街頭去遊行示威，其實這個都不是我們的本意，這是共產黨的學生策劃，我們這些傻傻的學生搖旗吶喊，走啊走，不要上課，能玩多好！

問：主要的是他們（共產黨學生）策動？

答：ㄟ！他叫你怎麼樣做，要怎麼樣。反正我們就傻傻的做。

問：這種學生居大多數是不是？我是說不知道參加目的的？

答：不知道的較多，大多都是去搖旗吶喊，湊熱鬧居多。¹⁷⁶

從這段話可知，當時並非所有學生都深處風暴之中，大部分學生可能藉由「聲援」、「抗爭」、「遊行」而達到其「好玩」、「湊熱鬧」、「不用上課」的目的。因此在台大四六事件小組所作的報告書裡頭，結論部份寫道：

而從「三二一」腳踏車事件到四六事件，是台灣社會解嚴前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也是學生主體與自主力量的具體展現。¹⁷⁷

上述評斷，有可能將四六事件過度推崇。但另外一段敘述：

四六事件作為一種學生運動的形式，雖然在實質效果上遭致挫敗，但在精神意義上，四六事件標舉著台灣大學生追求社會正義的具體實踐

¹⁷⁶ 同註 17，附件，頁 2-3。

¹⁷⁷ 同註 17，頁 57。

，而這正是台灣校園環境的珍貴歷史資產。¹⁷⁸

此種論點則較為中允。畢竟幾位身處暴風圈中的學生，如周慎源等，被認為常對政府提出批判的少數學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有自己的主體意識，會去思考、批判，雖然明知付出的代價會非常的高，但至少不是被人家傻呼呼的拖著走。但是在那種威權統治，加上社會動盪、非常不安定的年代，少數幾個人的言行終究還是無法去撼動整個社會環境的。

在四六事件中，被抓的學生不分省籍、族群都有，顯見四六事件並非省籍、族群間仇恨所引發的衝突。¹⁷⁹

當時學生接受共產主義思想，進而左傾、帶有社會主義精神的同時，這株火種立刻被熄滅。隨後進入戒嚴時期，也使得左翼思想在台灣的發展告吹。¹⁸⁰

參、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全球動盪

不只是台灣，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因素，使得當時全球都處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之下。

當時的集權國家，均利用教育來控制全國人民。例如希特勒（A. Hitler）取得德國政權之後，即大力提倡種族優越政策，鼓吹愛國的狂熱，組織學生效忠團體，鼓勵優生及多子並厲行學術控制等措施。¹⁸¹

義大利的墨索里尼（B. Mussolini）則是要求在 18 歲時加入法西斯組織，聲言「墨索里尼永遠是對的」；對於教師的言行控制絕不放鬆，熱心黨務的人

¹⁷⁸ 同註 17，頁 58。

¹⁷⁹ 這在現今台灣，尤其是剛總統選舉過後（2004 年），族群對立仍在的時刻，值得一些「仍處在非理性狀態」的人，好好靜下來去思考的地方。

¹⁸⁰ 1970 年代左翼思想再度成為論戰焦點，只是這回被有心人士拿來包裹「統派」的美麗糖衣。事實上「左、右派」並不同於政治立場的「統、獨」，若依此來論斷學生支持兩岸統一，那就未免太化約左派了，反而掉入自己所預設的立場當中。

¹⁸¹ 林玉体，《西洋教育史》（台北：文景，1980），頁 511。。

可優先取得教職；教育部長香第爾（G. Gentile）公開推崇國家主義的教育政策，並說：「領袖使國家亦然。」至於俄國共產黨在 1917 年取得政權之後，誠如上述兩國一樣，也是加強思想控制；要求學生組織勞動黨團，經過重重關卡的淘汰便可成為共產黨員。¹⁸²

其中希特勒以政治主宰學術為最，對於不聽命於政府，具有學術良心的教授及學者，不是下令囚禁、殺戮，就是驅逐出境。當德軍佔領歐洲大部分地區時，受納粹蹂躪的教師也不免遭殃。例如挪威的德國傀儡政府在 1942.2.8 下令全國教師必須參加一個宣揚納粹原則的教師團體，否則解聘。當時 14000 名挪威教師中即有 12000 名抵制這種要求而拒絕加入。2 個月內，2000 拒絕入會的教師被捕入集中營，而 500 名被驅逐到北極海。¹⁸³

在這種威權統治下，還是有大學生站出來反抗的。故事的主角是當時就讀慕尼黑大學的漢斯·蕭爾和索菲·蕭爾兩兄妹、漢斯的三位醫學系同學，以及一位名叫胡伯的哲學教授。原本胡伯教授是納粹黨員，漢斯和索菲則為「希特勒青年團」成員份子。由於國內外不斷發生血腥事件喚醒了他們的道德勇氣與良知，體認到德國知識份子的徹底失敗，只能動用武力來推翻希特勒政權。但是本身並沒有武力的情況底下，於是他們組成「白玫瑰」組織，藉由揭露事實的真相，來開導別人進行消極抵抗，期望德國人不要再「麻木不仁地酣睡下去」。

他們開始在慕尼黑市中心「路德維希大街」一帶的大學建築物和大學牆壁塗寫「自由」、「打倒希特勒」等字樣。1943.2.18 蕭爾兄妹及其朋友在慕尼黑大學校園散發傳單時，被蓋世太保逮捕，2 月 22 日判處死刑，當天傍晚被送上斷頭台，其他相關人士則在 4 月 19 日遭到判處死刑、有期徒刑不等。幸虧後來「蓋世太保」官員對於受難者家屬暗中保護，使得這些當年被判處叛國罪的「白玫瑰」成員，終於等到 1985 年西德聯邦議會宣布納粹「人民法院」之判決無效，蕭爾兄妹等人才正式被平反。¹⁸⁴

1940 年代，全球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動盪不安，台灣跟德國、義大利、蘇俄一樣，均是處在威權統治底下。學生對於威權體制的抵抗在德國發生「白

¹⁸² 同註 68，頁 514-516。

¹⁸³ 同註 68，頁 513-514。

¹⁸⁴ 周全譯（I. A. Scholl 著），《白玫瑰：一九四三》（*Die Weisse Rose*）（台北：左岸，2003）。

玫瑰事件」；在台灣則是發生了「四六事件」。德國這起學生運動的主旨，起因於大學生反對希特勒的獨裁政權；而台灣的「四六事件」起因錯綜複雜，最主要還是因為學生的左傾、批評時政，以及國民黨政府對學生運動的畏懼。發生在 1943 年的「白玫瑰事件」，要等到 1985 年才獲得平反；1949 年台灣的「四六事件」，則是要等到 2001 年教育部長出面致歉，才算獲得平反。

這些在威權時代，敢站出來挑戰政府的學生，不管是發生在德國的「白玫瑰事件」或是台灣的「四六事件」中的大學生，均足以堪稱是知識份子的典範。正因為他們「爲人所不敢爲也」，在關鍵時刻當大多數人「保持緘默」，他們卻勇敢跳出來批判，「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種情操更顯得彌足珍貴。

英國首相邱吉爾即對「白玫瑰事件」殉難者的有所讚揚：

在整個德國曾經存在著反抗運動，其成員可廁身於人類政治史上最高貴偉大人物之林而無愧。這些人在沒有國內外支援的情況下獨立奮鬥，而推動他們的力量僅來自良心上的不安。他們在世時必需〔須〕掩飾自己的身分，所以我們不知其為何許人，但是我們可以從死難者身上看見反抗運動的存在。雖然這些犧牲者無法為德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作出辯解，然而他們卻為現在的新建設奠下了不可磨滅的基礎。¹⁸⁵

至於台灣的學運，在國民黨政府宣告進入戒嚴時期，加上黨化教育的實施，沈潛了 30 多年，在 1970 年代才又嶄露曙光。

¹⁸⁵ 引自南方朔，〈發生了甚麼事？〉，收於周全譯，同註 71，頁 8-9。

第四章 美麗與哀愁-- 1950-70 年代的台大校園運動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

----1950-70 年代青年學子的流行語

上一章探討關於 1940 年代台灣的學運，其中第三節以 1949.4.9 發生在師大和台大的四六事件為例。本章延續上一章，所要分析的是關於 1950-70 年代以台大為主的校園事件，共分成四部分。

首先是分析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如何透過「監控台灣校園的運作機制」和「灌輸式教育」兩種管道，來貫徹黨化教育。其次 1950-70 年代台大所發起的一連串校園集體行動，就其訴求與意涵探討是否稱得上學生運動。再者解析 1970 年代釣魚台事件所引發的校園抗爭事件，以及事後的餘波盪漾（包含台大哲學系事件等）。事實上，1950-70 年代的校園事件充其量只能稱為「動員學生」，而不是「學生運動」。¹⁸⁶

第一節 戒嚴時期（1950-70 年代）的黨化教育

戒嚴時期的黨化教育研究，目前的成果可說是汗牛充棟，包含探討當時

¹⁸⁶ 文章中所使用的「集體行動」、「動員學生」二詞彙，乃參考戴寶村，〈動員學生與學生運動--一九五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學生運動〉，發表於國史館主辦：「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國家圖書館，2003.9.26），特此說明。

的校園生活、教材內容、教育政策等。其中林玉体所著《台灣教育面貌 40 年》¹⁸⁷、《台灣教育史》¹⁸⁸二書，對於戒嚴時期的黨化教育有非常詳細的描述與分析。此外，近年來的博碩士論文也有一些成果，例如：曾靜悅《臺灣地區學校反共教育之研究》、¹⁸⁹龔宜君《移入政府的滲透能力（1950-1969）：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與鞏固》、¹⁹⁰李泰翰《黨團、軍事與教育——一九五〇年代學生軍訓進入校園之研究》¹⁹¹等。

壹、「立正！答數！」----軍訓制度入侵校園

四六事件發生的時候，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直接行文學校直接「點名要人」。首開先例之後，學校已成為警總附屬的機關單位，直接聽命於中央。事後很多學生雖在四六事件倖免於難，但在白色恐怖時期時則被逮捕，坐牢或是槍決。受訪者回憶道：

……四六事件好像就告一個段落，學校停課了一個多月，然後再註冊，再開始，從那以後學校管理得非常嚴格，也就是進入了所謂白色恐怖時代。你晚上睡覺如果聽到隔壁有敲門的聲音，隔天一定有人失蹤，被帶走。

不是在宿舍啊！是在家裡啊！反正有人密告，晚上就去抓人，敲門就是去抓人，晚上隔壁有敲門聲，第二天早上一定有人被抓走。過著很恐怖，明天自己什麼時候會被抓都不知道的日子……¹⁹²

¹⁸⁷ 林玉体，《台灣教育面貌 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

¹⁸⁸ 林玉体，《台灣教育史》（台北：文景，2003）。

¹⁸⁹ 曾靜悅，《臺灣地區學校反共教育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1994）。

¹⁹⁰ 龔宜君，《移入政府的滲透能力（1950-1969）：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與鞏固》（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1994）。論文修改後出版：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香，1999）。其中在第五章〈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校園〉，探討知青黨部和救國團滲透到校園運作情形。

¹⁹¹ 李泰翰，《黨團、軍事與教育——一九五〇年代學生軍訓進入校園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¹⁹² 台大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台大「四六」事件考察總結報告》附件，頁 4。

因此在人人自危的情況之下，都自顧不暇了，哪管得了別人，要是萬一不幸也被拖下水，那不就更糟糕。所以台灣人長期對於政治、公共事務的冷漠以及個人主義的發達，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唯有走過白色恐怖時代的人，才知道民主自由的可貴。正如柏楊在綠島的人權紀念碑上的題辭一樣，「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在綠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訴說的正是當年國民黨政府在威權體制下所進行的迫害。

台灣隨後在 1949.5.20 實施戒嚴、1949.6.20 頒佈〈懲治叛亂條例〉。中國國民黨政府認定教育乃精神國防，學生的思想必須純潔，於是 1950 年訂定〈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加強高中以上三民主義思想課程；1952 年〈台灣省教育廳調整課程辦法〉，規定軍訓每週 4 小時（全期共 24 小時）、1955 年減為每週 3 小時（全期共 18 小時）、1959 年改為 2 小時（全期共 12 小時）。教育部則設有軍訓處，省事教育廳局設有軍訓室，高中以上學校則單獨設立教官室，負責學校軍事訓練事宜。大專院校比照辦理，並有暑期成功嶺集訓和寒訓措施，¹⁹³直到 1998 年此種暑訓才正式走入歷史。

軍事人員進入學校，同時還安排軍訓相關課程，學生則必須學習作戰技巧，如射擊、模擬投擲手榴彈、國防知識等。當時教官在校更需達成四個工作目標：

- 一、堅定革命意志：以三民主義的愛國思想教育及民族精神教育為學生軍訓意志型態的內涵。
- 二、維護學校安寧：敵人的學運工作，乃藉由合法掩護非法，以滲透、蠱惑、煽動、顛覆等手段，來達成其目的。而滲透擾亂學校安寧，為其常用手段。為了提供良好的讀書環境，唯有運用組織、掌握動態、發掘徵候，處理問題，以保持學校的安寧。
- 三、輔導青年奮發向上：激勵學生負責的態度與尚武的精神，確立正確的人生觀，以奠定團結、反共、救國的心

¹⁹³ 引自林玉体，同註 2，頁 41-42。

理基礎。

四、擴大影響社會安定，由校園安定擴及社會安定。¹⁹⁴

把校園當成軍營、學生當成軍隊在管理的，在世界各國當中，除了台灣之外，也是絕無僅有的。在這種軍人橫行於校園當中的情形之下，教育的氣氛是緊張的、不安的，與「學校是要帶給學生愉悅的、快樂的」意旨，根本背道而馳。¹⁹⁵

隨著軍訓人員進駐校園，也帶進兩個畸形的組織。一個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另一個則是設在大專院校裡的中國國民黨青年黨部。學校皆設訓導處，但整個訓導處包含底下的組織（如學生活動中心等），都掌控在救國團的各大專院校團務指導委員會之下，各校軍訓總教官兼任副訓導長，主任教官或資深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主任。¹⁹⁶設在大專院校裡的青年黨部（北知青、中知青、南知青）則是隸屬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青工會所管轄。¹⁹⁷這些黨團進行黨化教育的行徑，真是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黨團在校園內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活動。每月一次的動員月會以及國民黨黨員之小組會議及全校黨員大會等，都借用學校場地甚至挪用學校公款於辦公時間召開。……大專教授在 1985 年以前還年年有「教授同志春節聯歡會」之活動。把「教授」稱為「同志」，黨化色彩也是十足的公開化了。

¹⁹⁴ 引自林玉体，同註 2，頁 46。

¹⁹⁵ 隨著時空更迭，現在學校軍訓人員的工作早就和學務處（以前稱訓導處）、導師的任務疊床架屋，但軍訓室在校園中仍屹立不搖。軍訓課程現今大半已流於形式，學生因為必修課不得不上（現在大學已改為選修），加上高中、大學軍訓課可抵免兵役役期 28 天（相當 1 個月），因此學生為貪便宜，也只好修課。而多數軍訓課實際上也含糊代過，高中若遇到要段考、模擬考時，借課情況屢見不鮮；大學時代軍訓課則成為教官誇耀自己戰功彪炳、大談國內政治的場所。教官為了使自己的課更受到歡迎，學生上課不會窮聊天或猛打呵欠，有時也會看影片，就曾遇到過上課主題名為「野戰求生訓練」，但播放的影片竟然為〈侏羅紀公園〉一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¹⁹⁶ 引自彭琳淞，《政府遷臺後臺灣學生運動變遷之探討——以四個重要因素之互動關係》（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1988），頁 114。文章中有詳細描繪整個組織權力結構圖。

¹⁹⁷ 根據 1986 年的《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所屬組織通訊錄》記載，北知青有 60 個黨部、中知青有 20 個黨部、南知青有 28 個黨部。引自彭琳淞，同註 11，頁 115-118。當時師大即為北知青第 2 個黨部，名為「孔知孝」。

至於校園內黨團活動之摸彩贈品或禮物之豐盛，以及餘興節目之熱鬧，更是早已習慣的校園景觀，不必細表。……而黨團發動的學生應景或充當重要慶典節目之觀眾或隊伍，如元旦、青年節、國慶日、光復節等等遊行或晚會，更是學生課外活動的「正業」。¹⁹⁸

除了上述行徑之外，很多國民黨在學校所成立的學生社團，例如自強社、春暉社等，¹⁹⁹美其名是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為旨趣，但背地裡是以招收學生加入國民黨為目的。尤有甚者，社團成員更是擔當「抓耙仔」、「通風密報者」，蒐集同班同學、寢室室友的「偏差行為」、「偏激言論」，以向上層單位邀功獎賞。當年白色恐怖時期，這些種種行為在校園橫行，如今早已解嚴，在今日民主自由的社會，這些社團竟繼續存在校園！表面上打著「自強聯誼」、「捐血活動」名號，但這些社團的經費永遠比其他社團來得充足，每學期還有高層人士請吃飯，每逢選舉時這些社團成員還要被動員去當特定候選人的「青年軍」，與當年比起來，差別只在今日的社團成員只不過不用再當「抓耙仔」罷了。

今日，社團若站在學術觀點來研究「政黨」、「政治」、「兩岸關係」、「三民主義」，那是無可厚非。但是打著公正客觀的立場，卻被意識型態所操弄，替某位政客背書、接受某個政黨的金錢贊助，而成為政黨的傳聲筒、醜化抹黑別的政黨，這就太不應該了。社團若淪落到變成政黨的附庸，那麼政府每年花大把金錢投注在大學教育的目的不就枉費了！

因此在追求教育的民主化與自由化、「學術自由」的同時，「教官退出校園」的開明改革，更是扭轉「黨化教育」，建立民主教育形象的開始。²⁰⁰

貳、「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反共思想、黨化教育、造神運動

¹⁹⁸ 同註 2，頁 32-33。

¹⁹⁹ 要知道有哪些社團其實很容易，大抵社團指導老師若是學校軍訓室的教官，幾乎八九不離十是由國民黨贊助成立的學生社團。

²⁰⁰ 劉方，〈大江東流擋不住--為軍訓教官退出校園進一言〉，《民眾日報》，1987.11.22，3 版。收於林玉体編，《師生之吼：1987 台灣教育批判》（高雄：敦理，1988），頁 89。

當年國民黨在大陸戰敗，撤到台灣來時，並沒有痛定思痛檢討國民黨內部本身問題，反而將中國大陸的敗戰歸於一連串的學運，因此對台灣的學運戒慎恐懼，無不大力鎮壓這些思想左傾的份子。

也由於狼狽的逃到台灣來，政府高層因此非常仇恨共產黨，於是便極力型塑「仇匪恨匪」、「共產黨是惡魔」等一連串對共產黨負面的形象，希冀成為台灣人生活中共同的「集體記憶」。這是極為弔詭的，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跟日本是敵對國家，1945年前的台灣，嚴格說來還是日本的領土，台灣與「中國」根本毫無關連。1945-1949這4年間，雖然蔣介石下令陳誠掌管台灣，但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國共內戰壓根兒跟台灣完全無關；1949年蔣介石帶著大軍撤退來台，才算真正「中華民國在台灣」。也就是說從頭到尾是國共兩黨之間的恩恩怨怨，與台灣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正因為台灣人的歷史中沒有這項「集體記憶」，因此國民黨只好努力創造這段記憶，硬是強行注入台灣人的腦海中。透過媒體、教育等各種他們竭盡所能的管道，無孔不入的出現在台灣人的生活周遭。從圖 4-1 便可一目了然。

在教育上，對於教材的編定、校園氣氛的營造、升學制度的設計，完全以反共思想為出發點，以「恨」為目的。仇匪恨匪，稱對方為「共匪」的情況下，教育講求「愛」為宗旨，早已被統治者拋到腦後。「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成為一繁榮富麗的寶島；大陸在共匪統治下，人民共著嚼樹皮、啃樹根的生活。」這些字句在筆者求學的生涯中也成為很難抹滅的記憶。

「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早已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口號。在仇匪恨匪的前提下，蔣介石也強調三民主義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主義。1976年中國國民黨十一全大會決議通過〈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一案，台灣省政府教育廳遂於1977年以公函指定省立鳳山高中為「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實驗學校」，其目標乃希望，「啟導學生了解國家民族當前處境，體認革命青年的時代責任，堅定反共復國的信心。」

在該校的分科實施重點中，國文、公民與道德、歷史、軍訓等科目內容與三民主義較有關連性之外之外，其餘如：

圖 4-1 戒嚴體制結構系統

資料來源：楊渡，《強控制解體》（台北：遠流，1988），頁 5。楊渡認為當時國民黨透過意識型態、政治、經濟三個管道，來控制台灣人民，其中教育也屬於意識型態的一環。

地理科：

- 一、從錦繡河山之壯麗雄偉及近代疆土的喪失淪亡，以激發收復失土，重建中華的壯志雄心。
- 二、從台灣風土民族之探討、血緣、地緣之研究，強調台灣與大陸血肉關係，而厚植民族感情，增進團結意識。
- 三、闡述消滅赤禍，重建中華視安定亞洲，促進世界和平的必然途徑。

英文科：

- 一、酌情選用與三民主義思想教育有關資料作為補充教材，使了解三民主義的真諦，並加強民族精神教育。
- 二、隨時將國家政策、台灣進步實例等英文新聞資料，提供學生參閱，以加深其愛國情操。

數理科：

從自然的演化與宇宙的現象，以印證三民主義思想理論的正確性，從而駁斥共產邪說，馬列思想之謬誤與矛盾，以堅定三民主義之思想與信仰。

藝能學科：

加強民謠、愛國歌曲之教學，並講述歌詞之含義愛國歌曲之傳記事蹟，啟發學生愛鄉情緒及愛國志節；加強教習國畫、版畫，使學生體認我國固有的優越的藝術形式。²⁰¹

當整個課程與教材都已成為執政者的御用工具，淪為延續國共內戰的宣傳品，意識型態（反共、推崇三民主義）凌駕在教育之上時，²⁰²倒楣的還是學生。受學校教育的學生幾乎變成「小學小呆、中學中呆、大學大呆」。如此一來，吾人不禁要問，受教育的目的又何在呢？

²⁰¹ 省立鳳山高中，〈高中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實驗報告〉，《教育資料文摘》5 卷 3 期（26 期）（1980.3），頁 56-65。

²⁰² 陳伯璋在檢視我國 40 年來課程發展發現，受到政治權力的支配影響甚大，其中「泛政治化」包含：領袖崇拜、反共復國、國家主義，均在強調「反共抗俄」、「民族精神」。詳見陳伯璋，〈台灣四十年來國民教育發展之反省與檢討〉，收於賴澤涵、黃俊傑主編，《光復後台灣地區發展經驗》（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頁 191-193。

校園氣氛的營造，印象很深刻的是每天朝會唱國歌、升旗時，要面向升旗台，且要立正站好；作文寫作若提到蔣介石、孫文幾位「偉大的領袖」時，一定要尊稱蔣公、國父，且前面要先空一格；進入行政單位各處室時，一定要先喊「報告」；校園中則興建蔣介石銅像供人緬懷（師大的蔣公銅像如今仍屹立在行政大樓前）；學校每年都會舉辦軍歌比賽，得獎者還可代表學校參加縣級、省級至全國級比賽呢！

林玉体回憶道：

國府初據台灣時，為了「殺朱拔毛」，中小學生也紛紛成群結隊，由校長及老師率領，走入街頭，有的裝演「豬」（朱），有的打扮成匪首，一副惡形惡狀模樣的在大街小巷高唱「打倒共匪」、「反攻大陸」、「反共抗俄」、「還我河山」等口號，並高唱愛國歌曲。

筆者於1956年就讀台南師範時，因值金門大砲戰，救國團每發動住宿生三、四時即起床，拿著火炬，穿著軍訓卡其服裝，在台南市市街遊行，這是學生運動的一面。²⁰³

至於職場升遷、升學管道也是一樣。一位訪談者回憶道：

問：他們那時有叫你們加入國民黨嗎？

答：有！有一個叫做職業訓練，受訓一個禮拜，結訓的時候，他就每天叫你加入國民黨。我是比較不乖，我沒有參加。我好多同學，建中的校長、一女中的校長，我同班同學都當了校長，我沒有當校長。

問：建中校長不是李大祥嗎？

答：李大祥是我同班同學！他已經去世了！四五個月了吧！李大祥是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所以想要升官的話，還是要加入國民黨。但是正義之師不削〔屑〕為之。就是因為我沒有加入國民黨，所以我失去很多機會，但是我沒有後悔。我在我的事業方面發展。²⁰⁴

²⁰³ 同註2，頁60。

²⁰⁴ 同註7，附件，頁8。

在升學管道上，包含當年大學聯考、公務人員高普考、公費留學考等大大小小的考試，三民主義一定是必考科目，且跟其他科目佔相同的比重。雖然近年來考科名稱略作更動成：中華民國憲法（精神）、國父思想，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這根本就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做法。嚴格來說公費留學考為何要考國父思想（90年起改考憲法與立國精神），難道要證明考生非常愛國才准予出國嗎？這真是鴛鴦心態！

其他科目也有類似情形，數十年來考試的作文題目往往不出「反共復國」、「推崇三民主義」、「讚揚蔣介石、孫文」這些範圍。因此學校老師常常叮嚀不管考試作文題目如何千奇百怪，例如：「我的休閒生活」、「最難忘的一件事」、「籃球與我」，反正結尾都一定要想辦法硬拗寫說：「反攻大陸，解救同胞」、「蔣公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救星」、「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台灣的教育從小就教學生「敷衍」、「表面」、「造假」，教育淪為威權統治者對人民的洗腦工具時，其實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

國民黨在台灣的黨化教育有多成功呢？以下兩則例子或許可以支持這項論點：

一直到年歲很大的時候，我們才有偶然的機會得知，原來前塵往事，都是被欺瞞矇蔽的紀錄。經過痛苦的思索，才發現自己曾有意無意的充當統治者的幫兇。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她讀北一女中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背著書包端立父親身旁，向父親要錢，說她要加入國民黨，要繳黨費。父親問，為什麼要入黨。她說愛國的人當然要入黨。父親不准，說我是公務員，入黨是不得已的，妳好好一個人，入什麼黨。她眼睛泛著淚光，想必頭上也有聖潔的光環浮現，她略略激動的說只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她想愛國，她要加入國民黨。父親一聽大怒，堅持不准。我的同學哭哭啼啼回房，第二天，向朋友借了一百元，背著父親，偷偷跑去加入國民黨。

我自己讀北一女中的時候，也曾經看見同班同學下課後，三三兩兩在走廊知知喳喳討論報考調查局、情報局的種種事宜。他們一臉肅穆，以為將來可以像電視上的長江一號、長江二號那樣，神出鬼沒，深入

敵境，為未來反攻大陸的聖戰，貢獻所學；至多至少，也可以像 00 七情報員那樣，飛天穿地，五湖四海，以一人身手，從萬惡共匪手中拯救自由世界於不墜。

這又怎麼說呢？從上小學開始，我很快就學會用不太流利的北京話和父親頂嘴。我看不慣他們愛講日本話，愛聽日本歌，愛看日本電影。為什麼他們講到蔣總統的時候，每次都要用輕蔑的語氣，繼之以不屑的表情。為什麼他們不能了解蔣總統的偉大，蔣總統不僅是民族救星，也是人類救星。我常常引用學校教的那一套堂皇壯麗的愛國八股，諸如二十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一年準備、兩年反攻等說詞，因之常常和父親辯得不歡而散。小學中年級的時候，我曾幾次和父親爭辯，以致夜裡躲在棉被哭泣，質問上蒼為何讓我出生於如此一個漢奸家庭。就是因為有向父親這樣的漢奸，中國才會衰落，大陸才會淪陷。

我一邊飲泣，一邊想以後為了偉大的大中國必須大義滅親的痛苦抉擇……。我自小成績優異，還常代表學校赴外地參加國語文競賽，寫一些忠孝仁愛、反攻必勝復國必成的東西，抱著各式各樣的冠軍獎盃回來，很驕傲的上台接受嘉勉。那時候，父親看在眼裡，又是什麼心情？他是不是痛心混雜著不知所措，為什麼他最鍾愛的女兒，會被教成這種樣子？²⁰⁵

黨化教育成功，從以上文字可見一般。此外在中央日報所刊登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1972.4)、²⁰⁶〈南海血書〉(1978.12)、²⁰⁷〈我要做一個中國人〉(1986.7)，²⁰⁸都被國民黨政府拿來極盡宣傳。一則 1979.1.9 關於〈南海血書〉受到各校群起響應，產生感人場面的報導：

²⁰⁵ 胡慧玲，《我喜歡這樣想你》(台北：玉山，1995)，頁 201-203。引自林玉体，同註 3，頁 192-194。

²⁰⁶ 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中央日報》，1972.4.4--4.9，9 版。收於《中央日報縮印本(62)》(台北：中央日報社，1978.8)。

²⁰⁷ 朱桂譯，〈南海血書〉，《中央日報》，1978.12.19，10 版。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2004.4.19)

關於南海血書所引起的「熱烈迴響」，不可謂之不大。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搜尋關於「南海血書」主題的報導，從 1978.12.19 刊出朱桂〈南海血書〉一文，到 1984.10.27 作者嘉彬所寫的〈好書介紹〉為止，中央日報共有 24 筆報導。

²⁰⁸ 七七，〈我要做一個中國人〉，《中央日報》，1986.7.24，9 版。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2004.4.19)

- 一、台中市曉明女中校長閱後即翻印千份，分發全體學生，並請各班國文教師採為教材，為學生詳加講解……，課堂裡先是傳來輕微的抽泣，繼而有人放聲大哭，最後整個教室哭成一片，連老師也哽咽得講不下去了。
- 二、屏東師專校長閱後認為是最好的愛國教材，於是印發各班學生研讀，並令在週記上寫心得報告。導師評閱時發現，有的週記簿上「片片淚水痕跡」。
- 三、光華商工校長即印 4000 份發給學生，並請教務主任講解……該校共翻印了 3 次，超過 10000 多份。其中幾百份是教務主任寄給美國親友當賀年卡，後又翻譯成英文遍寄美國友人。
- 四、省教育廳說，全省大部份學校均自動自發作此有意義的措施，如台中一中、二中、女中等校長，都配合〈南海血書〉邀「專家學者」作專題演講，或舉行過是座談會，達到了教育的實際效果。²⁰⁹

從這兩個例子或許可以論證，當時國民黨所實施的黨化教育是多麼成功了！

參、「槍口下的吶喊」----反對聲音的鎮壓

戒嚴時期對於人民的思想控制非常嚴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書籍均一律查禁，因此連帶像馬克斯等學者的學說，一律不准在課堂上提及。在這樣風聲鶴唳的氣氛當中，檢調單位的查緝採取「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任何一個」方式，比起中國明清兩代的文字獄，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趙制陽回憶道，「有人因為閱讀馬克吐溫的小說而入獄，理由竟是軍情局認定馬

²⁰⁹ 朱復良，〈南海血書的激盪〉，《中央日報》，1979.1.9，6版。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2004.4.19）

克吐溫是『馬克斯的弟弟』！」²¹⁰而1967年，當時《中華日報》有「大力水手」連載漫畫。在報社工作的明華（柏楊的太太）委請柏楊作中文翻譯。其中一幅是大力水手波派和他的兒子流浪到一個小島上，父子競選總統，開場稱呼說：「fellows……」，柏楊當時神來一筆將它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這句話是蔣中正正在台灣歷年文告中的開場白），沒想到竟因此被調查局認定「與共產黨唱和」，到綠島被關了十年。²¹¹像這些冤獄，在當時可說不勝枚舉。

上述黨化教育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成功的，但在戒嚴時期仍是有人對於威權體制表達不滿，不過下場可能非常悲慘。其中最顯著的案件，就是以雷震、胡適、殷海光等人為首，所組成的論政雜誌《自由中國》，當時被國民黨執政當局視為眼中釘。

《自由中國》於1950.1.1、1.16連續刊載〈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其中1.1的內容關於「提倡教育文化事業」部份提到：

我們認為教育文化事業應有自由發展的充分機會，因此我們反對政府干涉教育文化事業或利用學校或公辦的新聞紙、無線電等作為任何一個黨派宣傳主義，灌注教條的工具。²¹²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負責《自由中國》的學者屬於自由主義，不希望政府過度干預，但另一方面卻也看出當時國民黨竭盡所能在實施黨化教育。

不只如此而已，殷海光當時也在《自由中國》發表了許多學術獨立及思想自由的文章，並且鼓勵教育應該超然。在評〈我們的教育〉時更直接了當的希望：一、停止黨化教育；二、主張學術自由等。²¹³在一篇名為〈反攻大陸問題〉的社論中，以公算（即蓋然率）分析後直言，反攻大陸的公算，「

²¹⁰ 〈有人讀馬克吐溫入獄，有人唱愛國歌曲被抓〉，《中國時報》，2001.1.12，5版。

²¹¹ 〈柏楊回憶調查局的套供、逼供、刑求，驚心動魄！〉，《民眾日報》，1998.7.16--7.17，7版。

²¹² 蔣廷黻，〈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自由中國》2卷1期（1950.1.1），頁33。

²¹³ 殷海光，〈社論（一）：「今日的問題之十三」--我們的教育〉，《自由中國》18卷2期（1958.1.16），頁4。

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²¹⁴這種言論坦白說，根本就是戳破國民黨黨化教育的神話。

1958.12 殷海光在台大演講：「胡適與國運」，指出胡思想內容包含：一、主漸進；二、重具體；三、反教條；四、個人本位；五、存疑；六、重實證；七、啓蒙；八、獨立思想。順著這些思想，殷認為中國必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這次演講後，台大當局不准社團請殷作公開演講。²¹⁵1966.8.5 教育部去函台大，擬聘請殷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委員，迫使他離開台大。1966.8.26 殷與校長錢思亮議定該年為形式上的教授，但停止授課，到 1967.7 關係全部消失。1967.9 有關單位勸殷接受教育部新職，殷激動拍著桌子：「我殷海光在這兒」、「我敢拿生命打賭，我不會接受那張聘書，我也不會去做官。」不久殷的家計陷入愁雲慘霧階段，還是靠學生幫忙才勉強撐起。²¹⁶1969.9.16，殷海光不幸胃癌過世。

不只是殷海光而已，很多教授、學生因為參與反對運動或發出異議聲音，結果下場都很慘烈，到 1980 年代前中期（解嚴前）都還是如此。例如 1964 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因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引來牢獄之災；1981.7.2 自美返國的陳文成教授被警總約談之後，於 7 月 3 日被發現陳屍於母校台大研究圖書館旁。

台大哲學系趙天儀教授曾經有一次陪殷海光老師過馬路等紅燈，剛轉綠燈時，趙天儀才要往前走，冷不防馬上被殷海光拉了一把。只見殷左顧右盼了一會兒，才和趙一起往前走。當趙心中很納悶老師剛剛舉動的時候，只見殷不疾不徐的說：「年輕人，你不知道國民黨怎麼製造政治車禍的嗎？」從趙、殷兩人的對話中，配合當時政治戒嚴的肅殺氣氛，就已令人毛骨悚然了，更何況要向政府進諫呢？

當時國中小學設有「安全維護秘書」，從一則投書當中也可以瞭解到當時

²¹⁴ 殷海光，〈社論（二）：「今日的問題之二」--反攻大陸問題〉，《自由中國》17 卷 3 期（1957.8.1），頁 7。

²¹⁵ 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譜簡編--紀念殷海光教授逝世十週年〉，《八十年代》1 卷 5 期（1979.10），收入四季出版事業公司編輯部編，《中國自由主義的領港人：殷海光先生紀念集》（台北：編者，1981），頁 252。

²¹⁶ 同註 30，頁 257-258。

的氣氛：

依學校教育組織章程，並無所謂「安全維護秘書」的正式編制，可是，教育局卻在各校選任教師兼任這種專打小報告，專門監控教師思想的工作。全國教師對這種作法，都感到深惡痛絕，都敢怒不敢言。

那些被選上的人，是安全考核資料上絕對安全忠貞的，要兼任安全秘書之前，還得到教育局秘密宣誓，教學生讀書是不必宣誓的，當特務就不能不宣誓了。

安維秘書每年都要蒐集全體教師的筆跡一份（如手寫油印的考卷，或是教師所寫的教師進修心得報告），送到教育局列管。其實，現在打字很方便，老師們真要舉發不法情事，查對筆跡，根本是無濟於事的，這種作法只不過含有嚇阻、威脅的用意而已！

安維秘書每個月都在學校辦公費中支用一筆安全維護費，只要自己寫一張收據，就可以具領，不必再有其他任何單據來報銷。其實這筆費用就是教育局慷公家之慨，送給安維秘書個人的「獎金」。

安維秘書下課時間常到辦公室，監聽教師們的談話內容。教師們常在談興正濃，一見特務進門，就轉了話題，或作鳥獸散，各做自己的事去了。安維秘書偶爾也會批評時政，甚至有同情反對派人士的言論，藉以「引蛇出洞」，如果有人跟著批評，就正好落入他的圈套，安全資料就又抹黑了一條。

想想看，學校有這種工作人員在，老師們如何能不惶惶恐恐？教育又如何能正常發展？

敬祝 編安

苗栗縣一群國小教師²¹⁷

國民黨在戒嚴時期無孔不入的黨化教育，以及當時所營造出來的肅殺氛圍之下，基本上這樣的教育是呆板、停滯不前的，要受教者學習如何去思考、

²¹⁷ 引自林玉体，同註 2，頁 29-30。「安全資料」、「安維秘書」後來是由陳定南所廢除。

去批判，這些都是不可能的。學生雖然偶而有集體行動，但那事實上根本就是政府「動員學生」的結果。

第二節 黑暗時代·灰色心靈·白色恐怖

--缺頁的 1950-70 年代學運

1950-70 年代，執政當局對於學術思想進行控制，很多大學校園活動也極受打壓。雖然大學是人生的黃金時期，心靈的禁錮無法容忍許久，終也會有嚮往窗外自由的時候，因此這段期間出現了數個學生的集體行動。

壹、新文化運動的展開

1953.11.15 台大學生孟德聲在學校刊物《台大思潮》，發表名為〈論新文化運動的展開〉。根據他對當時社會的觀察，一般人所追逐的方向，大體上不外乎是「拜金主義」、「拜洋主義」。因此他認為若要挽救國家、復興民族，首先要從挽回世道人心入手，要挽救世道人心就需要轉移社會風氣和學校風氣。1953.12.25 孟結合 18 位同學，聯合發表〈我們鄭重宣言：再展開新文化運動〉。²¹⁸

可惜的是，新文化運動至始至終都停留在「原則」，並無「行動方案」，因此幾乎冷卻下來。1955 年陳香梅舉辦了台灣第一次服裝發表會，被學生認為這是一種鼓勵奢侈的行為，於是由胡佛等 8 位學生撰寫〈隔江猶唱後庭花--談所謂「服裝義演」〉一文，打算刊登《台大思潮》表示抗議，不料學校

²¹⁸ 吳國棟，〈再展開新文化運動〉，收於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台北：龍田，1977），頁 9-13。【以下簡稱「丘編」】

認為此舉「失去時效」、「刺激國際友人」而硬生生壓下來，學生一氣之下便將《台大思潮》停刊，同時也宣告新文化運動失敗。²¹⁹

貳、520 青年自覺運動

經過新文化運動事件之後，整個台大校園歸於平靜。當時由於大學開始擴建亟需師資，且中美關係保持穩定的狀況下，很多台大學生投身於學術中，於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便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口號。

吳國棟對於當時的台大學生形容得很生動：

此期（44-52 年）並沒有什麼代表性的活動，台大人彷彿漸漸習慣並安於冷漠，同時由於時間的蹉跎，反攻遙遠，早期的信心與希望難免有些減退，大家表現得比以前更為苦悶。面對學業、事業、愛情三大問題，他們已無熱忱；面對現實、理想，他們也告低頭。「兩耳不聞天下事」，只知「埋頭於實驗室與圖書館之中」，「對社會人士毫無所知，對世界大事不聞不問」，表面上仍然「勵學」，但「敦品」的工夫卻稍遜於前期；「愛國愛人」的具體行動幾乎已成絕響。從好的方面看，此期台大人暫時拋卻嘗試改革的念頭，而專志於厚植實力，以備來日之用；但自另一觀點來看，台大同學不團結、世故，「無思想，終日鬼混，把國家命運、民族存亡置諸腦後」。人情味或許還有，但公德心的匱乏已成為一種嚴重的現象了。²²⁰

1963.5.18 中央日報刊出一篇署名「狄仁華」所寫的文章，〈人情味與公德心〉。²²¹狄仁華本身是美國留華學生，在台灣學業結束準備返國之際，將他在台所見所聞寫成此篇文章。他認為中國人的人情味很濃厚，但是卻缺少「公德心」，並舉出他看到的很多情形。

²¹⁹ 同註 33，頁 21-24。

²²⁰ 吳國棟，〈五·二十青年自覺運動〉，收於丘編，頁 38。

²²¹ 狄仁華，〈人情味與公德心〉，《中央日報》，1963.5.18，6 版。收於《中央日報縮印本（35）》（台北：中央日報社，1979.4）。

這篇文章刊出 2 天後（5 月 20 日），台大校園裡出現署名「一群你的同學」的信和壁報，當然〈人〉這篇文章也在上頭。一句句聳動的標題：「不讓歷史評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不要作歷史的罪人」，就這樣「台大學生自覺運動」就此展開。

這個事件很快擴展成爲全國青年自覺運動：

- 一、5.24 有一位「自覺」的青年，因為過去曾以非學生身份託人購買學生月票 2 張，「自覺」應賠償公車管理處 72 元，乃將現款寄交中央日報，請求代轉。
- 二、5.25 省立成功中學高中部與初中部的應屆畢業生為響應自覺運動，實行「榮譽制度」，考試時自動在黑板正中貼上「榮譽至上」、「榮譽第一」的紙條，考試時果然沒有作弊的事情發生。
- 三、5.27 有 20 幾位少年男女受「自覺運動」的感召，發覺以往的荒唐，遂向警察局表示懺悔與自新，立意以後實踐自覺運動，並好好做人。
- 四、在運動的聲浪中，最有趣的莫過於小學生也參加了。5.24 一群西門國小的小朋友在老師的陪同下，到中華路安全島旁澆花除草，以「培養公德心」。²²²

雖然這是全國性的青年自覺運動，也引起很多人關注，但竟隨後不久就趨於平淡。爲什麼呢？誠如吳國棟事後所分析的：

口號喊得甚是漂亮，但在實踐上似乎少了方法與功夫。因為道德運動的實現本應以個人實踐為本的，是平平凡凡的，不是轟轟烈烈的，要求的是個人塑造自己，而不是大家成全一些英雄人物。而這些運動的領袖們不知，他們固然製造了一些條文、公約……，可是這又有什麼意義呢？隨著新聞性的減低，傳播媒體對這個運動失去了興趣……，

²²² 同註 35，頁 42。

風采就黯淡了下來。²²³

可見一個運動若不是自主性發起，沒有近中遠程規劃，靠的只是口號以及奢望媒體的青睞，充其量只能稱之為「作秀」而非「學運」！

參、社會服務運動、百萬小時奉獻運動

1971.10 蔣介石政權代表退出聯合國，全國民眾譁然。1971.12.8，聯合報刊登由台大、師大、政大三校社團負責人，共 23 名署名的〈我們的呼籲〉²²⁴一文。文章內容呼籲全國青年應該挺身而出，匯聚成一次新的青年大結合，來承擔起救國家的責任。

台大的代聯會後來開會決定要組織一支名為「社會服務團」，專門挖掘出當時最為迫切的社會問題，整理後呈送政府作為施政參考。於是這支服務團先於 1972.1.11、12 兩日舉辦講習，1 月 13 日至 22 日進行調查。但由於匆促成軍，加上種種外在因素，例如有些同學一度以為「服務團是到鄉間為人種田鋤草，到各地清理環境。」²²⁵最後連調查報告都沒有出爐就結束了。

1972 年當時台大代聯會主席謝復生繼續鼓吹社會服務運動，喊出「百萬小時奉獻運動」。呼籲台大人每個禮拜奉獻 2 小時於服務社會的工作上，若以台大 13000 名學生計算，每年就有百萬小時以上的時間，為我們的社會作一點事。其目的在於「提供勞力於農村，並提倡衛生康樂及家庭計畫之觀念於農村」；內容則為「整理環境衛生、推行家庭計畫、醫療康樂服務」；對象是「農民以及都市社區國中青年」。²²⁶

1973.3.19 台大《代聯會訊》刊出一篇名為〈一百萬小時的奉獻〉的社論，響應謝的觀點。沒想到受到媒體大肆渲染之下，代聯會只好硬著頭皮提早在學期中辦了「社區服務、交通服務」。1973 暑假，代聯會派出 9 支服務隊到

²²³ 同註 35，頁 44-45。

²²⁴ 〈國家正面臨強烈的憂患，青年要負起救亡的重擔--台大政大師大學生社團昨熱切呼籲：支持政府改革把國家民族連根救起〉，《聯合報》，1971.12.8，3 版。

²²⁵ 張華，〈蟄伏於象牙塔的愛國心----社會服務運動〉，收於丘編，頁 179。

²²⁶ 同註 40，頁 182。

各地作社會服務，但是在台大校園裡並沒有引起熱烈迴響，最後無疾而終。

1974.10《台大法訊》刊登一篇名為〈社會服務何去何從？〉的文章，批評當時的社會服務。從這幾點我們或許可以看出社會服務是多麼的沒有建設性：

- 一、「蜻蜓點水」式的服務對服務地區的幫助是微乎其微的，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幫助，大老遠跑到中南部上山下鄉，徒然浪費鉅額經費。
- 二、既然參加社會服務工作，何必遠到山地、農村去呢？顯然是「為觀光而服務」，結果是反被人服務，更加以事先準備不週，未能針對當地需要，反而騷擾地方。
- 三、尤其是有些參加服務工作的學生肩披長髮，群著迷你，衣著入時，抱著觀光態度服務口裡喊著為民眾解決問題，實際上一事無成，結果是「空許諾了玫瑰園而徒然造成了更尖銳的物質對立」。²²⁷

但很特別的是，社會服務隊在校園中最後並沒有沒落下去，甚至在當今的大學裡，還是數一數二、熱門的社團之一，其中的轉折容待筆者在「伍、缺頁的學運」再作分析。

肆、獻機報國運動

1975.4.5 蔣介石過世，當時台大代聯會認為除了哀悼之外，應該也要有實質的表現。於是發起募款買戰鬥噴射機，將來可以直搗黃龍、收復河山。由於買飛機需要一筆不小數目，因此在4月8日透過媒體告知全國人民他們這項運動。由於募款全國熱烈響應，一個禮拜內已收到1000萬元。²²⁸

就在此時卻發生了一連串的小插曲。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希望「建館」

²²⁷ 同註 40，頁 183-184。

²²⁸ 丘為君，〈銜哀奮勵，獻機報國--獻機報國運動〉，收於丘編，頁 231-232。

而非「購機」，如此一來使得捐款流向兩方，無法集中。於是產生了一些特殊的現象：往往一所學校匯齊了捐款之後，卻發現學生傾向獻機，但校方卻支持建館；一些空軍眷村還有抵制獻機運動的情況；新聞報導開始忽略獻機運動，將焦點大幅放在建館；金門的金防部派人將捐款送到台灣，一下飛機發現已被改為建館款項；銘傳商專（現今銘傳大學）校方未經全校學生同意，擅自將捐款拿來蓋校園的蔣介石銅像。雖然如此，捐款仍然踴躍。甚至全國各地小學生寄信、寄錢給代聯會；搭公車、問路，找到台大來，捐出他們少許卻是全部的積蓄。「他們的熱忱，使台大代聯會的女同學捧信流淚。」²²⁹

這個活動在 1975.10.13 學生請當時教育部長蔣彥士，將獻機捐款轉交國防部賴明湯上將。但這時又出現了小插曲。在儀式上，沒想到蔣、賴兩人致詞均表示這筆錢會移交給空軍「航空研究發展中心」，作為研究軍機之用，言下之意就是不會把錢拿去買飛機。台大代聯會主席丁庭宇當時致詞則嚴肅強調，最初原意錢是要用來買飛機的，當場使得蔣、賴兩人尷尬不已。後來賴又補充說，錢將會一部份拿來發展航空研究，其餘會用來購機。²³⁰

這個活動算是失敗的。學生應該知道他們被耍了，因為後來根本就沒有買戰鬥機。

伍、缺頁的學運

上述四項內容是從丘為君書中所整理出，丘認定這些都是當時的「學生運動」。但「這算是學生運動嗎？」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來分析：

一、缺乏學運真正的意涵：

如果從林玉体所言學運的三種層次來看，則上述四則學生的「集體行動」均無法稱之為「學運」。例如「新文化運動」自始至終均流於口號形式，根本沒有任何具體行動。

²²⁹ 同註 43，頁 234-235。

²³⁰ 同註 43，頁 236-237。

「青年自覺運動」訴求找回青年學子淪喪的道德倫理，更是莫名其妙。試想中國號稱有 5000 年文化，多少古代聖人賢達都在探討研究人的德行，結果在一位美國人的眼中，台灣人竟是沒有公德心的。有許多人會認為中國人是重「私德」較忽略「公德」，但這也只不過是種「阿 Q 精神式」的說法，安慰自己罷了，中國人到底有哪一點「私德」比別人好呢？道德倫理的問題應放在教育中來談，而如果這樣就稱為學運的話，那麼何必再對學運作定義呢？因為日常生活上一般人的言行舉止都可以稱為學運的話，這樣不是很可笑嗎？

「社會服務、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也很離譜，因為當時時空背景是蔣政權的代表退出聯合國，國際情勢岌岌可危之時，學生為了表達愛國，竟是到台灣各地去作調查、服務，這不是「八竿子打不著」、「風牛馬不相及」嗎？試想今天一位大學生利用寒暑假到國中小去帶服務隊，我們遇到他，難道會問說：「嗨！Johnny，你在從事學運喔！」除非他睥視甚高、目中無人，否則他一定覺得我是神經病。

至於「獻機報國運動」，這只能說是在當時國民黨黨化教育中，神話蔣介石所造成的一種學生的愚昧行為罷了。學生在這過程中有其自主性、也是自動自發沒錯，但卻顯得完全毫無批判精神（當然有批判精神的，在當時可能不是被抓去關在監獄，要不然就是被槍殺了）。「愚忠」的結果，其實是很可悲的，就像恐怖份子的首領要自殺炸彈客犧牲自己一樣，他們認為自己也很愛國，死後也可上天堂啊！而學生的獻機行為最後也沒有如願，錢沒拿去買飛機，卻也不知流向何方，就像炸彈客犧牲自己之後，他的靈魂如果還有思考能力的話，才發現被首領騙了卻也來不及了。

二、口號喊得漫天價響，只有「理念」而缺乏「實踐」：

這四次的學生集體行為都有喊出口號。例如推動「新文化運動」的 18 位台大生在 1943.12.25 曾發表宣言，對於他們當前的任務等七大項喊出 34 句的口號，但實際作法卻只有 3 項：（一）舉行文化座談會；（二）發行雜誌；（三）追隨師長，敦品勵學，身體力行。好玩的是這項活動最後的目標是：（一）造

成革命高潮，準備反攻大陸；(二) 建立民族文化體系，爭取世界和平。²³¹

至於「520 青年自覺運動」也喊出：「不讓歷史評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不要作歷史的罪人」這些口號。不知是不是因為受到狄仁華（外國人）的批評因素，這項活動也出現「我是中國人」的口號。「社會服務、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當時也喊出「呼籲青年的覺醒與自強」等口號，由於釣魚台主權的問題仍爭議不休，因此像「維護國權的獨立與完整」這類口號也在其中。「獻機報國運動」在宣言中也喊出「中正精神永在！」等口號。

綜觀這四次學運口號喊得很多、喊得漫天價響，卻也喊得有些不切實際。如果流於喊口號的激情形式，充其量也只不過讓自己爽而已，當事件過後才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時，當事者學生也該羞愧得無地自容吧！這四次的學生集體行為其實事後都有作檢討，幾乎都得出「學生仍停留在理論的討論層次上，缺乏很多具體的實踐方案」這種結論，如此一來還算是學運嗎？軍隊是每天都要呼口號的，如：「效忠三民主義、中華民國萬歲」。若依此類推的話，我們難不成也要說軍人在從事學運嗎？

三、缺少全盤規劃，只會跟著媒體瞎起鬨：

從丘為君書上的記載我們可發現，這四次的學生集體行動幾乎都是匆忙間定奪，也缺乏全盤規劃，甚至在媒體渲染之下，反而貽笑大方。

例如「520 青年自覺運動」就因為狄仁華的一篇投報文章，因此立即由學生匆促發起。加上報章媒體的推波助瀾，當成了全國注目的焦點時，青年學子全陷入道德品行立即「向上提升」的熱潮。孰料等新聞熱度不再，學生竟然沒有熱情再去遵守那些生活公約，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誠如上述吳國棟的分析，道德實現本應以個人實踐為目的，那有人只在媒體前面表現出我很有公德心，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其次，「社會服務、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純粹因為一篇〈一百萬小時的奉獻〉的社論，受到媒體大肆渲染之下，代聯會只好硬是在學期中辦了「社區服務、交通服務」。當年暑假所派出的 9 支服務隊也因缺乏全盤規劃，在台大

²³¹ 同註 33，頁 10-11。

校園裡並沒有引起熱烈迴響，最後無疾而終。

「獻機報國運動」則起因於蔣介石過世，學生臨時決定募款購機，以表達哀悼與愛國，但是一向青睞學生的媒體，竟因學生與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意見相左，而琵琶別抱，冷落學生的行動（筆者認為應有黨部高層授意）。最妙的是，學生最後還把錢捐給國防部，當時可說黨、政、軍一家，中央黨部當然拿去建館了，怎會理會學生的心意呢？在媒體的刻意略過之下，此項行動也就這樣草草落幕。

四、「一隻看得見的手」：國民黨的操控

在當時仍處於戒嚴階段，國民黨將黨、政、軍的權力操控在少數幾人手上，校園裡都有特務、職業學生在監視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黨化教育的實施之下，怎可能讓學生產生批判性的思想呢？何況學運在他們的認知當中就是一種叛亂的行為、亡國亡家的舉動。

所以每當學生發起校園活動時，國民黨就透過學校高層將這些產生的焦點再度拉回到學生身上。「新文化運動」、「520 青年自覺運動」都是將檢討聲浪移轉到學生自己，而不是去檢討政府；而當蔣介石政權的代表退出聯合國，造成舉國譁然時，學生異議的聲音竟是轉到「社會服務、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上，而不是去指責政府的外交挫敗。否則按照丘為君所描述社會服務隊在校園當時不受青睞，何以能維持至今？學生在自組社會服務隊時，學校高層、救國團均熱心幫助，張羅經費、聯繫事宜，怎會有如此好康的事呢？殊不知當時政府打的如意算盤是，讓學生利用假期到社會各地服務，藉此消磨他們的時間、精力，如此一來學生自然就無暇聚在一起，在那邊評論時政、批評政府，而國民黨政府也就自然而然繼續維持其政權。當某團要下鄉時，都會有某主任、長官來送行，到了當地，地方首長還會舉行簡報，學生似乎變成上級指導員的分身來視察。鬥志與熱情就這樣被消磨掉了。²³²直至今日，救國團都還繼續對服務隊提供補助呢！²³³

²³² 編輯部，〈南方朔、錢永祥、王復蘇三角鼎談--回首當年話保釣〉，《南方》11 期（1987.9），頁 38。

²³³ 筆者大二升大三那年暑假，與學長自組服務隊，曾向救國團申請補助。由於 2000 年適逢總統大選，當時救國團還號召全國的服務隊到成大參加「服務隊誓師大會」，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因為會場從頭到尾都是在替國民黨候選人造勢罷了。但為了補助款項（39000

至於「獻機報國運動」美其名為愛國行爲，但從頭到尾都有學校校方居中斡旋，甚至很多國民黨黨員捐款湧入，連最後這筆錢也捐給國防部卻無疾而終。

從以上這四起校園裡的學生集體行動可看出，學生並沒有自己的「主體性」及「自主性」，也沒有發揮其「批判性思考」，對社會往後發展也無多大影響，因此不能以學運來論之。

第三節 保釣·民主自由·杜鵑城

--1970 年代台大的校園事件

上述四則校園內學生的集體行動，嚴格說來不能算是學生運動。但台灣在 1970 年代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也曾導致大學校園內青年學生自動自發，開始對國事的關心，以及對政府的質疑、批評，要求檢討的聲浪。正當學生開始走出校外，民主的火苗點燃之時，卻又被國民黨政府強力反撲，使得 1970 年代的學運發展也無疾而終。雖然 1970 年代要求民主自由的台大學運，只是曇花一現，但對於 1980 年代學運的開展，卻埋下日後茁壯的種子。

壹、保釣運動

1949 年國共內戰，使得國民黨敗戰來台，大陸遭到共產黨全面佔領。由於國民黨反攻無望，而共產黨又無法拿下台灣，造成兩黨持續對立。整個國

元)、當天還有車馬費、現場備有茶點之下，所以大家幾乎勉為其難參加(筆者當天碰巧有事，因而沒有出席)，事後還會要求學生參加大大小的活動，因為補助款項已發，所以也就沒有人理救國團了。在現今時代都如此了，何況當時戒嚴時期政府對服務隊的控制呢！

際情勢發展的走向，也從一開始對台灣有利的情況之下，慢慢優勢移向中國大陸，釣魚台事件就是在這樣背景之下發生的。

1970 年代台灣一連串的外交重挫，與當時台大所興起的一波波學運有密切的關連。茲將 1970 年代台灣的外交重大事件條列如表 4-1。

表 4-1 1970 年代台灣重大的外交事件

年份	台灣重大的外交事件
1971.4.9	美國國務院宣稱，擬於 1972 年將包括釣魚台列嶼在內的「南西群島」行政權交還日本
1971.7.15	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即將訪問中國大陸
1971.8.2	日本首相田中也表示將訪問中國大陸
1971.9.16	尼克森聲明贊成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及獲安理會席次
1971.10.26	台灣宣布退出聯合國
1972.5.15	美國將釣魚台列嶼與琉球移交給日本
1972.7.5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聲言將撕毀「中日和約」，努力「日、中(共)關係正常化」
1972.9.25	日本承認中國大陸；中日斷交
1975.4.5	蔣介石過世
1978.8.20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訪問中國大陸
1978.12.16	美國總統卡特宣布 1979.1.1 將與中共建交；並於即日起，與台灣斷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同時失效

資料來源：整理自丘為君，〈受創的民族主義--中美斷交後的台灣學生運動〉，收於丘編，頁 255。

當 1971.4.9 美國宣布將在 1972 年將釣魚台主權歸還日本時，台灣全國震驚，一年多的保釣運動就此展開。當時台大的學生在校園掛起了許多抗議的布條：「釣魚台是我們的。我們堅決的抗議日本無理的要求、美國荒謬的聲明。我們永遠支持政府。」、「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

殺戮不可以低頭。」、「釣魚台是我們的！同胞們！不能再沈默！嚴重抗議美、日藐視我國領土主權！台大人該是覺醒的時刻，起來為維護釣魚台主權而戰！」等非常激昂的字語。

1971.4.14、4.15 兩天分別有台大、師大和政大僑生示威遊行。洪三雄認為這有三項意義：

- 一、台灣直到七〇年代，都在國民黨「黨、政、軍、特」的嚴密控管下，過著「動員戡亂時期」的「戒嚴」生活。僑生行動鼓舞了大家起來參與愛國行動的勇氣和信心。
- 二、當局基本上不希望看到學生運動。因為在國民黨的歷史中，從沒聽過大陸淪陷而坦然自責，卻只一昧諉過於反抗國民黨的群眾活動。所以即使台大御用校長閻振興、訓導人員勸阻，示威遊行仍照常舉行，即使警特人員穿插在遊行隊伍中，也容忍學生搖旗吶喊，而未鎮壓，大概是感同身受吧！
- 三、台大的代聯會顯得相當軟弱，主席李大維甚至被指責「未有表現出它的關心和熱忱」、「在群情激憤之時，表現這種不夠積極的態度。」²³⁴

但是關於這兩天的遊行，張晉城卻回憶道：

……學生隊伍自組糾察，約有 1000 餘人參加，大家都穿制服。警方聞訊，遂在台北北門口美大使館附近街道四周布置拒馬，管制人車。不過，治安人員對抗議的學生甚為禮遇，似乎是學校及黨政機關的有意安排。學生還高唱「滿江紅」，「雖然唱得荒腔走板，步調不一，但大家聲嘶力竭，頗為感人，……」²³⁵

對照洪的第 3 點，大概可以還原當時的情況是，自從 1970 年代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國民黨其實早就知道局勢對自己相當不利。在海外的留學生都察

²³⁴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台大學生運動》（台北：自立晚報，1993），頁 9-10。

²³⁵ 引自林玉体，同註 2，頁 63。

覺到這個情況，唯獨國民黨卻仍在島內盡可能封鎖消息，竭盡提倡黨化教育、訴諸民族情感，可以看出國民黨還是處於「報喜不報憂」、不願自身檢討的心態，目的應該是出於社會若開始動盪不安，恐會危及到他們執政的地位及利益。

美國的這項舉動國民黨雖驚慌失措，眼見大勢已去，也只好將傷害減到最低。麻煩的是在國內學生的反應，國民黨唯恐學生的情緒演變成不可收拾的行動，進而擴展成一波波的學運，國民黨的權力中心恐將造成動搖。因此一方面安撫學生：

學生（尤其是大學生）如能心無旁騖的唸書，即已進了本分。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處理，自非大學生有權可以過問。²³⁶

一方面國民黨的黨務系統早就滲入各校園之中，企圖沖淡學生可能舉發的行動：

政府只是一味的讚美學生的愛國舉動，但對於釣魚台事件如何善終，則支吾其詞、或敷衍以對。加上赴美留學生在如火如荼的展開保衛釣魚台運動之後，旋即對國府失望，轉而對中共的強硬外交交涉心存好感。國府警覺此種保釣的學生運動已不利於己，乃不准學生繼續進行該種運動。……隔了數日後馬上將各種標語紙條洗刷得乾乾淨淨，首謀份子還受到特別監視，不少僑生因而被遣返僑居地。

從這些行動的具體徵象來看，在黨化教育甚為徹底的校園裡，大學生可以於戒嚴令下公然聚眾遊行而受到情治單位的禮遇，並且張貼標語的牆壁可以在一夜之間立即恢復原狀，這必然是「上級」指使所造成。國民黨不願學生運動「變質」或有「野心份子」潛藏其間，興風作浪，這對「校園安定」有莫大的傷害。²³⁷

然而可悲的是，

²³⁶ 同註 2，頁 64。

²³⁷ 同註 2，頁 63-64。

絕大多數大學生被蒙在鼓裡，不知國民黨當局如何以釣魚台領土為籌碼，以換取中華民國國名能保留在國際組之上。²³⁸

在僑生的遊行示威之後，及國民黨的錯愕之中，台大學生也意外組成了「保釣會」。但保釣會的作為充其量也只能舉辦座談會、請官員來講話、發表聲明，根本於事無補，洪三雄就認為：「潛意識裡，我感到保釣會的前景顯然已經種下了「交差了事」的惡根，難期應有的成長與發展。」²³⁹果然後來除了 1971.6.17 的大規模抗議之外，根本有沒有實質的幫助，1972.5.15 釣魚台還是移交日本管理，隨後保釣會 1972.5.22 也宣告解散。

但在處理釣魚台這件事上，學生對政府高層相當不滿，尤其 6 月 17 日的示威遊行竟然還遭到政府和學校百般阻撓，洪三雄回憶道：

遺憾的是，同是讀書不忘救國的青年，師大和成大的學生只准在校園內遊行示威；政大、淡江、逢甲學院和海洋學院的學生，只能發表書面以示抗議而已。政府對於青年一代的愛國運動，豈是一昧盲目壓制所能解決？²⁴⁰

錢永祥也說道：

只記得有一回，我們遊行經過師大，還站在師大門口喊：「出來啊！出來啊！」結果師大把大門關起來。²⁴¹

台大學生對於國民黨高層、學校行政體系這樣的做法，深感不滿，也烙下釣魚台事件後，學生開始在校園內撻伐學校諸多腐敗的措施，並展開「言論自由、民主生活在台大」一連串的行動，但國民黨也不是省油的燈，暗地裡的逮捕行動才正要開始登場。

或許保釣存在有愛國運動或民族主義的性格，而且當時有很多人希望把

²³⁸ 同註 2，頁 64。

²³⁹ 同註 49，頁 24。

²⁴⁰ 同註 49，頁 38。

²⁴¹ 同註 47，頁 39。

保釣變成一個政治性的學生運動。²⁴²但錢永祥認為：

我自己通常不太願意稱呼 1970 年代初的保釣運動為「學生運動」，因為運動裡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成分與其他訴求並沒有機會區分清楚，而釣運相應於 1970 年代初期世界局勢的深一層訴求，也無法明火執仗地拿出來討論。²⁴³

在保釣運動當中也有一些意外的插曲發生。當年最初參與保釣運動的大都是以外省籍身份的學生為主，後來才陸續有一些台灣籍的學生加入。但也因為如此，後來海外保釣運動也逐漸變成一項政治運動，亦即促成「海峽兩岸統一」，變成統派運動。受到此刺激，在美國的台灣同鄉運動在保釣事件後才快速發展。²⁴⁴

貳、民主自由 vs. 〈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洪三雄認為保釣之後，台大的學生活動轉趨活絡，而「學生也開始想講話、敢講話、愛講話了。」²⁴⁵但對國民黨而言，學生則是「越來越不聽話了！」

當時台大學生認為校園的言論是不自由的，包括：學生刊物的文稿必須經過訓導處通過才能刊登，換言之學校握有生殺大權；學生、社團邀請演講人也非要訓導處批准不可，但行政人員私下有「拒絕往來戶」的黑名單，因為這些自由派學者「思想有問題」、「言論有偏差」、「政治有危險」，連自己校內老師都有人上黑名單，而拒絕學生的理由不外乎：「你們為什麼非要請這個人演講不可呢？」、「你們可以邀請別的人演講啊！」、「這個人的演講，我們作不了主！」曾為台大學生的陳少廷回憶道：

據說，某一政黨單位曾列舉其所推薦的學者名單，供學生社團邀請演講人的參考。我不願意懷疑或猜度此舉之用意，但我不能不指出這種

²⁴² 同註 47，頁 35。

²⁴³ 錢永祥，〈跋：青春歌聲裡的低調〉，收於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時報，2001），頁 318。

²⁴⁴ 同註 47，頁 35。

²⁴⁵ 同註 49，頁 56。

作法恐怕不是明智之舉。²⁴⁶

若是學生演講，訓導處也是要禁止的，且對讀書會嚴格管制；同時訓導處也利用對社團的財務補助，迫使學生的出版刊物必須對政府「歌功頌德」。

台大學生歷經千辛萬苦、排除萬難，終於在 1971.10.15 舉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會後由於輿論壓力排山倒海而來，也迫使校方不得不回應學生的要求，而修正了之前一些不合理的制度。

1971.11.25 台大學生也接著舉辦「民主生活在大台」座談會，上次是希望台大校園能言論自由，這次則是希望不只是台大，而是整個台灣能民主。會中最受到引人注目，事後引起軒然大波的，即是台大哲學系講師陳鼓應發言內容中所提倡的「開放學生運動」。²⁴⁷

簡單來說，陳的重點大約如下：

本文所說的「學生運動」，即是一種「自覺運動」，一種「革新運動」，同時也是一種「愛國運動」。簡單地說，學生運動不過是意見參與的行動。學生運動不僅不足畏懼，還值得各界人士支持。²⁴⁸

陳的言語一出，所有言論立刻排山倒海而來。包含 1971.11.29 劉語安翻譯的〈教育即參與：大學民主化〉²⁴⁹刊登在《台大法言》第 15 期，這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是難能可貴的。其所揭櫫追求與維護學生的權力，在今日台灣的高等教育中應該或多或少也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啓示。文章中主要論點包括：

一、批判目前大學的寡頭政治：

目前大學的管理，可以說是一種寡頭政治，由少數人作決策，壟斷了

²⁴⁶ 同註 49，頁 98。

²⁴⁷ 陳鼓應這部份的內容後來刊載於《大學雜誌》49 期（1972.1.20），標題為〈培養參與感及開放學生運動〉。收於丘為君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頁 778-790。

²⁴⁸ 引自洪三雄，同註 49，頁 212。

²⁴⁹ 原作者為 R. S. Powell Jr.。此篇文章為 1971 年初 Saturday Review 期刊討論「誰來運轉大學」（Who runs the University）專題時，發表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被取為學生意見的代表。引自洪三雄，同註 49，頁 202。

大學教育的目標、內容和方法。很明顯的，目前的大學不是民主管理。我們無需驚異，因為如果把大學教育的目的當作計算學分、頒發文憑，那就根本不需要什麼民主管理了。

二、「大學民主化」勢在必行

如果我們認同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學生自我發展，如果我們認為學生自己作決定、自己學習、自己工作的能力很重要，那麼「大學民主化」勢在必行。

三、「大學民主化」的步驟

- (一) 推翻目前的分數制度：讓學生和教授一起評判學生的成績及教授的教學。
- (二) 限制學校人員的權力：今日大學中的教學策略，完全由學校人員片面決定。流弊所及，大學裡存在著多少無聊的課程，多少無能的教師！因此，學生應參與決策。²⁵⁰

接著 1971.12.3 台大《代聯會訊》創刊號上，傅魯的〈當前學生運動的意義與作法〉，也聲援了陳的主張，其對學運的擘化值得我們現今的大學生（知識份子）深思：

一、學生運動的本質：

- (一) 客觀而言，學生是未參加進現實政治及社會利益角逐的一群，也是既不以權力制人也較不為權力所制的人，正因為學生與現實競爭的隔離，所以不會因己利而失去公益，也不會為庇私而損正道。他們較不必顧慮到權力的威脅，也不會隨權力而腐化。
- (二) 學生運動的出發點總是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往往挾著清教徒的心情，以洗淨既有邪惡不公為目的，正是一股清清的血液，代表了正義的力量。
正因為具有這樣的本質，學生運動往往指出一個完美的方向，它所造成的衝擊，對一個社會應是一劑防腐劑。但也因為學生運動對於社會既成制度是一種衝擊，對於權利階級是一

²⁵⁰ 引自洪三雄，同註 49，頁 88-89。

種挑戰，對於以認同於此社會現狀的人也是一種刺激，所以學生運動往往會被曲解為洪水猛獸，甚至在保守勢力的圍剿下，被趕盡殺絕。

二、學生運動兩大目標：

- (一) 中國學生運動的主要目標，在求民主獨立自主的生存。
- (二) 知識份子必須要與其他階層人士結合、走入廣大民眾之間。中國學生運動如果揭櫫救國職志，就不可忽視貧民、農工、市井走卒的苦痛與意願。中國的民眾何在？在田間、在工廠、在礦坑、在街頭。若與他們脫節，若視社會各層人士為無物，學生運動又有什麼意義可言？²⁵¹

頓時間，學生、教授的言論傾巢而出，不管是針對校園內諸多不合理的制度多所批評，對社會上許多沈疴腐政有大肆批評，一時間讓國民黨政府招架不住。終於，國民黨還是出手了。

陳鼓應在座談會上發表支持學運的一席話，在 1972.1.20《大學雜誌》49 期登出後，御用報紙中央日報也隨後在 4 月 4 日登出筆名為「孤影」所寫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連續 6 天，強力駁斥陳的論點。²⁵²當時在國民黨的強力運作下，將文字濃縮成 20000 字的小冊子，各公家機關、學校、部隊

廣
為散發，最後竟然突破 60 萬冊！²⁵³

陳本身以及支持陳的人士，於是也開始展開反擊，雙方論戰就此展開。4 月 21 日陳鼓應不但在一場演講上反駁孤影的論點，5 月 20 日《大學雜誌》53 期刊登陳鼓應〈再論學生運動〉、張亞淦〈論學生運動〉兩篇文章，²⁵⁴反

²⁵¹ 引自洪三雄，同註 49，頁 205-206。

²⁵² 同註 21。

²⁵³ 孤影本名敏洪奎，為外省人，在寫完〈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之後，曾受到國民黨的重用。1980 年代開始在海外經商，對於當初這篇文章頗有否定之感。目前孤影人定居台北，轉向認同台灣應該本土化、民主化的主張。2004 年總統大選，重出江湖，撰寫《我為什麼選擇支持阿扁連任》小冊子，探討外省選民對於民進黨的敵視及疏離現象。孤影並透過友人在台北印行五千本，還與民進黨競選總部聯繫，希望民進黨協助印行上萬本，在台北都會區及眷村散發。詳見邱垂亮，〈再見孤影〉，《台灣日報》，2004.3.18。取自：http://www.taiwandaily.com.tw/news.php?news_id=16930&A4text=孤影#（2004.5.28）

²⁵⁴ 陳鼓應，〈再論學生運動〉、張亞淦〈論學生運動〉兩篇文章均刊載在《大學雜誌》53

駁孤影的論點。好玩的是，這兩篇文章先是投稿到中央日報打算與孤影打筆戰，沒想到先被中央日報作掉了。當時整個台大校園也是一面倒支持陳的論點，《大學新聞》、《台大法言》、《大學新聞》、《文訊》、《台大醫訊》等學生社團、刊物，紛紛發表文章嚴厲抨擊孤影，甚至連當時法律系林紀東教授（身兼大法官）、經濟系孫震教授（日後任台大校長）都為文抨擊。但在這股反孤影的聲浪當中，唯獨趙少康在 4 月 24 日《畢聯會訊》8 期社論，以〈大學生的責任〉一文，和馮滬祥在 1973 出版的《青年與國難》為文，二者公開盛讚孤影的論點。

5 月 2 日台大法代會舉行「聯合演講會」，討論〈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快結束時，現場學生要求讓非主講人的陳鼓應也講幾句話。在陳講完話，主席也準備宣佈結束時，這時馮滬祥竟強制站上台發言，並抨擊王曉波等人的言論，演講會就在大家不歡而散中結束。但雙方的爭鬥，緊接著在年底另一場座談會上更加爆發開來，終於引發了著名的「台大哲學系事件」。

參、台大哲學系事件

關於當時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發展，經由趙天儀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一書，²⁵⁵與台大哲學系事件小組所完成的調查報告書，²⁵⁶除了一些小細節尚未釐清之外，大致上藉由這兩本書已經可以還原整個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來龍去脈。從這起事件可以看到，當時政治是如何介入校園，並無所不用其極打壓這群他們眼中的「異議份子」，以維持「一言堂」的校園安定。如果連標榜校風自由的台大都如此的話，又遑論其他大學呢？

一、關於「職業學生」事件

1972 年上半的焦點幾乎鎖定在孤影的文章，雙方在對「學生運動」作論戰。到了下半年，則是學校開始修理、報復那些支持陳鼓應論點的社團以及

期（1972.5.20）。分別收錄在丘為君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頁 823-839、793-822。

²⁵⁵ 趙天儀編，《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台北：花孩兒，1979）。

²⁵⁶ 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5）。

刊物。另外一個焦點則是鎖定 5 月 15 日美國還是如期將釣魚台主權移交日本，造成台灣學生的遊行示威，於是台大《大學論壇》於 12 月 4 日舉辦「第一次民族主義座談會」、12 月 11 日舉辦第二次，兩場的學生出席都非常踴躍。

12 月 4 日的座談會上，當時陳鼓應為主講人之一，在發言時有說到：「我們應該把大陸學人的成就（如資料的整理和古物的發掘）跟中共政權分開。」此時人在現場的馮滬祥立刻起身說了：「大陸學人的成就，並不意味說中共政權應被歌頌。」、「陳先生專門攻擊政府的黑暗面。」陳鼓應回說：「大家都知道你是職業學生，有意見向你上級報告就好了。」哲學系學生錢永祥也回說：「對於職業學生所講的話我們不要聽。」據陳回憶，座談會後馮還請教陳關於「馮是職業學生，究竟陳是聽誰說的？」²⁵⁷

不料，12 月 13 日校長閻振興在訓導長俞寬賜的主導下，竟發出訓字第 8695 號公文要求陳作說明，陳也在 12 月 25 日回覆作說明。

關於這件事，洪三雄提出批評：

「職業學生」是什麼東西？也許大家心裡有數，至於馮滬祥是不是白色恐怖下，專門陷害忠良而為台灣人所不恥的「職業學生」？根本不值一笑。不過，一個座談會中的幾句閒話，馬上會有「軍訓人員」打「報告」；而一個「學生」，居然可以為此向「校長」告狀；更妙的是，「國立台灣大學」竟然會因此「挺身而出」要求「副教授」作合理說明。這些豈不都是空前絕後、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壯舉嗎？馮滬祥這個「學生」，也著實太令人刮目相待了。²⁵⁸

12 月 21 日訓導處再次發公文給趙天儀（時任哲學系代理系主任），要求解除陳鼓應導師職務。因為陳鼓應早已拿到校長聘書，且系主任並無解職權，因此趙回覆說「窒礙難行」。「據說，我這樣的處理被訓導長視為『抗命』。」²⁵⁹而 1973.1.1《大學新聞》386 期也被校方強制要求刊登陳、馮兩人聲明時，需將馮的置於頭條。²⁶⁰

²⁵⁷ 同註 70，頁 17-18。

²⁵⁸ 同註 49，頁 386。

²⁵⁹ 同註 70，頁 23。

²⁶⁰ 馮滬祥，〈鄭重聲明〉、陳鼓應，〈有關「職業學生」之說明〉均刊載於《大學新聞》

同一時間，12月12日訓導處也發函給錢永祥要他解釋，錢在12月16日回覆了，結果被校方以「言論荒謬中傷同學」為由，「記大過一次」以正視聽。錢的導師正好是趙天儀，在1973.1.3懲戒委員會上，趙當面請教訓導長俞寬賜，結果「俞訓導長對我上述的疑問，未曾回答。」²⁶¹

1973.1 馮滬祥出版《青年與國難》，書中批評陳鼓應等人在「民族主義座談會」上的言論。2月寒假期間，警備總部逮捕陳鼓應、王曉波、錢永祥、盧正邦、黃道琳、洪三雄等人，後來問不出任何罪證，只好草草放人。當時陳等人被抓去約談隔天，趙天儀曾問閻振興校長，閻竟回說：「陳鼓應和王曉波被傳訊，是由於對『職業學生』問題的處理使有關方面不滿意所致。」²⁶²

4月教育部突然下令哲學系研究所「暫停招生」，5月底閻振興宣布不續聘陳鼓應、王曉波，後來又同意只續聘王一人。

二、關於馮滬祥「邏輯零分」事件

馮本是東海化學系畢業，因此按照哲學系規定必須補修「理則學」，此為一學年的課程。第一學期只繳交報告，因此馮順利過關；第二學期授課教師楊樹同要求考試，結果馮說：「楊先生，你何不送佛上西天。」²⁶³由於要求以報告代替考試無效，轉而向系申請以大學修的「微積分」取代「理則學」。當時趙天儀委請林正弘教授以及數學系教邏輯的洪成完教授表示意見，結果兩人均表示不妥，甚至連文學院朱立民院長都不贊成。

馮只好準備考試，結果竟考了零分。²⁶⁴趙唯恐閱卷有誤，當面邀請另外四位也教理則學的教授和馮現場重驗，教授一致都認為零分無誤。結果馮在7月2日寫信給楊樹同，開頭竟寫「樹同學長大鑒！」而第一段文字今日看來，馮似乎早就知情且在暗示哲學系將面臨大整肅的命運：

(1973.1.1)，4版。收錄於《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3。

²⁶¹ 同註70，頁28。

²⁶² 同註70，頁32。

²⁶³ 同註70，頁33。

²⁶⁴ 馮的答案卷收錄在《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83-86。

楊先生您好，專程來訪，未能拜候，甚覺悵然，後生本為誠懇解釋誤會而來，語云：「冤家宜解不宜結。」況且而今看來系務整飭在即，若能承先生見納，想對大局及楊先生皆不無益處也。²⁶⁵

三、哲學系整肅事件

陳鼓應事後不久遭到解聘，8月7日第1078次行政會議紀錄：

哲學系及研究所兼代主任趙天儀副教授，以教學及工作繁忙，函請辭去上項兼職，經同意並同意聘請孫智燊客座副教授兼代。²⁶⁶

但趙關於其系主任一職被解除、以及陳被解聘事前都不知，顯然背後有人運作。而孫智燊一接系主任之職後，便開始整頓哲學系。除一天到晚打同事小報告、甚至栽贓同事是小偷、召開「緊急會議」誣衊系上同仁「公然為匪宣傳」等大大小小的風波。由於大家受不了孫的言行，於是曾在9月7日去函閻校長，以解決問題，當時共有曾天從、趙天儀、劉福增、張瑞良、林正弘、楊樹同、黃天成、郭實淪、王曉波9位教授連署，沒想到日後竟遭到孫的報復。1974.6在謝師宴上，孫向學生宣布解聘趙天儀等7位教授；1974.6下旬文學院代院長、各系主任、以及諸位教授拜訪校長，詢問解聘的事，孫知道後表示：「他們去鬧好了，好戲還在後頭！」並暗示趙已被監視；1974.7校長約見趙，說「如果沒有孫來這樣亂搞，你跟王曉波就不會有問題。」言下之意表示愛莫能助，又表示俞訓導長向教育部與救國團打趙的小報告。

四、餘波盪漾----吳二煥退學事件

吳二煥本身是韓國人，因對中國哲學有極高興趣，1977年大學畢業後來台進入台大哲學所就讀，當時系主任為黃振華。9月時修習黃所開「哲學基本問題討論課」，於課堂上對黃所講「三皇五帝」有疑問，於是起立發問：「是不是真的有三皇五帝？」黃竟回答：「如果你對考據有興趣，應該去讀歷史系，不必念哲學系。」²⁶⁷

²⁶⁵ 馮的起筆信函收錄在《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頁91-93。

²⁶⁶ 同註71，頁113。

²⁶⁷ 李慶榮，〈學生不可以發問----台大研究生吳二煥的故事〉，《台灣日報》，1978.3.18。收於《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頁120。

1978.1 在課堂上討論漢代思想時，吳生再次提出一個問題想解釋他對考據同義理的看法，結果還沒說完，黃大罵「對師長不恭，態度倨傲。」接著還一連串責罵，吳深感困惑何以台灣的大學師生之間討論學問會如此火爆。

下次上課，黃竟然要求吳生寫悔過書，待吳繳交上去後，黃又要求必須將一段吳的解釋刪除，待吳再呈送上去後，2 月份召開學生獎懲會，依照悔過書，吳二煥被記大過（會中據說黃要求學校開除吳生）。後來吳所修習的這門課只得到 45 分（全班只有他沒過），且操行得到劣。因為吳生必須依靠獎學金才能生活，因此後來只好轉向日本申請學校就讀，離開台灣。

第四節 學生運動？「動員學生」的年代

本章探討關於 1950-70 年代學運，由於國民黨黨化教育實施的因素，所以這時期學運的「噤聲」是有道理的。雖然 1970 年代當時台大有所謂的自由派學者，學生也因釣魚台事件而有些反動。但國民黨藉著其優勢的黨政軍，控制著整個校園，對老師解聘、學生遭到退學、逮捕坐牢、甚至是派人暗殺，校園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圍當中，用「死氣沈沈」來形容當時的校園一點都不為過，而台大哲學系事件更只是國民黨打壓異己的冰山一角罷了！

壹、動員學生、迫害學術的年代

本章第二節探討關於 1950-70 年代的校園學生集體行動，但在丘為君的書中則將「再展開新文化運動」、「520 青年自覺運動」、「社會服務、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獻機報國運動」、「保釣運動」歸類為當時的學生運動。

如果以林玉体對學生運動所分成的三個層次：對教師上課方式、教材不

滿；對學校行政體系的不滿；進而走出校園，對社會勇於提出批判。若單純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這些可以稱之為「學生運動」。但是應該再加上探討學生行動所標榜的目標、整個行動的過程、以及整個行動的內涵，才能判定是否為學生運動。尤其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學運中，「學生的主體性」存在與否的問題。

在第二節分析到丘為君所標榜的學生運動，如果要嚴格來說的話，充其量也只不過是「愛國運動」或「民族運動」罷了！學生愛國、愛社會並沒有錯，但是並不能因此無限上綱到變成一種「偶像崇拜式的民族主義」，失去理性而只剩感性、熱情的一面，對於領袖、國家以極盡瘋狂式的舉動來表達他們的效忠，而掌權者又不斷以「造神運動」來合法化他們的法統，可悲的是當時共產黨在大陸、國民黨在台灣都在玩這套策略。現在回過頭去檢視，這跟現今恐怖組織成員為效忠領袖、天神，而有「自殺炸彈客」的瘋狂行為，以及二次大戰日本的敢死隊效忠天皇的行動，又有何兩樣呢？少了「批判精神」，又怎能違論為學運呢？

最重要的是學生的主體性是否在學運當中彰顯？從前述林玉体的著作，以及史料裡早已發現，國民黨這隻「看得見的手」其實一直在背後操控。當學生對社會、國家產生批判時，政府就讓學生到偏遠地方作服務，耗費他們精力、消磨他們志氣，就像共產黨當年將知識份子下放到邊疆去勞改一樣，如此就不會危害到執政者的政權。而當台灣的外交受到重挫，學生再次提出批判時，國民黨借力使力，運用學生的示威遊行，來表達政府捍衛釣魚台的決心與學生一致，政府是很努力在斡旋。但另一方面卻為了國號能在聯合國生存，而暗地裡與美國協議，放棄釣魚台，其實國民黨早已知道再怎麼抗爭也於事無補，而很多爭議也源自於國民黨死守的「一個中國」主張。

國民黨知道學生的情緒升高到有可能挑戰執政者時，這時立刻逮人，嚴禁學生擴大活動，甚至抹黑醜化他們的行為：「與中共隔海唱和」，外交是政府的工作，學生把書念好即可，軟硬兼施下，硬是把學生的聲音消弭。因此在這些事件上並沒有看到學生的自主性並無法成為整個運動的主體，因此稱為「學生運動」未免太過膨脹了些。

而保釣之後的台大校園，在一些自由派的學者以及學生，對於政府、校

方的不滿，進而提出批判，符合了林玉体所言學生運動的第二、三層次，本是大有可為的。但國民黨一波波的鎮壓，使得 1970 年代可能燃起的學運火苗，硬是被吹熄，甚至發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

趙天儀認為「台大哲學系事件」產生很多方面的影響：

- 一、它使得台大哲學系失去一大批懷抱熱情，富於活力，受過良好專業訓練，並且比較具有懷疑、批判精神的年輕教員；哲學系的師資陣容一度幾乎為之一空；其後憑藉特殊黨政關係而進入哲學系的多位繼任者，業經證明在人品和能力上都遠不如他們。因此，才會有後來類似吳二煥課堂上不適任的教員擔任不適任的課程之情況發生。
- 二、它使台大哲學系，甚至整個台灣哲學界，其後的學術研究方向發生了重大的改變。譬如：邏輯和方法論的研究受歧視，比較富有現實意識和實證精神的現代歐美哲學之研究遭到壓抑。中國哲學的研究，觀點也傾向保守，只敢站在歷來所謂的「正統」的立場發言，甚至沈溺於卜相、方術等枝末。
- 三、整個學風，因此由開放、自由、活潑、進取，轉為拘謹、呆滯、死氣沈沈。討論、批評的風氣式微了，懷疑、革新的態度受到拒斥；而專橫、獨斷的精神和權威、偶像的陰影，籠罩著校園。
- 四、學術界人士眼看挨整諸人的淒慘下場，深感正義之不彰，職業之毫無保障，不禁觸目驚心、人人自危。從此謹言慎行，明哲保身，不敢招惹是非，因此校園一時風平浪靜，水波不興，青年學子也就益發專心於郊遊、烤肉、舞會、牌局矣！²⁶⁸

2003 年正好台大哲學系事件屆滿 30 週年，台大於 12 月 24 日發表正式書面聲明，且為當年受害者舉行正式平反記者會。調查小組成員柯慶明指出：

從諸多調查資料也可以明確判定，當年被列為證據之一的王曉波論文，

²⁶⁸ 同註 70，頁 115-116。

並沒有通匪的內容，而當時的台大校長閻振興在處理過程中，知道許多人被陷害，但卻為減學運而任由當時代理系主任孫智燊整肅無辜的教師，對大學自主與學術尊嚴也是一大傷害。²⁶⁹

受害人陳鼓應也指出：

經過所有調查證據顯示，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原兇、總策劃人，就是當年的教育部長蔣彥士，他也提及，其實當年的台大校長閻振興也知道，許多被害者都是無辜，但卻未能發揮學者中流砥柱、抱持知識者的良知行事，讓不幸的事情發生。²⁷⁰

其實從《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一書也可清楚看到，在調查小組與閻振興、孫智燊接洽，希望口述訪談藉以還原當年哲學系事件真相，這兩人卻以各種理由藉故推辭，不願配合，真是居心叵測！閻振興當年在卸任台大校長一職之後，國民黨原屬意安排他轉戰中央研究院院長。幸好院長職務非官派，而是由研究員投票產生，也慶幸研究員還有那麼一點「良知」，最後由吳大猷勝出。若是閻不幸當上院長，中研院恐怕不知哪個所又要成為台大哲學系事件第二哩！至於吳二煥事件當中的黃振華，在事件後有學生想要請教他關於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卻從頭到尾只說：「這是學校的事！」而不出第二句話。²⁷¹

A. O. Lovejoy 對「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 下了這麼一個定義：

高等教育學府中的教師或研究者，享有自由來探查並討論他的學科問題，發表他的結論，不管是出版或用來教學生，都能免於政治及宗教單位的干擾，或來自任教學府行政官員的阻礙；除非他的方法被發現不夠格作自己學術上的專業研究，清楚地表現出他能力不足且違反專業倫理。²⁷²

²⁶⁹ 〈30年冤屈平反，台大哲學系事件落幕〉，《自由時報》，2003.12.25，11版。

²⁷⁰ 〈誰該致歉？陳鼓應：應該是教長〉，《自由時報》，2003.12.25，11版。

²⁷¹ 曾心儀，〈這是學校的事！--黃振華對新聞報導「吳二煥事件」的態度〉，收於《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頁149-150。

²⁷² 引自林玉体譯(J. S. Brubacher 著)，《高等教育之哲學》(台北：高等教育，2003)，頁231-232。

A. Gutmann 也這麼說道：

學術自由是大學教育的生命。學術自由的爭取，也是大學師生義無反顧的職責。一方面，大學教授及學生不能一相情願的以為政府當局會尊重學術自由，卻應為學術自由付出無比的代價，更顯出知識份子不可輕侮的風骨。所以大學師生皆應體認學術自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消極的排除任何非學術性的因素侵入校園，積極的創造一種有利於學術研究的環境。²⁷³

當時台大無法免除受到政治的干擾，並沒有保障教師的「學自由」、學生的「學自由」。而且解聘多名教授的理由，均由孫智燊片面認定「學識能力低劣」、「哲學訓練及修養不足」。「台大哲學系事件」根本就是一起「學術迫害」事件！

貳、我的美麗與哀愁

丘為君在《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的序寫到：

由於 1949 年大陸赤化的教訓，使得政府對學生運動有聞之色變的恐懼，因而在教育政策的執行方面，有封閉自由思想與壓抑學生活動的傾向。這種結果是：嚴重的無力感，氾濫在蒼白與失落的青年學生之中。儘管他們用舞會或電影來排遣精神上的苦悶，並且不止一次地撲向存在主義或個人主義，但是這些都不曾減輕他們心底的無根的哀慟。²⁷⁴

從這段文字當中可以很清楚看到，當時大學生對於這種黨化教育所型塑的「硬梆梆的教材、死氣沈沈的校園」，其實是很心不甘、情不願的，多希望

²⁷³ 引自林玉体，〈一隻看得見的手--學術自由與政黨之運作〉，發表於淡江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辦：「廿一世紀我國高等教育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城區部，1989.11.19），頁 2。

²⁷⁴ 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頁 1-2。

窗外有一片藍天可以飛翔。而面對國家的外交處境日益艱難，國內反攻大陸遙遙無望的情形下，以知識份子自居的大學生，多希望有那種機會可以報效國家。但是政治是無情的，尤其是在戒嚴時期，稍一個不小心，輕者吃上牢獄之災，重者可能小命不保、家破人亡，因此只好縱情於聲色犬馬之中。（而名爲救國團，其實許多救國團所辦活動，都是逸樂取向的，如舞會、登山、插花、旅遊等。）

無能力者大學畢業後找個工作餬口，也能安身立命。倒是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樣口號下，當年出國人數不少，而這些人在出國後發現，在台灣所接受到的資訊竟是由統治者所捏造出來的！很多人當時在美國唸書時，接觸到了很多禁書、海外黑名單人物，漸漸地認清蔣介石的「神話政權」，開始有批判質疑的聲音產生；加上 1960-70 年代正是美國校園學運盛行的年代，學生對政府抗議示威，也讓台灣留學生著實驚訝，原來政府的政權、政策也是可以接受挑戰的啊！

後來很多歸國學人將美國的「自由、民主」思想帶回台灣、在台灣的大學任教（成爲自由主義學者），開始挑戰政府的政權合法性，所以嚴格說起來台灣的民主思想有一部份也是從海外發跡的。而保釣運動當時開始走向統一運動時，很多台灣學生也開始認清，因而更多台灣人的組織成立也蓬勃發展，例如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等（這些組織在政治光譜上是偏向台獨的），而多數學生也參與其中。

所以當時台灣或許沒有學生運動，但偶不其然的，在海外的台灣學生運動卻相當熱絡。而這些自由主義的學者在回國後，所引領台灣開始朝向自由民主之路邁進，則是 1980 年之後的事了。

參、1960 年代全球的學潮暴動

國民黨政府在 1949 年宣佈戒嚴之後，唯恐其政權遭受挑戰，另一方面爲維持其政權的合法性，因此長期以來實施黨化教育。長期下來對於大學生所帶來的影響，從 S. Appleton 所作的實證性研究，或許可以看出來：

台灣的大學生一般顯得較順從，較重安全而且保守，對自由民主的價值支持較低，他們對政治或公眾事務缺乏興趣。由於考試制度與教育體系的影響，使得學生不敢公然表示異議。由於恐懼失去地位，以及對未來充滿希望，塑造出了「沈寂的學生」。²⁷⁵

相較於 1950-70 年代台灣大學生的沈寂，1950 年代全球的大學校園騷動早已時有所聞。包括：東歐的布達佩斯（Budapest）、華沙（Warsaw）；南歐的馬德里（Madrid）；西歐的巴黎（Paris）、哥丁根（Göttingen）；南美的布伊諾斯愛麗絲（Buenos Aires）；亞洲的仰光（Rangoon）等，大學校園時常處於不安的狀態，至於美國更是如此。²⁷⁶但大多數只是零星事件而已。

到了 1960 年代，世界各國幾乎都發生了大規模且全面性的學生暴動。林玉体認為主要原因不外三種：

- 一、大學生困惑於拖延時日的越戰所帶來的核武威脅，深恐大規模的毀滅即將發生。大學生個人又有強烈的疏離感及無力感，毫無辦法來扭轉此一世紀大厄運。緊張及焦慮乃自然反應。……此外，又擔心兩大敵對陣營的勢不兩立，水火不容，雙方都擁有致命武器。
- 二、科技進步，導致政府勢力之無限擴增，個人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及力量相形減少與縮小，大眾傳播媒體又操縱群眾觀念。不少人灰心失望，存在主義順勢而生，尤其在德法兩國為然。他們攻擊化學戰爭的研究及製造中心，反對種族歧視，譴責戰爭，攻擊特權，要求校政的參與，學生享有行政、課程、及人事的決策權。
- 三、既存的思想系統不足恃，變成無政府的真空學術狀態；自由的資本社會既不可信賴，社會主義因 1968 年蘇聯入侵捷克而信用破產。人心惶恐，不是逃避，就是暴動，二者皆對社會秩序產生重

²⁷⁵ 施國勳譯（S. Appleton 著），〈沈寂的學生與台灣的前途〉，收錄於丁庭宇、馬康莊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工業的社會》（台北：巨流，1986），頁 193。

²⁷⁶ 林玉体，〈二十世紀教育發展的重大事故〉，收於林玉体主編，《跨世紀的教育演變》（台北：文景，1998），頁 183。

大的殺傷力。加上年輕人叛逆性的自然生長反應，也給教育工作者帶來沈重的負擔。²⁷⁷

整體而言，當時世界各地所爆發的學運包括：

1960年東京大學學生因不滿政府簽約與美國締結聯盟，遂走上街頭抗議美國總統艾森豪訪日，學生不只成功的讓兩國元首之互訪取消，他們還厭惡日本戰後的「經濟發展奇蹟」；美國本身之黑白糾紛，更因隔離教育政策而讓大學生心潮沸騰；歐洲及南美則因美國封鎖古巴，而爆發學潮；巴基斯坦及奈及利亞的學生則是抗議大學環境不佳；德國、南非、及英國師生則是反對種族歧視和核爆試驗。²⁷⁸

1964年許多國家的學運肇因於美國的介入越戰。因此當時美國一些負有歷史使命感的學生，要求更多的參與政治決定權的機會。例如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在1964-1965年之間，學生引用政治人物長期靜坐的方式，向世人宣示他們憤怒於美國捲入越戰，而爭民權及掃除種族不公，也是他們大聲疾呼的口號。²⁷⁹一些狂熱的學生，甚至在1964年秋季發動震驚全球的學生暴亂，指責校長是下流痞子，「是一條雜種狗」(President Kerr is a cur)，教授也支持學生這項說詞。²⁸⁰

1966年法國政府因擬提高學費，造成巴黎大學隱忍已久的火氣；中國則發生紅衛兵式的文化大革命；美國因為越戰僵持不下，學生組成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和FSM(Free Speech Movement)，持續在校園製造暴動；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學生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更發動一週的街頭示威及靜坐。²⁸¹

1968年除了共產國家，以及還在戒嚴時期的台灣之外，各國幾乎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德國大學生因細故強佔報社與印刷廠及運報車；比利時魯

²⁷⁷ 同註 91，頁 186-187。

²⁷⁸ 同註 91，頁 183-184。

²⁷⁹ 同註 91，頁 184。

²⁸⁰ 林玉体，《西洋教育史》(台北：文景，1980)，頁 545。

²⁸¹ 同註 91，頁 184。

汶大學因語言使用問題爆發衝突，導致政府下台；²⁸²法國巴黎大學沙邦校區從五月初到六月中也由學生佔據，天天有打傷事件，學生還與工人聯合侵入許多工業場地，教育部長辭職，政府答應進行大學教育改革；日本大學生因政治原因而強佔各大學；美國大學生則因黑白糾紛及越戰，使大學事件更為頻傳，例如：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因種族問題而佔領校園，整個學期停課，校務癱瘓。²⁸³另一方面，SDS 則是在紐約大學製造大規模暴動（1968-1969），不但縱火且盡情的破壞，甚至還鬧到軍警進入校園而發生學生傷亡慘劇。²⁸⁴直到 1975 年越戰結束，大學校園裡也改革了諸多措施，例如：校園自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全球的大學學潮才告一段落。

綜觀 1960 年代，透過分析台灣的學運與世界各國學運的發展，可以得到幾個結論：

- 一、台灣的學運其實只是一種政府在「動員學生」的形式，學生毫無主體性可言；其他各國的學運則演變成一種「學潮」、「學生暴動」。
- 二、學運的發生其實都是有軌跡可循的，台灣的大學生只要是內政、外交（主要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岌岌可危，引爆一連串外交挫敗）、自身的相關問題；其他各國的學運發生則是蘊含本身內政問題、共同外交問題（美國出兵介入越戰）、以及要求大學校園改革，因而爆發大規模的學潮。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純粹是內部政治鬥爭所引燃的學潮。
- 三、台灣的學運因為全由政府所掌控，加上長期黨化教育培養出「沈寂的學生」，台灣學運的真正主體性意識必須等到保釣事件之後，才開始萌芽；至於其他各國學運的訴求在今日看來極具前瞻性，只是利用接近「革命式」的暴動手段，也造成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然而在越戰後大學校園的改革，卻比台灣早了 20 年。台灣在 1990 年代才開始落實校園自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政策。
- 四、大學校園裡的「學術自由」程度、以及「教授、校長作風」決定校

²⁸² 同註 95，頁 545。

²⁸³ 同註 91，頁 185。

²⁸⁴ 同註 95，頁 545。

風究竟「開放」或是「保守」：台灣在 1950-1970 年代大學校園裡的教授幾乎都是奉命行事的，尤有甚者，還有「御用學者」以黨意為依歸。加上政治因素使然，不但馬克思等學者的社會主義相關書籍，在台灣列為「禁書」，台灣只有一家之言之外，大學校園甚至發生多起學術迫害事件。

其他各國，以美國為例，當時晚年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教授馬庫色（H. Marcuse），就相當支持學生運動。雖然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曾遭受無情的打壓（例如麥卡錫主義席捲全美期間），但是整體而言，美國的學術自由還是相當受到推崇的。例如前哈佛大學羅厄爾（A. L. Lowell）曾言：

不管在平時或戰時，教授都可不必經過核准而發表不利政府的言論，只要教授本著學術良心就學術研究結果提出報告即可，不必有所顧忌。教授應屬先知先覺之輩，他之言論不應受平庸的眾人意見、短視的政客、或好戰的軍人之看法所左右。教授享有絕對自由權，此種權利，不因平時或戰時而有不同。……所有自由及所有特權，都隱含有責任在內。教授對外發表言論，必須嚴肅莊重，不可笑罵由之，或自我標榜，卻應出諸於為學校聲譽及個人職業之尊嚴而為之。²⁸⁵

前哈佛大學柯南（J. B. Conant）也說：

我的教職員工中無人公開支持共產黨，我也不相信有明顯的共產黨徒。不過，即令有，但如組成個調查團來找尋藏匿的共產黨員，這對學術社會所造成的傷害，比任何作為都大。²⁸⁶

因此總結而言，自由派的教授以及開明作風的校長，是推動大學學術自由風氣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而學生運動從良善的角度觀之，乃是促使學校、社會更為進步的動力。

²⁸⁵ 引自林玉体，同註 95，頁 541。

²⁸⁶ 引自林玉体，《西洋教育史》（台北：師大書苑，1999），頁 613。

第五章 我們來創造歷史²⁸⁷--

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

※不要小看你一個人的力量，一千個你，就是一千人，一萬個你就是一萬人。不要在這創造歷史的時刻中，你缺席了！同學們，一人拉十人，攜帶學生證到中正紀念堂靜坐！

----野百合學運傳宣

本章所要探討的是關於 1980-90 年代的學運。首先，經歷過 1950-70 年代國民黨政府的「黨化教育」、「動員學生」之後，1980 年代學生如何在校方的高壓下，從事校園抗爭，以爭取自身權益，並開始關心社會議題。再者，論述 1990 年代，學生走出校園，針砭時事，進而引爆出「野百合學運」，以及後續所產生的餘波盪漾。最後，筆者釐清 1980 年代以來學運的幾個本質問題：一、學生運動？還是「台大」學生運動；二、學運和反對團體間的關係；三、學運中學生的主體性問題。

第一節 1980 年代的校園抗爭運動

²⁸⁷ 文章中所使用「我們來創造歷史」一詞，構想來自於戴寶村 2003.9.26 在國史館主辦：「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動員學生與學生運動--一九五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學生運動〉一文，談及野百合學運時，他正在台科大任教的往事。當時學生問他是否可以馬上去參加靜坐，戴寶村回答：「看你們是要閱讀歷史，還是要創造歷史。」筆者有感而發，於是使用「我們來創造歷史」一詞來當作本章的主標題。

鄧丕雲在《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²⁸⁸一書中，對於1980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以敘述性的手法，對於當時幾起的重大學運事件作了交代；至於范雲所編《新生代--自我追尋》²⁸⁹一書，則是輔助鄧的著作，收錄當時的文宣、演講稿。筆者先行分析1980年代以後的整個校園狀況、以及社會背景，再以此二書為架構，佐以其他史料鋪陳，以期能更加深入探討1980年代的學生校園抗爭。

壹、1980年代的社會背景

1980年代國民黨政府面臨了整個社會局勢的內外挑戰，如圖5-1所示。當時中國國民黨所實施的戒嚴體制，外在受到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大陸的亞洲戰略轉變所挑戰，內部則是官僚系統不再能夠嚴密控制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等各層面，最令執政當局不安的應是中產階級的興起、市民社會的雛形誕生，人民自主意識也跟著高漲。隨著一連串的社會問題所引發的「社會運動」（當然也包括學生運動），直接挑戰了國民黨的權力。「1987.7.15 政府宣布解嚴」、「1987.9.28 民進黨成立」、「1988.1.13 蔣經國去世」等諸多大事，無疑對當時的社會投下許多未知數。

1980年代的校園場景不出1950-70年代，包括學校風氣保守；主政者官僚式的作風；教授的教學僵化；教材死守中國化；黨化教育實施；國民黨、救國團、軍訓人員、特務、和職業學生盤據校園等。而學生的社團活動仍舊被嚴格限制，出版刊物仍舊必須經訓導處同意才准予出刊。孫震接掌台大時（任期1984.8-1993.2），對於校園運動則是採取高壓手段。²⁹⁰若以林玉体所區分學運的三個層次來看，1980年代的校園運動應屬第二層次，也就是對校園行政人員的不滿，而提出抗爭批判。至於學生開始走出校園（第三層次），從事社會議題方面的調查，則是始於1988年。

²⁸⁸ 鄧丕雲，《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1993）【以下簡稱「鄧著」】。

²⁸⁹ 范雲編，《新生代--自我追尋》（台北：前衛，1993）【以下簡稱「范編」】。

²⁹⁰ 同註2，頁33。

圖 5-1 1980 年代國民黨政府的內外挑戰

資料來源：楊渡，《強控制解體》（台北：遠流，1988），頁 11。

即便如此，1980 年代學運史，卻仍無法擺脫 1950-70 年代那種「絕大多數學生對於社會議題的冷淡」情況，直到 1990 年 3 月學運仍是如此。李永熾認為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

一方面乃源於資本主義管理機制尚未普遍化，所以學生並沒有切身感受到資本主義深層的管理機制，只發現表層的經濟與社會失序。另一方面則源於四十年來政治體制的不合理，這種現象也明顯地表現在學校的威權管理上。²⁹¹

另一方面，蕭新煌對於 1980 年代所興起的社會運動，首度提出「社會力」一詞來解釋。²⁹²所謂「社會力」具體而言，就是民間力量集體的伸張，與「政治力」、「經濟力」是不斷在相互激盪的。蕭認為 1980 年代可說是「社會力展現」的時代，文章中並提出 16 種已儼然成形的社會運動。其中大多數的社會運動是以「弱勢團體」為核心成員所組成，當中包含學生運動（1986-），²⁹³但為何是以 1986 年作開頭呢？蕭並未作說明，然鄧丕雲這段話或許可以解答：

學生運動無疑是一股民間崛起的力量，它是民間力量與國民黨控制體系互動過程的一部份，而不是結果。1986-1987 年台灣學運的興起，是學生對國民黨校園控制的自發性反抗，所形成的結果是校園控制的鬆動，或者說是校園的自由化。²⁹⁴

所以再回到蕭的論點，學生長期在校園遭受到不合理的管教以及思想、言論的打壓，因此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嘗試突破校方的桎梏與掌控，進而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想法，爭取在校園中學生的權力。但此處有三點必須說明的是關於學運與校園自由化、社會開放、政治自由化三者間的關連：

一、國民黨從 1986 年開始的政治自由化政策並無及於校園，校園當時還在特別權力關係的規範下，並沒有做出相同開放。校園自由化的制度是 1988 年才開始，這是學運興起以後的事。所以校園自由化是學運興起的結果，不是它的原因。但校園自由化卻是學運能夠持續和茁壯的不可缺少因素之一。

二、1986-1987 年間台灣學運的興起是校園自發性行動，而不是社會的開放吸引學生走出校園。當時的情景是：社會正日趨開放，而

²⁹¹ 李永熾，〈我看學運〉，《中國論壇》30 卷第 2 期（1990.4.25），頁 2。

²⁹² 蕭新煌，《社會力--台灣向前看》（台北：自立晚報，1989）。

²⁹³ 同註 6，頁 137。

²⁹⁴ 同註 2，頁 59。

校園卻益見保守，因此社會的開放與學運的興起並沒有直接從屬關係。1986-1987 年間學運的興起是以校園運動型態呈現，1988 年開始校園外的行動才變成學運一部份。然而，社會的開放提供學運校園外行動參與的空間，對學運是有幫助的。

三、政治自由化雖不直接影響學運的興起，但至少提供一個掩護作用。由於外在環境的變化，白色恐怖的消退，使得學生反抗行動的危險性大為降低，這可以說明為什麼那時學運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而不是單一的孤立現象。²⁹⁵

需知校園在國民黨掌控之下，一夕之間要追求完全「學自由」與「教自由」實屬不易。再者，學運是否插手校園以外的問題，以避免成為政黨或其他社會團體所利用的工具，變成像戒嚴時期那樣在「動員學生」。所以當時韋政通對於台灣學運的發展，就這麼認為：

今後學運的主要目標，仍應放在校園的民主化上，其重點在民主文化的培養，和民主性格的養成，這樣才能使民主在我們的社會紮根。兩千多年的專制文化，四十年的反民主教育，校園民主化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我們的反對黨和各種社會運動團體，已無餘力關心這根本問題，卻正是學運可以直接用得上力的地方。²⁹⁶

而在更早之前，林玉体也提出學運應該以校園事務為優先的看法：

目前國內教育問題仍然存在很多缺失，學生運動在此情形下應該單純化，以校園內的問題為運動核心，譬如師資教材的檢討、學生刊物的審理、考試制度，乃治校方行政當局的心態與制度都應該列入檢討對象，這些改革如果不由學生來發動，其他角色恐怕未必更合適，校園事務可以說是學生運動的首要。

當然，學生參與社會事務毋寧也是正常的，……今後台灣的學生運動除了以校園內改革為優先外，對校園外社會參與多多關心，也是值得

²⁹⁵ 同註 2，頁 59-60。

²⁹⁶ 韋政通，〈三月學運的檢討和期待〉，《中國論壇》30 卷第 1 期（1990.4.10），頁 3。

鼓勵的。²⁹⁷

這些話或許說明了學運發展的侷促性，但另一方面卻也看得出校園民主化是一條艱辛且漫長的道路。底下接著將探討 1980 年代到野百合學運之前的校園民主抗爭行動。

貳、1982-1988----台大代聯會主席普選風波

1981 年台大王增齊、李文忠、劉一德、楊金嚴、賴勁麟，五位學生秘密合組「五人小組」，運用校內社團--大論社名義，嘗試喚醒冷漠的校園群眾，來關心政治與社會問題。後來一些失敗的經驗告訴他們，唯有透過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才能讓全校學生開始關心公共議題。

當時代聯會主席是由各班班代表所投票選出，而且往往都是國民黨先行指派好的，選舉只是一種形式。普選是在每年秋季開學之後，因此 1982.9，大論社、大新社、法言社、醫訊社利用新生訓練，宣傳代聯會主席普選，結果事後這些社團負責人都遭到校方「修理」，包括停社和記過。這些學生爲了拉高層級，「學生自治和大學自治」的訴求，曾在 1983.2.28 當天，到彭孟緝家噴漆抗議，以表示對「當年彭孟緝出兵進行血腥鎮壓，造成二二八事件」的不滿。²⁹⁸

由於事情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校內學生也開始注意到這件事，1983 年校方甚至將普選日期從 10 月提前到 5 月。這些改革派學生見民氣可用，推派吳叡人出來競選，吳不負眾望，打倒國民黨的御用候選人，成爲台大第一位改革派的代聯會主席。

吳接掌代聯會後，卻也發現，雖然進入體制內但依舊無法改變現狀，於是在 1984.4.28 發表〈主席辭職聲明〉。從內容中可看出吳的諸多無奈：

……在現行體制下，和校方的單方定義之下，學生最高自治團體--學

²⁹⁷ 〈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座談會〉，《中國論壇》，24 卷 3 期（1987.5.10），頁 17。

²⁹⁸ 同註 2，頁 24。

生代聯會，只是一個無主權的遊戲團體，他們召開學生大會的決議，對校方毫無拘束力可言，即使是絲毫不涉及意識型態的瑣碎問題亦復如是。……我回頭檢視幾次大會決議的結局，我才深深地瞭解，一年來的努力與辛酸，得到的只是校方「好官我自為之」的反應而已。……教育當局不斷地將三四十年前在大陸上經濟、政治、社會秩序解體的背景下產生的學潮陰影，投射在三四十年之後，在一個現代化、多元化，高度教育普及的富裕社會中的現代學生身上。

……安全單位介入校園，約談學生，使學生對公共事務，對國家前途，噤若寒蟬。請再讓我們回到民國 73 年，今天的台大，看看今天的訓導法規，是進步還是開倒車？請問我親愛的師長，請問教育行政主管，到底台大出了什麼問題？……傅校長，您一手創立的自由學風到哪去了？²⁹⁹

1985.4 學代大會通過普選的臨時提案，卻遭到主席以及校方否決，改革派學生深怕校方反對普選，且聽聞國民黨台大黨部將在 5 月 11 日學代大會作積極動員。於是學生先發制人，在當天中午數十名穿著噴有紅漆普選字樣衣服的學生從台大校門口遊行到傅鐘，再回到校門口，沿途並高喊「普選」、「我愛台大」等口號，雖然校方曾派人勸阻，但學生還是堅持此一行動，是為「普選遊行」。這是八 0 年代學運史上第一次的校園遊行，也是「五一一台大學生日」抗爭傳統的起源。³⁰⁰

雖然普選遊行並沒有立即被廣為宣傳，但是當天下午的學代大會，還是以 94：0 的懸殊票數通過普選案，³⁰¹組成了「代聯會主席直接選舉設計推動委員會」，也正式宣告台大學生直選代聯會主席的時代正式來臨。意義則是除了代聯會主席法統更佳穩固之外，學生參與校務、爭取學生權益也有了正當性。校方在驚訝與不滿之餘，於是對 5 月 11 日當天遊行的學生開始展開報復。

²⁹⁹ 吳叡人，〈主席辭職聲明〉，收於范編，頁 23-28。

³⁰⁰ 同註 2，頁 34-35。

³⁰¹ 意即全校 94 位學代會代表，全數支持代聯會主席普選產生。令人好奇的是，這 94 位當中，也有國民黨的御用學生，竟然也支持這項提案。究竟是形勢比人強，不得不如此，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恐怕就不得而知了。

參、1985----李文忠絕食事件

雖然 1985.5.11 學代會通過主席由學生直選產生，但 1986.4 普選結果卻遭到當時的校長孫震否決。1986.2 被校方列為特別觀察的學生李文忠，因大二英文三修不過而遭退學，由於電腦選課記錄有誤，李於是與教務處交涉，2 個多月都無結果，甚至過程中有校方人士要求李答應「不再鬧事」作為交換條件。

李自認遭到政治迫害，於是 5 月 5 日在其他人陪伴下在台大校園靜坐、遊行、請願，要求復學、校方認錯，5 月 7 日則到教育部請願。但這 2 次都沒有回應。5 月 10 日李收到兵單，將在 5 月 16 日必須入伍。

5 月 11 日星期天，正逢母親節，是台大傳統的園遊會節慶日。李和其他學生由校門口遊行到傅鐘，在傅鐘下抗議台大政治迫害學生，李文忠並開始「絕食抗議政治迫害」。5 月 12 日校方在強大壓力下，與學生達成協議，由學校 9 位教授組成委員會處理。

5 月 15 日學校竟推翻委員會有條件復學的決議，堅持將李文忠退學。此舉引起學生不滿，於是向校方抗議。過程當中校方怕事情一發不可收拾，竟動用校警和便衣人員毆打學生，現場有數百名學生均撞見這一幕。於是學生再次群聚傅鐘之下，發表抗議演說。5 月 16 日中午學生為李舉辦惜別會，護送他當兵。這件事過後，很多學生遭到校方留校察看，李文忠更是被開除學籍。

此時，改革派的學生認為更應該競選上代聯會主席，以增加與校方談判的籌碼，然當年選舉卻不幸敗北。另一方面，9 位教授所組成的調查會作成的結論直接遭到校方否決，令教授相當不滿，於是開啓學生與教授間的合作，一起向校方抗爭。

此事件的當事人李文忠在 16 年後接受何榮幸訪問，談及絕食當天是否有如外界所傳言偷吃便當時，鄭重澄清：「我才絕食 24 小時，怎麼可能偷吃便

當？」一語回答了外界長期的疑慮。但是一位參與那場絕食活動的學運份子，卻 e-mail 給何一封信，道盡他的感受：

那天夜裡我去找李文忠，告訴他學校開除他的立場站不住，我們一定會勝。他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他的目的不是要留在台大，他反而希望學校開除他，他只是要一個受政治迫害的形象而已。

整個事件當中，就如我們社會一般，多數人都是蠢蛋……。算來我只看到一個聰明人。至於他是否在晚上偷吃便當，似乎就無關宏旨了。³⁰²

但事後何榮幸卻有另一番解讀：

或許，李文忠只是比較坦率、誠實而已，他當年所謂「希望學校開除」云云，用意也可能只是希望「把事情鬧大讓外界重視」而已。身處 2001 年的當下，作者並不認為細究昔日學運過程還有多大意義，更不認為誰有資格在「真空標準」下檢驗別人的是非與道德。³⁰³

從這件事其實可以看出，當時校園仍處於政治氛圍之下，社會媒體、輿論依舊掌控在政府手上，往往大學生站出來挑戰的不只是學校而已，背後更是一個龐大的黨國機器，這是需要何等的勇氣才有辦法做到。因此如今去細究這些陳年往事，甚至是從目的論來臆測當事人種種行為、言語的背後動機，或許並無此必要。

肆、1986----鹿港反杜邦事件

鹿港反杜邦運動則是 1980 年代學生走出校園，開始關心社會、批判社會的第一步，從林玉体對學運的三個層次分析，這個事件實屬於第三層次。但是這個行動從學生眼中和鹿港人當地的眼中來看，是有些差別的。學生還沒到鹿港之前，當地人早已發起反杜邦運動卻是不爭的事實。

³⁰² 何榮幸，《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2001），頁 27。

³⁰³ 同註 16，頁 28。文章中的「是非」，指的是當年李文忠有無偷吃便當，以及這件事所要表達的意涵。「道德」則是指 2001 年李文忠爆發的緋聞一事。

1985.3 反杜邦運動早就已經開始，當地人最初反對的理由只是來自於「模糊的恐懼」，對於杜邦以及其生產的化學品完全都不懂。因此當時東海大學環工系學生施威全（鹿港人，後來搬到彰化市）除製作問卷調查，也花相當長時間研究「二氧化鈦」。除此之外，兩位老師也投入到了反杜邦運動的行列：盧思岳（精誠中學）、范國鎮（台中某高職）。還有爲了報導反杜邦運動，最後竟也親自參與的鐘喬（記者）、楊渡（作家）。上述這些人事實上才是反杜邦運動的最大功臣。

楊渡對於反杜邦運動，有非常深的感受：

對於局外人而言，這些參與的知識份子並不代表什麼，他們既無名也無利（甚至是自掏腰包前往，沒有拿過一分錢）。但是他們都獲得最多，因為他們在參與的過程中，服務、學習並了解到什麼叫做「人民」，什麼叫做「生活」。那是花再多的代價也買不到的。……

由於大學生活的「象牙塔隔離」，同土地與人民的關係幾已斷絕了，卻在這次運動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新生」。³⁰⁴

盧思岳也說道：

料不到在文學中、在詩歌中一直苦苦尋覓的老百姓的聲音，竟在運動中聽見了。³⁰⁵

有人說，這是無力感作祟；也有人說，是因為長期的恐懼。可是我深深覺得，如果無力感與恐懼還延續到我們這一代知識青年身上的話，那毋寧是一種深沈的悲哀與慚愧，尤其當那些飽受驚嚇、風燭殘年的老人走上街頭的時候。³⁰⁶

其實，我知道，此時此地正有許多知識青年三五成群的聚在咖啡室裡，大聲或小聲地批評這個時代與社會。這是一種時尚，也是一種流行病，

³⁰⁴ 楊渡，《強控制解體》（台北：遠流，1988），頁 92。

³⁰⁵ 同註 18，頁 89。

³⁰⁶ 盧思岳，〈走出書房，進入民間〉，收於楊渡，同註 18，頁 97。

我曾深深地罹患。可是，如果我們一直躲在安全、穩固的「自利」城堡裡頭，發揮著並非「無知」的冷漠；那麼，我實在不知道，我們將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未來？如果，這一代的青年始終延續著這種有些不滿、企盼改革的思頭，卻又戀眷著已經分配較多或將來可能分配較多的社會利益，而一再吝於參與或不敢參與社會改革運動，那麼，我們將成為「取得最多，付出最少」的歷史罪人，將成為「創造不公平社會」的最大共犯。³⁰⁷

范國鎮則有很深的感觸：

當我們在鹿港市街雜亂的記錄著當地居民對公害污染的恐懼，以及他們因陳情請願也無效而湧生的怨怒、控訴、無奈時……我第一次那麼強烈的感覺到，這些樸質、寬厚的父老鄉親，與我是如何貼近的在同一塊土地上生息。

是的，當我在福崙宮的廣場前聆聽著好幾位老阿婆憤怒的說：「如果政府不顧我們的死活，一定要讓杜邦來設廠，我們這些老人，就跳海死給他們看。」以及當一位八十幾歲的老阿伯向我說：「少年仔，你們讀書拿筆的，比較會理論，一定要替我們這些庄腳人，還有我們的後世代的子孫，爭幾分活命的土地。」我內心夾雜著羞愧而翻騰的波濤……³⁰⁸

1986.7.1-7.18，台大、輔大、東海的學生約 30 餘位，來到鹿港訪問、調查、散發傳單與街頭演講。回到台北，7 月 30 日消基會主辦關於杜邦設廠的座談會，發表問卷調查結果，並再自行舉辦座談會。9 月份集結成書，即《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

但楊渡對於學生的這次行動評價並不高，認為台大學生的貢獻僅止於問卷調查發表所引發的震撼而已：

他們一秉青年人的熱情直接投入運動裡，以為這兒是一塊熱烘烘的土

³⁰⁷ 同註 20，頁 98。

³⁰⁸ 范國鎮，〈覺醒的心路歷程〉，收於楊渡，同註 18，頁 100。

地，可以直接運動起來，一開始就發起傳單來。然而，這時的運動已有了自身的步調與韻律，未摸熟這「韻律」之前，是無法在同一基礎上「共振」的，因而台大學生的動員並沒有成功，反而是鹿港的人們予以他們的協助更多。這大約是大學生無法預料的事。

然而這也並非是怪事。事實上台灣的大學生在塑造過程中乃是呈金字塔結構的一階階往上走，愈往上愈與土地遠離。其結果即是知識份子與土地人民的距離愈來愈遠。因而試圖在民間參與的知識份子必得要有一番學習、掙扎的過程。透過服務去了解，從了解中去思考反省自身、以及時代的諸種政治經濟問題。然而台大學生的最大幻想即是想在一進入即能「動員」起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³⁰⁹

然而事實上也是如此，畢竟當時台大學生在校園抗爭運動上的一連串挫敗，使得這些標榜改革派的社團與學生，必須另起爐灶，於是才有這件台大學生「介入」反杜邦運動。所以嚴格說來，反杜邦運動與其歸類為學生運動，不如說是一場道道地地的社會運動。

伍、1986.9-1987.6----台大的「自由之愛」

1986.9 開學，台大校方認定大新社在 5、6 月所出刊的《大學新聞》報導太多關於李文忠事件以及黨團介入校園選舉，於是準備懲戒社長和編輯 3 人。9 月 30 日抗爭行動則從向校長孫震請願開始，當時甚至在校園販售大新社所集結出版關於反杜邦的報告書，均遭到校方阻撓。最後 3 人仍被記過，大新社勒令停社 1 年，當時校內有發行刊物的 12 個社團一同發表〈台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顯見言論自由已成爲全校關注的事，不再是單一事件。³¹⁰

10 月 24 日大新社在校園舉辦了一場名爲「自由之愛演講會--我們要一個言論自由的校園」的告別群眾大會。雖然國民黨在事前透過各種管道傳達了

³⁰⁹ 同註 18，頁 92-93。

³¹⁰ 同註 2，頁 79-80。

恐嚇的聲音，教育部長李煥並公開表示惜別會是由「黨外分子」在幕後操縱，但是這場惜別會也同時宣告了自由之愛的誕生，在學運史上是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是校園、學術邁向自由化的第一步。學生並將台大大門口變成學運群眾大會的重要據點，自此後，控訴的布條、麥克風的演講與群眾的聚集成為台大大門口常見的景觀。³¹¹

11月初校方舉辦「大新社懲戒事件說明會」，但徒具形式，無法給學生滿意答案。抗爭力量由於不斷擴大，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學生出版了《自由之愛》第1期，同時舉辦第一場演講，校方想以垃圾車進佔場地阻止學生行動，但現場有將近800名學生參與，聲勢浩大。³¹²

隨後學生的抗議層次升高，12月22日出刊的《自由之愛》第2期，發表了〈大學改革宣言〉、〈大學改革芻議〉兩篇文章，分別要求學術自由的保障、大學校園的自主。其中〈大學改革宣言〉在今天看來，有其跨時代的重要意義，對現今大學的改造，仍具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做為真理的追求者，我們堅決主張，一切不合理的，都要毫不戀棧地加以揚棄。

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一個社會也永不該只存在著一成不變的教條。就是因為信仰不同，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使真理愈辯愈明的空間——大學。

就是因為社會的生機在於變革，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獨立於既存利益的乾淨地——大學。

但是，我們認為現存的大學體制將使最基本的言論思想自由被扭曲，使學術成為政治的附庸，使研究者反而被拋逐在社會變動的最末端，除非能夠徹底地全盤革新現有制度。因為：

第一：……言論自由不容許被無理地打上任何折扣，因此我們要提出

³¹¹ 同註2，頁80-81。

³¹² 同註2，頁82-83。

對於「自由應以法治為前提」的正確定義……

第二：大學的自主性在教育行政的不當行使下，已經完全喪失……

第三：因為制度上的不良，使得我們的大學淪為販賣技術之事的商場……

因此，我們堅決要求：

一、將大學生等同於一般公民，不得剝奪大學生任何屬於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講學自由、集會結社自由。

二、將屬於知識的還給知識，行政力量退出一切逾越其權限的事務，校園事務、教育事業的決策權和意思形成，應該交由教授學生組成的團體來行使。

刻意的掩飾缺失和批評，造成的結果不是安定，而是僵化和虛偽。將學術交給官僚，造成的不是效率、理性，而是教條主義。身為真理的追求者，我們不願鄉愿主義發生在校園——一個最需要誠實的地方。所以：請立刻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³¹³

同時在 12 月下旬，連續在 10 天內辦了 7 場街頭演講，除徵求義工、募款之外，也辦起〈大學改革芻議〉連署簽名，結果共獲 1865 名學生簽名支持。1987.1.8 連署名單送到校長孫震面前，校長卻開始顧左右而言他。1 月中旬蔣經國發表談話，認為校園應該維持中立。但到了 3 月初，教育部長李煥卻說沒有校園黨部問題存在。3 月 24 日學生轉往立法院為大學法請願，但是當天下午李煥接受黃煌雄立委質詢時表示：「對請願行動很難過，希望台大跟各大學要檢討。」³¹⁴

然而台大學生跨出這一步是很艱辛的，畢竟當時以一校之姿，想要推動全國性的〈大學法〉談何容易。當時學生也想走出校園，關心社會議題，進

³¹³ 〈大學改革宣言〉，《自由之愛》第 2 期，1986.12.22。收於林玉体編，《師生之吼：1987 台灣教育批判》（高雄：敦理，1988），頁 107-109。

³¹⁴ 同註 2，頁 86-87。

入民間場域去實踐，例如 1987.3.21 郭正亮在《自由之愛》第 3 期發表〈新社會宣言〉，³¹⁵文中提到應揚棄統獨、左右這些問題，竟遭到各方圍剿。³¹⁶

1987 春季台大終於有了些改變，包括校園黨部遷出校園；最有勢力的御用社團「覺民學會」，因為路線之爭，當年決定不參選代聯會主席，霸佔了 10 年終於宣告結束；地下團體與地下刊物的出現；校方成立「台大論壇」露天演講場等；同年 5 月 11 日為紀念台大學生日，約有 60 名學生在校內遊行。然而表面上校方即使開始採取開放政策，但這也僅只是點到為止罷了。

同年改革派學生再接再厲拿下代聯會主席，然也因反對聲音、權力的擴大，內部也出現路線之爭，1987.6 自由之愛在未經決議之下自動解散。³¹⁷這在往後學運的發展中，因為內部不同的聲音、歧見，進而導致運作受阻或力量分散的情形，屢屢可見。在民主多元的社會當中，不同的聲音出現是很正常的現象，但如何找到最大的共識，卻是學運發展上不可忽視的重大課題。

陸、1986 以後----眾聲喧嘩的校園運動

由於台大學生的帶頭往前衝，使得 1986-1987 全國性的校園運動風潮，從南到北的各大學出現學生行動團體（如表 5-1 所示），這是學運的突破期，也是學運團體的萌芽時代。當時靠著這些地下社團、刊物，同時將言論自由、民主也帶進校園。

表 5-1 1986 年後學運萌芽的社團

性質		代表社團
社團體質 的轉變	完全	台大大陸社、中興法商青年社、成大西格瑪社
	不完全	政大國思社、東海東風社、台大三研社

³¹⁵ 該篇文章收錄於范編，同註 3，頁 114-118。

³¹⁶ 郭正亮在這篇文章中的主旨乃是寄望學生能深入民間，參與社會改造，進而匯聚成一股型塑民間社會的強大力量，與國家霸權相互對抗，而這必須跳脫統獨、左右、政黨、階級、省籍迷思的。

³¹⁷ 同註 2，頁 96-99。

社團的 地下化	停社	政大青年→野火、台大大新→自由之愛
	並存	溝通破裂：中興法商春雷、淡江南淡水、高醫望春風 直接地下化：成大西格瑪、經緯，東海東海新聞
自發性 新團體	合法社團	成大經緯、中原少年中國
	地下團體	北醫抗體、輔大創造社、文化 260、中央怒濤、高醫 人文社會研習社、台大濁水溪
聯盟	成員聯盟	東海東潮、高醫望春風、輔大創造、台大自由之愛
	團體聯盟	成大平等域
	特殊型：學校	持續：台大代聯會
	代表組織	不持續：北醫、東海學生活動中心

資料來源：鄧丕雲，《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頁 104。

相對於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的誕生，伴隨而來的地下刊物更是多得數不清。各校之間除了舉辦座談會之外，1987.7.16 第一個全國性學運串連組織正式出現：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簡稱大革會），由輔大等 11 個學校的 12 個社團所組成，目的為推動大學法修正。由於學生必須南北奔波不易，於是 1988. 2. 28 大革會改組為民主學生聯盟（簡稱民學聯），成為區域制組織。

1988-1990 野百合學運之前，台灣各大學的社團蓬勃發展，學運除了一方面持續關注校園的改革、大學法的推動；另一方面對於社運的參與、政治抗爭，皆有學生的影子出現。但是並非每所學校都有如此開明的校風，一些作為保守的學校，對於參與活動的學生，仍動輒威脅以記過、退學處分呢！

第二節 「憤怒之愛」--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3 月 16 日至 22 日）

1980 年代的學運發展，直到 1990 年學生自主性地走出校園外，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引發的野百合學運達到高潮。關於野百合學運的紀錄，除了在第一節所提到：鄧丕雲《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以及范雲《新生代--自我追尋》這兩本書之外，還包含何金山等人所合著《台北學運：1990.3.16--3.22》³¹⁸、林美挪所編《憤怒的野百合》³¹⁹、台大自由之愛編輯群所編的《自由之愛--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³²⁰等書。而《中國論壇》等期刊，也都有專題報導，顯見這場以學生為主體的抗爭運動，不啻是 1990 年代以來最大

規模的學生運動！

壹、序曲：野百合學運的引爆點

學生所引發的這項舉動，其實正是反映了當時全國老百姓不滿國民黨的內部政治鬥爭，以及長期以來政治陳腐的反射動作罷了。1990.3 月初，李登輝、李元簇與林洋港、蔣緯國兩組人馬爲了競選總統而掀起的一連串政治鬥爭，以及爲了討好那 700 位萬年老國代的種種表現，的確讓全國人民都相當不滿。

3 月 8 日台大學生會曾邀集社運團體、教授協商，達成幾點共識，將行動定名爲「還政於民，重建憲政」，包括：3 月 18 日在中正紀念堂舉辦全民主大會、100 位教授連署刊登廣告抗議這種不民主現象、張忠棟等教授更準備在 3 月 10 日台大校務會議提出罷課案。台大學生會內部也曾提議 3 月 14 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3 月 21 日總統選舉日到仰德大道圍堵老國代，但是另外一個學生組織「民學聯」，卻認爲：「總統選舉這種泛政治化的議題，搞一次行動就收場，並不具有學運的根本意義。」³²¹

³¹⁸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啓，《台北學運：1990.3.16-3.22》（台北：時報，1990）。

³¹⁹ 林美挪編，《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抗議記實》（台北：前衛，1990）。

³²⁰ 台大自由之愛編輯群編，《自由之愛--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台北：南方，1987）。

³²¹ 同註 32，頁 32。

3月9日下午林洋港宣布正式退出總統選舉，使得國民黨「茶壺裡的風暴」暫時緩和下來，因此張忠棟曾電告學生會：「林洋港退選，政治危機已經解除，因此取消3月18日的群眾大會。」而原本3月10日張忠棟等教授要在台大校務會議提出罷課案，也因此沒有執行。但是學生會副會長鄭文燦卻表示：「（這通電話）引起學生會的憤怒，學生認為教授們的心中，有一個李登輝情節。」³²²3月11日學生與社運團體在立法會開記者會，發表「還政於民，重建憲政」聲明，要求李登輝立即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解散國民大會、召開國民大會。3月13日，4位台大學生在校門口燒掉國民黨黨證；3月14日「台大學生民主行動聯盟」前往國民黨抗議，要求制憲；此外當天中原大學一場座談會上，「解散國民大會」成為全場討論焦點。

由於國民黨一直不願回應學生訴求，台大學運社團與其他社運團體也遲遲沒有下一步。因此在3月16日傍晚台大學生楊弘任、周克任、何宗憲三人，與工技學院學生，總共不到10人，自發性地來到中正紀念堂靜坐，並發放〈起來，福爾摩莎的主人！〉的傳單：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我們是該仔細想想了。二次大戰結束後，德國新生代質疑他們的祖先，唾棄他們縱容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90年代的我們呢？如果不把心中的不滿集結為具體力量，為民主改革注入動力的話，恐怕也將成為歷史的罪人了！……

美麗島的上空，祖先的英靈正在期盼著：

他們一再重覆的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的叮嚀，筆路藍縷以啟山林
站出來吧，身為主人的我們！如果您是學生，請您秉著讀書人的良知

³²² 同註 32，頁 34。所謂「李登輝情結」，指的是一種在國民黨政體轉型時，對本土化與民主化之間的差異糾葛不清，而全部投射到期待李登輝個人的心理現象。參見鄧丕雲，同註 2，頁 305。

來吧；……³²³

於是，這場「插槍走火」的學生靜坐揭開了野百合學運的序曲。

貳、吹起號角：我們來創造歷史

3月16日傍晚有學生靜坐一事，陸續被傳開以後，3月17日全國各地幾乎都傳出要求老國大下台的聲浪。幾所大學的學生都開始有了自發性的抗議行爲，例如：文化大學學生組成民主聯盟，3月15日前往中山樓抗議，發生群眾圍毆尾隨教官的事件，3月17日法律系學生「送鐘」給國民大會；政大學生爲主組成的「全民逼退老賊運動總部」在3月17日召開記者會，發起全民簽名逼退老賊的活動。³²⁴

在學運蓄勢待發時，教授的態度是一個關鍵。3月17日台大自由派教授決定發起「柔性罷課」，將3月19日至25日定名爲「民主教育週」，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10位教授連署發表公開信給校長孫震，卻遭到孫震的拒絕。這項消息立刻傳達到廣場並正式宣佈，結果得到清大、成大教授的支持，願意與台大教授同步行動。教授的決定給予學生精神上極大的鼓舞，「民主教育週」等於在幫學運團體擴大動員的規模。³²⁵

另一方面孫震雖然拒絕教授們的要求，卻也在當天下午到中正紀念堂探望學生，表示學生靜坐是正當行爲，學校事後不會加以處分。中正紀念堂廣場附近的靜坐人數也開始增加，但是直至中午爲止，電視新聞均未對學生的行動作任何報導；教育部也緊急發函，要求全國各地的大學訓導處阻止學生參與靜坐，但校方多表示無法禁止，有些教授還向媒體坦承：「連我自己都想去！」³²⁶

傍晚時分，李登輝曾透過電視發表公開談話，但不被學生接受。到了晚

³²³ 〈起來，福爾摩莎的主人！〉，1990.3.16，收於林美娜編，同註33，頁72-77。

³²⁴ 同註2，頁310。

³²⁵ 同註2，頁310。

³²⁶ 同註32，頁43。

上聚集的人越來越多，社運人士、民進黨人士、大學教授紛紛來到現場為學生加油打氣。台大教授張國龍感慨地表示：

台灣今天政治如此紛亂，知識份子要負重大責任。過去，知識份子甘心作政權打手、御用學者，透過課堂、媒體、演講，對現任政權極盡擁護姿態。如今，這些人不敢再欺人耳目，學生更挺身而出，領導全民出來抗暴。……³²⁷

台灣人權促進會陳菊也指出：

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台灣的學運發展一直很慢。這次自發性的運動，雖然組織工作並不健全，但他們第一次站出來對人民和自己的知識良知負責，為這塊土地對抗不義，終於走出爭取人權的第一步。³²⁸

3月17日深夜學生召開校際會議，由於四面八方湧來聲援的學生越來越多，使得領導權的分配這個問題也正式浮上台面。加上一些學運組織（如台大學生會、民學聯、新青年等）也想瓜分領導權，於是會議成為各方的角力戰，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最後僅得到一些共識，如靜坐的訴求改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民國是會議、擬定政經改革時間表」等。

3月18日全國越來越多學生來到中正紀念堂加入靜坐，並發動罷課，使得教育部長毛高文只好出面喊話，希望同學在表達意見時，原則上應在校園中進行，同時訴求方式應顧慮安全、以理性方式表達。毛並針對學生展開罷課或靜坐抗議國民大會一事，表示「嚴重的關切」，但卻又強調教育部不會加以干涉。

下午2點，民進黨也在中正紀念堂舉辦聲討老國代大會活動，由於參加人數有2、3萬之譜，跟靜坐學生700人比例懸殊過大，但群眾與學生均互相尊重，並未互相打擾。只是過程當中，由於民進黨帶領群眾呼喊「打倒老賊」口號，聲勢過於驚人，使得學生這邊活動被中斷了數次之久。當晚民進黨所辦的活動已結束，但民眾遲遲未散，因此傳出軍系將派鎮暴部隊鎮壓群眾，

³²⁷ 同註 32，頁 45。

³²⁸ 同註 32，頁 45。

然則勢必波及到學生，幸賴警政單位出面接手，未讓鎮暴部隊進駐中正紀念堂，否則後果不可想像。在這同時李登輝曾表達親赴廣場探視學生的意願，但是被身旁人士勸阻而作罷。

3月19日廣場上靜坐學生已超過3000人。除了大學生之外，高中生也加入抗爭行列。上午十點多，東海大學社研所方孝鼎率先絕食靜坐，隨後陸續有9人加入，並發表〈絕食聲明〉。³²⁹此外，多所大學也在校園內發起抗爭，其中東海大學的抗爭，學生還一度將砲口指向梅可望校長，雙方人馬不歡而散。起因梅可望表示，「學生北上參加抗議，不是公事，當然不能准予公假，因此，參加的同學必須按照規定請假。」³³⁰下午1點，又有20餘名教授加入靜坐，總計大專院校教授、學者共有150餘人。

此外，最初討論要以何種東西作為學運的象徵時，整個討論的過程其實非常不順利。學生們認為一定要是「本土的」，並且設計容易，能在短時間製作完成。

最先出爐的方案是「鍾馗」，但反對理由甚多，其中一點便是鍾馗產自中原文化，似乎不太本土化；於是第二個方案「風獅爺」便誕生了，但認識的人似乎不多，尤其美術系的學生非常不喜歡鍾馗和風獅爺，因為要在短時間內作造型設計實在是困難重重；這時又有人提出「倒立三角錐體」，但似乎跟本土化一點關連性都沒有；後來文化大學美術系曾若愚提出以「花」來代表，這時各種花名都被想出來。一位東海學生提出「台灣野百合」，因為這種花瓣內側帶淡紫色細線紋，是台灣的特有品種，台大城鄉所夏鑄九則想到這是魯凱族的圖騰，正是符合本土化的要件！但接下來又有「蒲公英」、「燈」等構想。

經過將近7個小時的討論之後，校際會議表決結果，「野百合」以壓倒性姿態獲勝，正式成為這次學運的精神象徵，並隨即在14個小時內搭建起來。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一、對台灣實體性的認同（自主性）；二、全民的運動（草根性）；三、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四、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五、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六、參與

³²⁹ 〈絕食聲明〉，1990.3.19，收於林美娜編，同註33，頁97-98。

³³⁰ 同註32，頁57。

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³³¹

3月20日進展誠如前一天，並無兩樣。只是這一天政府開始派出人員與學生交涉，但學生不為所動。當全國各級議會在聲援學生的同時，黨政軍學開始向學生喊話，要求結束靜坐，趕快回到校園上課，新聞媒體也開始被要求對學生「冷處理」。當天下午學生代表到總統府發邀請函，請總統李登輝前來廣場與學生對話，由於不是李本人親自接見，因此學生拒發邀請函給代接人員，使得學生回到廣場後更加不滿。這時學生人數到達4500-5000人，但卻也發現學生群眾的組成似乎變得複雜與不單純。糾察人員陸續向指揮中心回報，各校園黨部學生開始出現在各校靜坐群裡頭，有的學校訓導人員甚至加入學生的討論運作，救國團大量動員學生等，很明顯已有國民黨勢力滲透進來，更加造成廣場上學生的恐懼。

參、尾聲：野百合精神永在

3月21日凌晨，各校代表、三位研究生（曾旭正、吳介民、李建昌）、五人教授顧問團（賀德芬、瞿海源、張國龍、鄭村棋、夏鑄九）召開會議。由於大家意識到學運可能產生變質，如何收尾變成了討論重點。因此當時由瞿海源、賀德芬先行至總統府了解底線，內容則包括：

- 一、李登輝必須具體肯定這次學運。
- 二、在國是會議中，公平邀請各界人士，深入討論國是，對於學生的訴求：廢除臨時條款、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應提出有效解決方案。
- 三、全體廣場學生於總統先生明確認可以上二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否則將堅持原則繼續抗爭到底。³³²

³³¹ 同註2，頁319-320。

³³² 同註32，頁75-76。

李登輝答應全部要求，僅將「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改為「國會全面改選」，因前往廣場與學生對話一事，有安全顧慮，所以李登輝希望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由於瞿、賀兩人至總統府一事，僅教授五人小組以及決策小組知道，因此當校際會議代表知道他們被蒙在鼓裡後相當氣憤，而不願意表決。在廣場上的學生此時也知道了這些事，雖然曾要求決策小組辭職以示負責，但最後又挽留了他們，這時這場學運的決定權似乎回到了廣場上的學生身上，經各校派代表上台表決，通過四點要求，同意派學生到總統府協商：

- 一、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決心與情操及學生所提四項嚴肅要求，並對全國民眾發表。
- 二、在總統就職前召開國是會議。
- 三、全體在廣場上學生同意上述兩項要求如能被接受，立即結束靜坐，如果沒有，將持續採取抗爭。
- 四、為確保學生主張能獲得執行，他們將組成一個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他們將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³³³

7 點 40 分，學生代表與李登輝在總統府見面，但學生所提問題不是切不到要害，就是被李登輝四兩撥千斤化解。李除了國是會議召開時兼有明確回應，其餘皆含糊帶過，由於雙方認知太大，為此學生代表范雲則要求離去，此時 9 點 50 分。

11 點，學生與李登輝對談的帶子送到中正紀念堂，在看完後由各校討論是否撤離廣場。3 月 22 日凌晨，43 名絕食團學生率先表決清晨撤離廣場，最後各校也同意撤離廣場，唯淡江大學反對。野百合學運的最後一夜，廣場將近有 7000 位學生。到了早上，廣場指揮中心宣布四大處理原則：一、發表一份正式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³³⁴二、成立全學聯，持續關切國是；三、成立善後處理委員會；四、成立「野百合基金會」，管理民眾的捐款。³³⁵野百合學運至此正式劃下句點。

³³³ 同註 32，頁 79。

³³⁴ 〈我們的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1990.3.22，收於林美娜編，同註 33，頁 142-143。

³³⁵ 同註 2，頁 377。

第三節 後續的餘波盪漾

1980 年代台灣的學運，自從學生開始走出校園，關心起社會的議題，例如從事社會服務、鹿港反杜邦運動、到野百合運動為止，可以看出學生不再只是將焦點侷限於學校內的改革事務上而已。如果依照林玉体對於學生運動的三個層次來分析的話，1980 年代以後台灣的學運，已經達到第二、三層次之間，也就是對於學校內、外不公不義的事提出批判。野百合學運結束之後，學生的聲音並未消失，相反的，他們仍對社會上許多公共議題持續關心著，本節即要探討 1990.3.22 野百合學運之後的陸陸續續學運事件。

壹、1990 五月學運--反軍人干政運動

野百合學運結束之後，當時大家所關心的焦點放在國是會議的憲政辯論，與高層人士的改組，行政院長李煥的去留，成為國民黨內權力鬥爭的重心。1990.5.2 傳出李登輝可能提名國防部長郝柏村組閣，引發社會動盪不安，當天晚上台大數十名學生仿效野百合學運，再度到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李登輝毫無改革誠意，任命軍人組閣。

不過這次跟野百合學運比起來，一直無法發展起來，規模也無法擴大。³³⁶於是學生自組「小蜜蜂」特攻隊，以噴漆方式宣傳學生的想法，5 月 5 日深夜，11 位學生再度出擊時，結果於台北火車站遭警察逮捕，在學生包圍警察局抗議之下，不久就被釋放。5 月 6 日數千名學生和民眾從中正紀念堂出發，遊行到火車站後宣布解散，此為反軍人組閣第一波行動。

³³⁶ 究其原因，五月學運焦點仍在政治議題，加上離野百合學運才短短 2 個月，再次大規模動員相當困難。況且五月學運不是以學生為唯一的抗爭主體，學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學生參與的規模才無法擴大。

學生的第二波行動決定在 5 月 20 日採取「遍地烽火」的形式，由各區域同時分別展開行動，提出訴求：「打倒軍人統治，反對個人獨裁」、「重視弱勢團體，實現社會正義」、「反對國是會議淪為御前會議」、「520 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

5 月 17 日由教授及文化界人士組成「知識界反軍人干政聯盟」，在省立博物館展開靜坐。5 月 18 日台北地區 70 餘位各校研究生從台北市議會遊行至博物館加入教授的行列。5 月 19 日全學聯出動「小蜜蜂」，並至博物館聲援教授。5 月 20 日「全民反軍人干政聯盟」發起遊行，包含全學聯、社運團體、教授，從中正紀念堂出發再返回原地，舉行野百合的落成儀式。

全台各地學生也發起遊行抗議。台中約有 80 餘名學生組成機車隊遊行；「小蜜蜂」行動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遭到情治人員的毆打，在華視公司前抗議，事後竟遭到華視控告。³³⁷

令人遺憾的是，5 月 20 日李登輝宣誓就職總統當天，就職演說中並沒有依野百合學運的承諾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甚至當天下午，國民黨召開中常會，也通過李登輝提名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

第三波行動則在 5 月 27 日在立法院前，即有立委與民眾進行絕食抗議；5 月 29 日立法院行使同意權，院外有示威群眾與鎮暴警察的流血衝突，並有人投擲汽油彈，郝柏村在出任行政院長後，竟公開宣佈要懲治「社運流氓」。

其實在第三波行動中，學生的參與就變成很少，僅有少數個人參加，原因是當時參與學運的學生也遇到一連串的怪事，例如回家時遇到車禍、在校門口遭人刺傷、遭到毆打、家裡被噴漆恐嚇；學生在 520 遊行前，還遭到黑幫「洪門」揚言要組「大蜜蜂」反制。6 月 6 日重塑的野百合被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從廣場移到角落，最後竟然下落不明。

嚴格來說，反軍人干政運動也是學生運動的一環，但整個運動的主角不

³³⁷ 林玉体，〈「小蜜蜂」的微過與大功〉，《自由時報》，1991.7.8。收於林玉体著，《老師請妳走出洞外》（台北：前衛，1993），頁 95-97。

完全是學生，尤其是在 5 月 27 日之後。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學生嘗試與社運團體、教授合作，將資源整合，鎖定關心的議題發起抗爭，如此影響層面也能擴大，對於執政者也比較能造成威脅。

誠如本文前面所講，野百合學運時民學聯反對學生涉入，認為：總統選舉這種泛政治化的議題，搞一次行動就收場，並不具有學運的根本意義。因此反軍人干政事件，學生再次涉入，不知應該給予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尤其學生涉入政治人物的鬥爭裡頭，被利用來當成政治工具、籌碼，往往還不自知，因此反軍人干政事件所突顯出的學運價值，只能留待後人評斷。

貳、1991.5.9「獨台會事件」

1991.5.1 李登輝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8 天後，也就是 5 月 9 日清晨，調查局逮捕了 4 位青年，理由是「參加獨立台灣會」，並以二條一加以收押，舉國譁然，整個台灣立刻又回到 1950、60 年代白色恐怖時期。

這四位青年分別是：廖偉程（清大歷史所學生），熱衷學運；陳正然（台灣教授協會會員），「代表」制憲聯盟；王秀惠（政治受難基金會會員），幾乎「無役不與」，只差「社運流氓」未加冕而已；林銀福（神學院身份的漁民），「代表」了原住民運動。³³⁸其中廖偉程更是調查局直接進到學校宿舍，直接將睡夢中的他帶走。

情治人員直驅清華校園的學生宿舍，在凌晨「抓人」，充分顯示大學校園的毫無自主性，學術自由更無絲毫保障，簡直就是赤裸裸的「政治干預學術」。教育主管的毫無擔當，明明被火辣辣地摔了一個耳光，教育部長和校長在事發後居然將檢討重心擺在情治人員為什麼要摔耳光而不先打招呼，以及如何打招呼的「禮貌問題」上，卻不聞不問被抓的學生，知識份子的尊嚴與風骨蕩然無存，更是令人痛心。³³⁹

³³⁸ 林碧堯，〈「項莊舞劍，意在社運！」--審視獨台會事件〉，《自立晚報》，1991.5.12。收於林逢慶編，《知識份子與反對運動》（台北：前衛，1993），頁 55。

³³⁹ 同註 52，頁 56。

這 4 位被抓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都和史明有接觸過，更不約而同地成爲「獨台會」的成員，而因爲在諸多台獨組織中，它屬於「弱勢團體」，因此調查局才抓它開刀。

張炎憲認爲：

陳長文甫自中國歸來，國民黨立即抓台獨，兩面手法玩得相當高明，壓制台獨，向中共示好，又以台獨，向中共索取談判的籌碼，更以中共來恐嚇台獨。國民黨左右逢源，不戡亂中共反而戡定了台灣。³⁴⁰

被抓走的這 4 位青年，立刻受到全國教授、學生聲援，引發一場大規模的靜坐抗議。然而 5 月 12 日執政當局動用警力強力驅散學生、教授，並藉機逮捕學生、毆打教授。5 月 13 日甚至派遣鎮暴警察追打靜坐學生、教授。³⁴¹清華和台大師生於是發起大規模的罷課行動，5 月 14 日到立法院的請願、教育部的抗議，使得政府開始吃不消。5 月 15 日下午，來自台大、清華、東海等 10 餘所大專院校的學生，以原全學聯、制憲聯盟和新的廖偉程救援會爲班底的成員約千餘人，進駐台北火車站售票大廳的東南側，開闢「人民廣場」。學生並提出「尊重學術自由」、「反政治迫害」、「廢除叛亂條例」、「要求釋放無辜」，象徵性地向售票窗口購買「民主列車」的團體票，以表達他們的訴求。³⁴²

5 月 17 日雖然執政當局釋放「廢除懲治叛亂條例」、「4 位年輕人交保獲釋」兩項善意，但在 5 月 20 日仍有超過 50000 人上街遊行示威抗議（學生人數約 1500 名左右）。可悲的是，520 遊行過後，國民黨不但沒有深切反省，知青黨部在數天之內即發動了 2、3000 學校教職員工簽名反制 520 知識界的遊行，印證了執政黨對於校園的控制仍不願鬆手。³⁴³

³⁴⁰ 張炎憲，〈獨台會事件與國民黨心態〉，《自立早報》，1991.5.12。收於林逢慶編，同註 52，頁 51。

³⁴¹ 林忠正，〈追究「再造白色恐怖」的責任〉，《民眾日報》，1991.5.19。收於林逢慶編，同註 52，頁 67。

³⁴² 林碧堯，〈學生們靜候民主列車〉，《自立晚報》，1991.5.16。收於林逢慶編，同註 52，頁 70。

³⁴³ 林忠正，〈「520」是民主運動的轉捩點〉，《民眾日報》，1991.5.21。收於林逢慶編，同註 52，頁 90。

因此國民黨公然的抓人行動，無視於大學乃標榜學術自由的殿堂，正是在宣示人民不要因戡亂時期的結束而向執政當局挑戰，即使是大學生也不例外。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參、地下社團、本土性社團的「遍地開花」

1980 年代以來，由於校園的逐漸開放，使得學校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即使有些社團遭到校方的阻撓、打壓，無法登記為合法社團，但很多地下社團一樣可以到處在校園內流竄、活動。

例如中國醫藥學院籌組台灣文化研究社；靜宜大學成立浪濤沙生態社；中興大學成立法學社黑森林工作室，從事校園民主的抗爭，欲將學生活動中心改制為學生會；台中師範學院成立明社，以師範及校園的問題為主；逢甲大學成立阿草俱樂部，台灣意識濃厚，當時曾向校方登記為台灣歌謠社，但遭拒絕；高雄師大成立論壇社，要求校園言論自由，曾出版地下刊物《野百合廣場》，遭校方取締，高醫學生為此還曾到高雄師大門口舉行聲援演講；政治大學也籌組台研社；文化大學成立草山學會，提倡大學社區運動、土豆社則是以發揚台灣意識為主的社團；台大成立世界人權社，為學運中第一個以人權為重心的社團；海洋大學則有鄉土文化研究社；甚至是跨校的社團產生，如東海大學及中山醫學院合組的「草根工作室」，強調學運與社運的結合。³⁴⁴

除此之外，1990 年代起學生運動關心的議題也開始涉及國家認同、統獨問題，於是許多具有台灣意識與台獨意識的社團也紛紛成立，整理成表 5-2。其中台灣意識的社團指涉了社團以各個層面或議題切入，終極關懷為台灣島這塊土地；台獨意識的社團，則指涉對於台灣島的關懷已上昇到國家認同的層次。台獨意識終究包含了台灣意識。首先在 1993.3，台大學生為突破校園

表 5-2 1990 年代前期各大學台灣研究性質社團簡表

台灣意識的社團

³⁴⁴ 同註 2，頁 386-387。

學校	社團名稱	學校	社團名稱
台大	台灣研究社、建國俱樂部、 掌中劇團、台灣歌謠社、 大學論壇社、客家研究社、 台灣語文社、原聲帶社、 大學新聞社	中央	福爾摩沙社
		成大	台灣研究社、台灣語文社、 經緯社
		清大	台灣研究社、台灣語文社
		交大	台灣研究社
師大	人文學社	中興	黑森林工作室
輔大	建國聯誼會、台灣研究社、 黑水溝社	中興 法商	台灣研究社、青年社
東吳	黑水溝社(台灣文化社)、 獨派學生聯誼會、 蘇菲亞社	政大	台灣文化社、國際思潮社
		海大	鄉土文化社、時代新聞社
		文化	時事研究社、草山學會
淡江	淡江論壇社、台灣語文社、 紅樹林社	東海	台灣研究社、人間工作坊
		逢甲	逢甲論壇社
靜宜	浪濤沙社	工技	鴻鳴
台獨意識的社團			
學校	社團名稱	學校	社團名稱
台大	台灣研究社、建國俱樂部、 台灣歌謠社、大學論壇社、 掌中劇團、大學新聞社	中興 法商	台灣研究社、青年社
輔仁	台灣研究社、建國聯誼會	淡江	論壇社
中興	黑森林工作室	成大	經緯社、台灣語文社
逢甲	論壇社	海大	鄉土文化社、時代新聞社
東吳	蘇菲亞社、獨派學生聯誼會	工技	鴻鳴

資料來源：編輯部，〈九十年代學生運動簡表〉，收於《蕃薯地上的反叛種子：第二屆學生運動研討會・1994 台北篇》（台北：前衛，1995），頁192-193。

內部關於台獨結社權的禁忌，向校方提出申請「建國俱樂部」，其宗旨為：聯合校內學生，思考台灣前途，起造福利國，共建新家園，6月17日獲校方同意成立。此後，輔大「建國聯誼會」、東吳「獨派學生聯誼會」也陸續產

生。³⁴⁵

各校關於台灣研究性質社團的成立時間，大致可以 1990.3 為分界，3 月之前成立的社團，大多是各校自發性地對於台灣本土關懷而設立，其社團體質較為靜態，學術研究性質較濃厚；3 月之後成立的台灣研究社團，則是以學運份子為主要發起者，比較傾向運動性，但是沒有學運之際，他們則汲汲於吸收了解台灣的歷史與現況，也常思考台灣前途。除了「獨立建國」的基本方向之外，他們更重視的是台灣作為一個新國家，是否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文化及社會是否公義。

肆、校園內的抗爭：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生罷課事件

除上述以關心國家、社會議題的學運之外，也有學運的發生是針對校園內的事件。例如，發生在 1994 年的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生罷課事件，就是解除動員戡亂時期之後，一次非常重大規模的學運事件。

一般說來，世界各國的學運往往發生在一流大學，因為這些學校所招收的學生原本素質就比較高，對於校園內、社會上的事務敏感度相對也比較高。由於學生習慣從「批判性」的角度來看待事務，因此若是教授課堂的講授太過糟糕、學校行政太過官僚、社會太過不公不義，往往會引起這些學生的不滿，進而引發學運。

因此台灣學運發展史上，幾乎與「台大」學運劃上等號（第四節第壹部分會再詳加說明）。所以說文化大學所爆發的草山學運，無疑是 1990 年代打破這項定律的最佳證明，同時也是私立大學中引發大規模學運最著名的一次。尤其文化大學的黨校背景，竟也發生如此重大的學運事件，顯見政黨已無法遏止校園學術自由的聲浪。

1991 年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生曾連署罷免系主任許坤成，但遭到董事長張

³⁴⁵ 編輯部，〈九十年代學生運動簡表〉，收於《蕃薯地上的反叛種子：第二屆學生運動研討會·1994 台北篇》（台北：前衛，1995），頁 190。

鏡湖表不同意，事後連署學生中有二位遭退學，三位遭延畢。1994 年學生秦正德（「反對藝術獨裁」讀書會成員）被系上以「油畫水平太低，上課態度不佳」遭到退學，引發全系學生不滿。4 月 28 日全系三分之二以上學生決議「集體罷課行動」，譴責「董事會干預校務，校方袒護系主任；私校因未受監督，而任意動用行政暴力」，至於訴求則訴求包括「徹查秦正德退學事件」、「撤換系主任許坤成」、「系主任及師資聘任課程公開遴選程序」、「對參與此事件之同學不得任意秋後算帳、羅織罪名」、「建立健全之評鑑制度及申訴管道」、「公布學分選修制度之真相」等。³⁴⁶

由於校方遲遲不願回應，且許坤成表示：「打分數是教授學術自由的領域。」於是學生轉向求助立法委員，向教育部陳情。5 月 4 日文化大學百餘名學生在大雨中向教育部下跪一分鐘，要求教育部監督許坤成壓制學生創作自由，教育部硬是拉下鐵門不接見前往陳情的文化大學學生，任憑學生淋雨、下跪，政風室官員就是極力反對打開鐵門。後來被立法委員抨擊，並要求教育部長郭為藩下台。教育部政次楊朝祥卻表示：「文大的事情基本上應採校園自主的原則，應由校方自行處理。」郭為藩也表示：「是否組調查小組將尊重文大的自主權，由文大自己決定。」³⁴⁷從這兩人的談話可以看出，教育部不想收拾這個爛攤子。

於是事情如雪球般越滾越大，連學生家長也連署支持學生，公開呼籲「救救我們的孩子」；200 多位系友組成系友會聲援學弟妹之外，還指出教育部與張鏡湖的太太穆閩珠（國民黨立委）有「政商掛勾」的「共犯結構」；學生不但連署罷免許坤成，5 月 18 日展開接力禁食，並夜宿校長室門口，5 月 26 日甚至「接管系辦公室」，高喊「校園要民主，學術要自由」，並準備召開系務會議。

後來教育部次長黃鎮台出面與學生溝通，展現解決問題的誠意，另一方面，學生也不願意讓外界產生過多不必要的聯想，於是 5 月 30 日主動宣布持續 30 天的罷課正式結束。郭為藩表示：「教育部未來基於尊重學校的立場，除非必要，將不會走到校園糾紛事件的第一線。」³⁴⁸這句話則是為下半年的

³⁴⁶ 引自薛曉華，《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與社會的分析》（台北：前衛，1996），頁 290。

³⁴⁷ 引自薛曉華，同註 60，頁 291。

³⁴⁸ 引自薛曉華，同註 60，頁 292。

文大草山學運埋下伏筆。

事後文大美術系系務會議選出劉良佑為系主任，不久劉便辭職，辭職原因雙方各說各話。董事長張鏡湖指出：

劉良佑讓學生參與系務會議，不合校規。劉良佑要新聘的教師，有些資格不合，甚至參加過五月份的文大草山學運，……總之未按校內規定的行政程序。³⁴⁹

劉良佑則說：

在我接任系主任時，張鏡湖曾指示不准在美術系排某些同情罷課學生的教師的課，就是要「秋後算帳」，因為我沒有照做，而造成校方對我的不滿。³⁵⁰

學生不甘示弱，9月22日在文大大義廣場前展開拉抗議布條與發傳單抗爭行動，除了力挺劉良佑之外，並發表〈這絕對是一樁杏壇上的大醜聞--請全體文大師生共同將張鏡湖逐出文大校園〉的聲明，提出「張鏡湖下台」、「執行暑期通過之系物革新計畫」、「學生全面參與校、系務」、「平反劉良佑」四大訴求。

不料參與此抗議行動的學生竟遭到學校報復。薛淑麗被校方以「公共場所發表言論侮辱師長」、「赴教育部作不實之陳情，嚴重損害校譽」兩項理由，勒令退學。林靜怡則因為幫忙發傳單，而被處以「留校察看」的處分。10月11日文大「草山學會」發表〈驅逐恐怖份子，終結新恐怖主義！〉、文大學生會則發表〈反對非法迫害，製造白色恐怖〉，共同譴責校方對學生無理的迫害。

屋漏偏逢連夜雨，10月8日教育部公布大學評鑑結果，宣布「文大違法弊端不勝枚舉，在未健全校內體制前，全面凍結獎助金一億多元。」於是校方認定教育部乃是屈服於學生和外界壓力下，對校方所做的無理處罰。文大

³⁴⁹ 同註 60，頁 314。

³⁵⁰ 同註 60，頁 314。

學生會在 10 月 12 日到立法院陳情，指校長林彩梅將學生運動抹黑成「獎助金一億元被教育部凍結的元兇」。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吳椿榮出面澄清這兩件事根本毫無相關，結果校方反譏教育部在逃避責任。

文大學生認為文大體制結構千瘡百孔，於是自組自救聯盟，並於 10 月 21 日發起學生自決投票。針對「是否贊成教育部接管文化大學」議題，公投結果，在 14000 位日間部學生當中，共有 2975 人參與投票（投票率 21.25%），其中 2787 張票（占總數的 93.68%）贊成這項提案，但校方卻表示「不會承認也不會理睬這項投票結果。」³⁵¹

從上述可看出校方自始自終的蠻橫態度，身為高等學術殿堂的最高位者，竟不斷做出殘害「學自由」、「教自由」的無理舉止出來，還一再藉故推卸任何責任，一副老大心態，真是不知廉恥。而教育部這種保持「不沾鍋」的態度，竟還大刺刺表示，為求大學校園自主，因此不方便涉入，以免遭到流長斐短，也顯然教育部這種「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傳統官僚氣息，真是令人要不得。

不過文大在 1994 年所發生的諸多校園學生運動（對抗校方的行為）之中，算是在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之後，台灣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之一了。

第四節 1980 年代以來學運的「風起雲湧」與 「眾聲喧嘩」

上述分析了 1980 年代以來台灣社會以及校園的發展，並鋪陳諸多學運事件的發生以及來龍去脈。的確，在歷經 1987.7.15 政府宣布解嚴、1991.5.1 終

³⁵¹ 引自薛曉華，同註 60，頁 317。

止動員戡亂時期，以及諸多重大事件發生之後，台灣社會結構的確開始走向「鬆動」了（雖然有人認為台灣社會要等到 1994 年之後，才算真正的「解嚴」），一股民間的力量正在興起，無可否認的是這個趨勢、情勢也不會再回頭了。

校園緊接著也開始「鬆動」，使得學生運動可說是「風起雲湧」、「眾聲喧嘩」、「遍地開花」。一方面學生開始走出校園、教室外，開始關心整個社會所存在許許多多不公不義的議題；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在「鬆動」的過程當中，學校的緩慢適應、甚至是拒絕開放、改革，造成更多的校園學生抗議事件發生。

從林玉体對於學運的三個層次分析，這些都應算作是學生運動。本節嘗試在這些學生運動事件中，提出三個基本面的問題（事實上也是這個時期學運發展所遇到的困境、難題），並作一初步分析，藉以呈現出這個時期學運的另外一面。

壹、學生運動？還是「台大」學生運動？

台灣的學生運動發展中，究竟應該稱為學生運動，還是台大學生運動？這個問題在筆者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不斷進行反思與辯證。不只是 1980 年代以來，甚至是 1980 年代以前，是否都是如此狀況。

鄧丕雲在撰寫《八〇年代台灣學運史》時，也不斷地對這問題作陳述：

筆者不否認出身於本書中所謂的「台大」這個學運傳統，不過也盡可能地蒐集與紀錄不同傳統的貢獻，並在觀點上努力跳出學運中所謂的「台大中心史觀」。³⁵²

在台灣學運台大一枝獨秀時，台大即是台灣學運，當各校園運動興起時，台大只是學運中的一支，而且是各校中最特殊的一支。如果從各

³⁵² 同註 2，頁 5。

校運動的角度來看，台大無疑是個異例。³⁵³

截至自由之愛為止，台灣學運是台大一枝獨秀，台大學運與台灣學運幾乎是同義詞。所以，在當時所謂的學運發展其實是落在台大的傳統中思考的，那時在實際上也沒有其它傳統存在（或正在形成中），自由之愛正是在這樣的自我認識中，用台大的特殊性代表了各大學的普遍性，而往縱向延伸。³⁵⁴

為何台大的學運歷史比起其他各校，會來的悠久且影響深遠呢？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日治時期的台北醫學校（今天的台大醫學院）學生，早已在從事民族運動；當國民黨政府來台時，爆發四六事件，雖然主角是師院，但是台大校長傅斯年處理態度，表現出的果敢、堅決，也使得台大奠定了自由學風。

再者，台灣許多大學成立時間只有區區幾十年，跟國外動輒幾百年校史的大學比起來，很難塑造自己的學風。尤其很多大學是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以「在台復校」所成立的，說要多有自由、批判的學風，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師範院校則是被政府視為精神國防的堡壘，怎麼可能站出來挑戰政府呢？尤其台大有許多信奉自由主義的學者教授，「人多聲勢大，政府才會怕」，其他大學可能都只有少數幾位而已，只能被當作「孤鳥」。

但是當 1980 年代以後，各校園逐漸開放、留學歸國的學人紛紛進到大學任教，以及學生開始頭角崢嶸之時，各校際之間的行動卻也開始呈現角力戰。鄧丕雲說道：

就在請願行動後不久，各校的運動紛紛而起並開始互相串聯，逐漸形成學運的另一個傳統，開始了學運中台大與非台大間數年的紛爭，這個幽靈不斷地騷動著學運的發展，幾乎與往後的學運發展相始終，直到九〇年代還喧嚷不安沒有停歇。³⁵⁵

確實是如此，尤其在野百合學運時，校際代表與決策代表間的角力戰，

³⁵³ 同註 2，頁 89。

³⁵⁴ 同註 2，頁 88-89。

³⁵⁵ 同註 2，頁 89。

更是不時屢屢見到。范雲甚至在野百合學運開始時，就表示有另起爐灶的打算，因為，「這是別人的場子，不好意思介入。」³⁵⁶往後野百合學運的發展期間，台大學生會（「國是會議」路線）、民學聯（「政經改革」路線）、新青年（「新憲法」路線）之間意見的分歧、妥協，確實也影響整個學運的發展走向，不過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樣不就才能稱作「眾聲喧嘩」嗎？如果大家意見都一致，那跟以前威權時代又有何兩樣？何況是標榜自由、民主的學運呢？上述 1994 年所發生在文化大學的草山學運，是 1990 年以來私校大規模的校園抗爭之一，卻也打破了台灣學運等於台大學運這項律則，所以 1990 年代的學運實已呈現「眾生喧嘩」、「百花齊放」、「遍地開花」的局勢了。

貳、學運和政治反對團體間的關係

台大學生在 1980 年代許多校園抗爭事件屢屢遭受挫折之後，於是將「策略聯盟」的觸角伸向教授、社運團體、黨外政治團體。尤其學生與黨外政治團體保持著「若即若離」關係，希望雙方合作，但又不願被歸類為黨外運動的一環。

學生與當時黨外運動過從甚密，也是其來有自。例如林正杰、邱奕彬、何文振、田秋堃、蕭裕珍、陳忠信、李筱峰、盧孝治、楊秋興、汪立峽等人，在口述訪談當中，都談到曾在就學時期，替黨外候選人助選、發傳單。³⁵⁷但這其實也是相當冒險的，例如李筱峰（當時就讀政大教育系）因為寫了〈從當前教育問題談學生運動之必要〉、〈個性教育往那裡去〉等文章，幫忙黨外候選人選務工作，不但被記過，還差點被警察約談，最後被政大退學。

其中李筱峰談到一段話，或許道出了當時支持黨外運動學生的心聲：

1972 年，當我站在台北街頭聽康寧祥演講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那麼樣赤裸裸的批判當時的蔣政權。大家聽得如癡如醉，萬人空巷，有的人聽到流眼淚。忽然間我有一種感覺：「啊！台灣出現這樣的人

³⁵⁶ 同註 32，頁 46。

³⁵⁷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台北：時報文化，1999），頁 151-186。

物，台灣有希望了！」³⁵⁸

1980年代學生投入黨外運動的狀況更是屢見不鮮，不管是獨派的新潮流或是統派的夏潮，對於學生在校園內的孤立抗爭總是能夠伸出援手，但學生似乎很不滿老是被外界歸類為黨外運動的一環。於是1983.6.21台大舉辦了一場「黨外運動與學生運動座談會」，雖然最後沒有達到什麼具體結論，但是卻開啓了雙方更進一步的對話空間。³⁵⁹

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之後更是如此，很多當年的學運健將，例如林佳龍、羅文嘉、鍾佳濱、鄭文燦等人，現在幾乎都在政府、民進黨裡工作，形塑出所謂的「學運世代」。³⁶⁰當年這些學生、教授、反對黨、社運團體的結盟，無非是要打倒國民黨，但是公元2000年民進黨取得總統寶座、2004年民進黨再次取得執政地位，何榮幸說：「惡魔黨被打倒了，然後呢？」³⁶¹

翁士杰發表在《中國時報》(2000.5.28)一篇〈再下來，我們要反對什麼？〉文章，裡頭說道：

我想沒有一個受野百合學運洗禮的人，會那麼天真的以為，加入或支持阿扁的新體制，就代表反對貞操的喪失。相反的，如果能在進入新體制後，努力地實踐當初所堅持的理想，那絕對是種比反對更崇高的責任倫理……然而，今天我們所談的不是個人層次的問題，而是台灣的社會有沒有獨立自主深厚堅實的批判傳統與反對論述，可以超越個人、黨派、族群、對立的意識型態，而形成一種為整個社會所接受的普遍價值。野百合十年後的清香是否還在，就看我們反不反對「反對的傳統」就此消失了。³⁶²

或許這篇文章所點出的主旨，可供學運世代以及大學生來做思考。「學運」的核心價值不僅依附在政治上而已，「學運」是一股清流，要有深厚的批判精神，永遠對社會上不公不義的現象進行挑戰才是。

³⁵⁸ 同註 71，頁 173。

³⁵⁹ 同註 2，頁 35-36。

³⁶⁰ 所謂「學運世代」，指的是當年投身校園運動，參與過野百合學運等大大小小的「戰役」，目前年紀約在 30-40 歲之間的人。這些人後來多半都投入民進黨陣營。

³⁶¹ 同註 16，頁 96。

³⁶² 引自何榮幸，同註 16，頁 125-126。

參、關於學運中學生的主體性問題

另外一個關於學運的問題，即是在學運當中，學生的主體性是否存在。上述問題談到學運與民間社運團體、政治反對團體的關連，1980年代以來，當學生走出校園外對社會提出深刻的批判同時，學運是否遭到收編？學運主體真的是學生嗎？

以野百合學運為例，當時學生爲了不願被外界視爲與民進黨「同一國」的，想要彰顯這場學運自己的訴求，於是將靜坐學生與一般民眾用線隔開來，並拒絕政治人物上台演講。雖然整個學運的走向不至於被「泛政治化」，但是究竟學運是按照學生自己的想法，還是後來五人教授小組的想法再發展，在何金山等人所合著《台北學運：1990.3.16--3.22》、以及《中國論壇》，都有深刻剖析這五位教授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這場學運中的影響。³⁶³

當時爲了要不要派人去總統府，使得五人教授小組的賀德芬與廣場上的學生發生齟齬。弔詭的是，最後學生從極端反對到完全接受，不可謂不說是受到賀德芬影響。《台北學運：1990.3.16--3.22》這本書就分析道：

學生事後反省說，很顯然，40年的戒嚴體制下來，學生在不自覺的狀況下，被馴化成服膺威權體制的個性，一般同學缺乏對權威挑戰的能力；再者，向來台灣學生表達自我意志的意願都不高，加上在這次運動中許多學生，並不是很清楚地認知到「所為何來？」遇到問題時往往會流於情緒反應，當情緒被安撫下來，問題自然迎刃而解，至於問題的根本反倒被同學忽略掉了。³⁶⁴

因此學運當中，究竟學生的聲音佔了多少，也是一個值得再去探討的問題。不只是野百合學運而已，1980年代當學生走出校園，對於社會所進行的抗爭，以鹿港反杜邦事件爲例，究竟是學生的聲音，還是當地居民的行動在

³⁶³ 何金山等，同註 32，頁 110-112；〈五人教授顧問團專訪〉《中國論壇》30 卷 1 期（1990.4.10），頁 53-61。

³⁶⁴ 同註 32，頁 82-83。

主導整個運動的發展，釐清這個本質之後，才能判定是否為學生運動。學生在學運當中如何成為主導者，而不是依附者，也是一個值得去深思的問題。

肆、台灣教授協會與學運間的關連

1990.12.9 一群在高等學府從事教學研究的教授，目睹台灣長期以來政爭不斷、社會治安日益敗壞、人性扭曲、經濟衰頹、環境污染、教育腐化的現象，歸結後認為乃是台灣的國家主權無法獨立，導致資源的無窮浪費以及政治意識型態的錯誤，國家喪失國際上的國格。³⁶⁵因此集合一批認同「台灣主權獨立」的教授，仿效「美國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 成立了「台灣教授協會」(Taiw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TAUP)。「美國教授協會」首任會長為 J. Dewey，而「台灣教授協會」首任會長則是師大教育系教授林玉体。³⁶⁶

台灣教授協會致力實踐台灣獨立建國，以「政治民主、學術自由、社會正義、經濟公平、文化提升、環境保護」為宗旨。³⁶⁷另一方面，這些「路見不平，挺身而出」的自由派教授，也是促使 1990 年代學運更加蓬勃發展的主因之一。由以下幾個例子便可看出：³⁶⁸

- 一、早在 1990.3 野百合學運時，台灣教授協會雖然尚未成立，然而這些自由派教授就已經到中正紀念堂聲援學生。1991 年台灣教授協會與各大專院校學生組成「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以「主權、制憲、社會改造」為主題，從 4 月 7 日至 24 日到各機關進行議題性抗爭，並且大量印發運動手冊及戰報宣揚理念。4 月 17 日遊行之後，學生在台大校門口進行六天絕食抗議，表達人民制憲的主張。

³⁶⁵ 林玉体，〈台灣教授協會成立的歷史意義〉，《自立晚報》，1990.9.12。收於林玉体著，同註 51，頁 29。

³⁶⁶ 林玉体，〈路見不平挺身而出的台灣教授協會〉，《自立晚報》，1991.12.25。收於林玉体著，同註 51，頁 123。

³⁶⁷ 林玉体，〈為台灣的國家定位--台灣教授協會成立的意義〉，《民眾日報》，1990.9.12。收於林玉体著，同註 51，頁 28。

³⁶⁸ 整理自林逢慶，〈編者序〉，收於林逢慶編，同註 52，頁 5-7。

二、1991 年獨台會案發生後，台灣教授協會與學生發起土城探監、512 靜坐示威（造成警察毆打教授和學生）、學生進駐火車站、多處校園的民主講座、學生進行持續性的罷課抗議，以及 520 大遊行。最後執政當局不得不廢除懲治叛亂條例，被逮捕的 4 位年輕人也暫時獲得釋放。

三、即使如此，刑法 100 條沒有廢掉，白色恐怖依舊存在。因此 1991.9.21 台灣教授協會、學生、新國會聯合研究室幹部，共同組成「100 行動聯盟」。9 月 26 日「100 行動聯盟」在台大綜合大禮堂，由包含李鎮源等教授解說為何要廢除刑法 100 條。在經過一週理性和平的請願、抗議無效之後，開始採取「反閱兵、廢惡法」的行動，10 月 8 日至 9 日教授和學生在台大基礎醫學大樓靜坐，逼迫國民黨在 10 月 10 日凌晨強行抬離師生。於是 1991 年的雙十閱兵，便在層層鐵絲網中，狼狽地進行。刑法第 100 條在 1992.5 修正，使得箝制台灣人民思想、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長達 40 多年的「和平內亂罪」終於廢止，「白色恐怖時代」宣告結束。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台灣教授協會」的自由派教授，對於 1990 年代的學運發展功不可沒。

伍、1989 年的天安門與 1990 年的中正紀念堂³⁶⁹

1980 年代，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初期是十分成功的，特別是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但同時也引發許多社會問題，引起民眾的不滿，包括嚴重的通貨膨脹、官員的貪污腐敗、貧富差距擴大、治安狀況惡化、青年人的信仰危機等。在此同時，西方自由主義思潮進入中國，方勵之、劉賓雁

³⁶⁹ 筆者認為發生在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可與「野百合學運」作比較，不外乎三個原因：一、中國大陸與台灣有極為密切的歷史背景，與後來兩岸所發生的學運有一定的關連；二、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在當時是震驚全球的事件，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開放造成衝擊；三、同是華人社會，在經歷過強人政權之後，「野百合學運」促使台灣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然而「天安門事件」卻無法改變中國大陸高層極權統治的心態，箇中原因值得探討。後續的研究者對於兩起事件可再深入作比較。

等一批自由派知識份子湧現，大力宣揚自由、民主等理念。在六四事件之前，中國大陸曾發生過兩次全國性的學潮，包括 1985.9.18 學生遊行反對日本首相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後來發展為反對中共「太子黨」等訴求，和 1986 年底從中國科技大學最先開始的以追求民主、自由為目的的學潮。在第二次的事件中，方勵之等三名支持學生的知識份子被開除黨籍，而且與 1987.1 胡耀邦的離職有直接關係。至於胡的去世則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

胡耀邦是鄧小平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在鄧小平上臺後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是鄧小平選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在黨內屬於改革派，支持經濟與政治改革。但是 1986 年底從中國科技大學最先爆發的學潮對改革派的勢力造成衝擊，並最終導致胡耀邦於 1987.1 辭職，由另一改革派人士趙紫陽接任。

1989.4.15 胡耀邦突然去世後，北京、上海等地各大院校學生就已經出現一些學生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悼文與花圈。在天安門廣場也有悼念的群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放置花圈。這些活動始終是在平靜的氣氛中進行的。

4 月 17 日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約 500 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曾有員警試圖驅散群眾，但是沒有成功。整個活動在下午 6 點半和平結束。到當天晚上，廣場上已經聚積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的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

4 月 18 日凌晨，又有一批約 3000 人的學生隊伍從北京大學出發，向天安門廣場遊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清晨，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 7 點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過」、「新聞言論自由」、「政府官員和家屬財產公開」、「取消遊行限制」、「提高知識份子待遇」等。上午 8 點，國務院信訪辦的一名官員出面，接見了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此期間學生們繼續靜坐，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到了晚上 9 點，廣場已經聚集大約 20000 名學生。

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了約 700 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在上海情況比較穩定，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 18 日凌晨就已經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學等高校的 10000 學生在鼓樓

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但是也很快恢復平靜。在全國其他地區，雖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種活動，但是多很快在平靜中收場。

至於在北京，情況逐漸失去控制。18日當晚千餘名學生開始向新華門聚集。19日凌晨，有學生要求進入中南海獻花圈，並提交之前7點要求的請願信，武裝員警築成層層人牆，阻擋學生進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開始衝撞警方的人牆。趙紫陽在接到報告後，下令武警不得帶刺刀，避免傷害學生，但是同時要保衛新華門。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親自前往新華門部署有關事宜。³⁷⁰由於情況越來越無法控制，最後當局下令鎮壓學生，導致死傷無數，此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近代學運最為悲壯的一頁。

綜觀海峽兩岸，在1990年代前後，分別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野百合學運」。相同的是學運皆發生在威權體制統治之下；學生的要求無非是執政當局政治改革，促進一個更自由、民主、公義的社會；北京、台北，分別是兩岸的政治中心；「天安門」、「中正紀念堂」均是代表著威權體制下，強人政治所塑造的象徵，而學運發生在此，就某種意義與程度而言，對於執政者來說的確是相當諷刺與難堪的，就像吳乃德在評論蔣經國時所說：

一個社會在民主化之後仍然懷念過去的獨裁者，這並非台灣特有的現象；可是對民主價值的培養，卻是一個頗不健康的現象。³⁷¹

當執政者所型塑的政治空間是要用來臣服子民，供人民來敬仰、追悼、敬畏已逝的強人時，學生與教授卻跳出來在這塊空間中挑戰政府的威權體制，要求民主、自由。

台灣幸運的是，「野百合學運」最後平和收場，國民黨內政治鬥爭止息，一場喧囂塵上的兵變最後也無疾而終，整個國家體制也走上改革之路，不再回頭，1990年代的學運，是一場「眾聲喧嘩」的嘉年華；可悲的是，當大陸高層下令鳴槍的那一剎那，即注定了「六四天安門事件」要以悲劇收場，學

³⁷⁰ 關於上述六四天安門事件經過，整理自〈六四天安門事件〉，<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E5%A4%A9%E5%AE%89%E9%96%80%E4%BA%8B%E4%BB%B6>（2004.6.9）

³⁷¹ 吳乃德，〈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發表於國史館主辦：「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國家圖書館，2003.9.25。

生死傷無數，甚至被迫流亡海外，15年過去了，中共內部政治鬥爭不斷，也無明顯改革誠意，1990年代的學運，對於當年「拋頭顱、灑熱血」的學運份子來說，到頭來竟是一場空。

當台灣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甚至「學運世代」已頭角崢嶸、政黨輪替的同時，大陸流亡海外的學運份子卻還在殷切期盼，中共高層何時要開放政治改革。

第六章 分析與結論

※當公義遭受踐踏時，知識份子保持沈默就等於撒謊。

----塞費爾特（諾貝爾文學獎·捷克）

※所謂的「左派」，是永懷一顆「否定」（negation）的心，但不僅止於此，「否定」是有方向感的，含有烏托邦（utopia）的本質。

----波蘭左派思想家寇拉克烏斯基（L. Kolakowski）

本章針對前四章對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探討，作一總結性的分析與批判，分成「台灣真的有學運嗎？」，以及「一部扣人心弦、風起雲湧的學運史」兩部分，最後並提出研究心得。

第一節 台灣真的有學運嗎？

「台灣真的有學運嗎？」這是筆者在撰寫本篇研究論文時，不斷思考與辯證的核心問題之一。研究目的雖然並非要對「學生運動」這一詞彙作哲學式的分析與辯證，但是，在探討日治時期到解嚴後的學運（1920-1994）之後，若未釐清幾項與「學生運動」相關的本質性問題，那麼恐怕無法突顯出「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甚至是「台獨運動」的差異了。學生

運動的主角既然是「學生」，學運也就有自己的特色存在，否則便無法稱作學運了。

因此，在本章嘗試從歷史縱向發展及三種橫向層面（林玉体界定學運的三種層次、學生運動的具備條件、與西方學運作比較）來分析「台灣真的有

學運嗎？」這一核心問題。

此外誠如第一章所述，在了解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史之後，本章嘗試從歷史縱向發展及三種橫向層面初步對「學生運動」作出定義。

壹、從「林玉体界定學運的三種層次」分析台灣學運的發展

在第一章緒論曾指出林玉体根據反抗對象的差異，將學生運動分成三種層次：對大學教師、大學行政當局、或整體社會問題的反抗。在此藉由該一分類來分析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

日治時期的學生運動肇因於「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學校外的因素包含族群間的衝突，以及日人的「極權」與「經濟剝削」；學校內的因素則是日台教育上的不平等對待，導致學運不斷地發生。在第二章所引述的案例中，見到日人教師對台灣學生的歧視，例如罵台灣學生為「清國奴」，以及校方對台灣學生畢業旅行的決定地點不予理會，終至爆發台北師範學校的暴動事件；此外，日本政府對台灣的威權統治，也使得學生投入台灣文化協會的改造運動當中，這些正好符合林玉体對學生運動三種層次的分析。

至於 1940 年代的學運發展，其實是面臨當時國家處於危急之秋、社會動盪不安之際，學生所提出一連串的針砭與行動，應當屬於第三種層次。但是嚴格來說，1940 年代的學運其實是國共鬥爭的工具、產物，或可說是犧牲品，對此，應從左翼運動的觀點來看待（第二節再詳細分析）。

1950-60 年代，學生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展現出一連串的集體行動，到了 1970 年代的保釣運動亦然，只是背景換成台灣外交日益艱困這項因素。但是

1950-60 年代學生集體行動以及 1970 年代保釣運動並不能算是學生運動（「貳、學生運動的具備條件」再作分析）。

保釣之後的學生運動則集中在校園內，針對學校腐敗的行政官僚、教師

的教學研究怠惰提出批判，這時的學運應當屬於第一、二種層次。這種情況的產生可歸結於長年的「黨化教育」使然，所以學生挑戰的不只是教師及行政人員而已，更是與學校背後的巨大黨國機器作對抗。

從反杜邦運動開始，學生的觸角大量伸向校園外，開始對於社會議題提出批判（雖然 1970 年代之後就有學生投入政治反對運動、社會運動，但人數終究不多），最後在 1990 年代野百合學運集大成，這是屬於第三種層次的學運。但是，這時的學運早已不再侷限於校園內或社會上，而是呈現出「眾聲喧嘩」、「百花齊放」、「遍地開花」的樣貌。

以上是從林玉体對學運形式的三種層次歸類來分析台灣學生的運動史。

貳、學生運動的具備條件

上述是從學生所抗爭的對象來分析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在此則進一步探討學生運動需具備的條件，藉以突顯出學運的特點：

一、學生應當具備「主體性」(subjectivity)

學生運動既名之為「『學生』運動」，則學生當然是主角，問題是學生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何種關鍵性的角色？有多少的發言權？是否過程為學生自己所決定、主導的？這些問題都在在地涉及到學生的主體性。

以 1950-70 年代的校園事件為例，當時整個校園在國民黨掌控之下，學生針對社會問題所表現出的這些行為，根本騷不到問題的邊，更遑論學生在整個事件中究竟能發出多大的聲音。1970 年代的保釣運動亦復如是，學生不但沒有自己的「主體性」可言，甚至成為執政當局利用的「傀儡」。正如第四

章引用戴寶村所言，這是「動員學生」(mobilizing students)的年代，不是「學生運動」(student movements)的年代。³⁷²

³⁷² 此二字的英文用詞參考自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

尤其 1990 年代社會走向開放以後，政黨進入校園中招收學生，有些學生被動員替某候選人拉台造勢，甚至成爲與其他政黨進行鬥爭的工具。這種情況的發生非但顯示出學生喪失其主體性，對於學運的發展而言，更可說是不幸。

二、學生成員數佔總人數多寡的問題

雖然以學生人數作爲學運的判準確實有些不妥（例如第三章提到的德國白玫瑰事件，人數不過 10 人左右，卻造成相當大的震撼），但是學生在這場事件如果人數只是零星點綴，不能成爲氣候的話，實在無法稱之爲學生運動。甚至學生淪爲「丑角」配合演出的話，更是不能稱爲學生運動（例如保釣運動）。

以 1980 年代的反杜邦運動爲例，當地居民老早就投入反杜邦運動當中，學生則是在中途加入，甚至從頭到尾人數並未佔相當高的比率，離開鹿港完成報告書後，也沒有持續追蹤。因此在第五章談論此一事件時，楊渡認爲學生從頭到尾只是學習的角色，根本談不上是運動的主角。蕭新煌在分析 1980 年代新興的社會運動時，也將反杜邦運動歸類爲環保運動，一種「社會力」的展現，而不是稱爲學生運動。

但是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能不能被歸類爲學生運動」這項命題似乎不是如此重要。重要的是學生今天是站在批判社會的立場挺身而出，自有一套價值信念支持自己如此行動，而這樣的舉動是否能夠改變社會。如此一來，只有少數學生參與的情況之下（例如 1970 年代美麗島事件後學生投入反對政治運動行列），一般人認爲是「政治反對運動」而不是說成「學生運動」，似乎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三、學運所發揮改造學校、社會的影響力

學生運動是否能夠發揮改造學校、社會的影響力也是一個關鍵性的問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書封底。惟「動員學生」類似呂所指稱的「運動學生」，故也翻譯成「mobilizing students」。

題。有的事件「船過水無痕」，不但對於當時產生不了什麼影響，甚至有些還被後人當成笑話。例如 1970 年代的社會服務運動，不但沒有學生願意參與，還有人以為要去校外割草、或是遊山玩水，要不是國民黨強力運作這些以「逸樂」走向為主的救國團、服務隊，恐怕老早關門大吉。在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更是使人貽笑大方。

相反地，日治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就已開始發出異議之聲（例如蔣渭水與學生密謀毒殺袁世凱、日本皇室），直到國民黨時期的台灣大學醫學院仍是如此。這群知識份子塑造了台大「自由、民主、批判社會」的學風，使得近代台灣高等教育在追求「教自由」與「學自由」的同時，台灣大學的學風成為各校所仿效的對象。

四、學運訴求的解決之道與層次

此外學生運動的訴求以及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在學運中也是相當重要。例如 1970 年代，台灣正處於外交日益艱困之際，學生勇於站出來發聲固然良好，但是學生的解決之道竟然是跑去從事社會服務。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作法只能被當成笑話來看待罷了。

雖然現今社會日益開放、大學廣設，但是有些價值觀、認同偏頗，加上媒體商業利益考量，所形塑出的文化對於社會影響頗鉅。因此大學生在這樣環境之下，是否還能以追求「知識份子」風範作為目標，實在令人難以保證。尤其當訴求是針對某些特定團體或個人的「私利」時，更是要不得的。此外，目前學生所抗爭的議題顯得包羅萬象，例如：宿舍取消門禁、取消二一退學制度、甚至是早上上課時間延到 9 點開始等，這些訴求行動是否能夠歸類為學生運動。

這些訴求行動若是只從問題表面來分析的話，實在是太看輕了學生運動的內涵，例如近日有學生聯盟出面要求大專院校不要調高學費，但像這種問題並不是說學校要不要就能解決的，因為其中牽涉到太多關於學校運作所需

經費的問題，學生必須全盤考量並且提出解決之道，如此才有意義。若是學生能進而公開討論這項議題的正反面、找出問題的最根源解決之道，甚至擴

展到全國校園，成爲全國性的議題，更是提高學生運動所展現的層次。

此外對於學生運動訴求層次也用不著太過神聖化，不是說攸關國家安危的才稱爲學生運動，學生對於校園事務表達意見所表達的行動，都是學生運動的一環。學生今天不只追求廣博的知識而已，能夠關心並參與學校校務的運作，針對學校不公不義的事提出批判，這些都是學生運動的展現。

以上探討「學生應當具備主體性」、「學生成員數佔總人數多寡的問題」、「學運所發揮改造學校、社會的影響力」、「學運訴求的解決之道與層次」四個學生運動應具備的條件，係針對林玉体分析學運三種層次所作的補充。

參、與西方學生運動作比較

一般在探討到學運時，常常會想到國外校園中，學生大規模的暴動，砸毀教室、焚燒車輛。在講到學運的發展時，總會想到「學運名校」，加州柏克萊大學（UC-Berkeley）。中國則是五四運動、六四天安門事件。

從林玉体所著幾本關於西洋教育史的著作當中，均有相當篇幅在分析西方學運的發展，尤其是 1960 年代，全球爲了反越戰所引發的大規模學潮，成爲大家非常深刻的記憶。諷刺的是，與當時台灣仍處在「黨化教育」，每每「動員學生」相比較，台灣的大學生顯然是可悲多了。

也就因爲台灣的民主較國外來得晚，加上校園長期處於國民黨所控制之下，一般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台灣真的有學運嗎？」

當然如果今天硬是要跟國外來作比較的話，光從學運歷史、學運組織、動員規模、訴求議題、影響範圍來看，雖還不至於完全否認學運的存在，但是比起國外而言，台灣的學運恐怕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吧。

首先，這樣的比較實際上是不必要的，因爲學生運動最本質的問題應如

上述所言，乃是學運所訴求的議題、以及學運所造成的影響。不可否認的，學運在台灣近代的民主發展中，有其一定的貢獻，這在各個時期學運的發展中，即可見及。

其次，台灣的學運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第二節再作分析），而不適合完全套用西方學運理論解釋即可，這一點也是台灣學運的可貴之處。因此就這兩點來看，台灣是有學運存在的。

第二節 一部扣人心弦、風起雲湧的學運史

第一節探討過「台灣真的有學運嗎？」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之後，本節嘗試從「民族主義」、「左翼思想」、「社會力」三種史觀來論述台灣學運的發展，進而驗證台灣學運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³⁷³

壹、從「民族主義」、「左翼思想」、「社會力」三種史觀論述台灣學運的發展

所謂「民族主義」史觀，是指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學生運動背後所要彰顯的意涵，以及民族主義如何影響到學運的發展。

關於民族主義對於學運發展的影響，應該是從日治時期到保釣運動結束，

³⁷³ 台灣學運發展除了從這三種面向來分析之外，也可從「政治反對運動」面向進行探討。事實上台灣學運與政治反對運動的關連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從日治時期學生運動與政治運動合流（本質上均為抗日運動），到解嚴後學生運動與當時的在野黨（民進黨）關係藕斷絲連，其實可以看出學生運動在政治光譜上是站在一種「反對」的立場。因此後續研究

者可從這個面向針對台灣的學運再深入探討。

將近 50 年的時間。這可分成三部分：

一、關於日治時期民族主義對於學運的影響，在第二章已作說明。實際上肇因於日本人殖民統治台灣人，兩種民族：「日本人」、「台灣人」，之間的關係：「殖民統治」，在這種背景之下，所爆發的學生運動。

二、1950-70 這段期間的動員學生其實也是如此。國民黨政府巧妙的將「愛國」建立在一種「民族主義」之上，使得學生運動往往帶有愛國的色彩。例如 520 青年自覺運動，藉由狄仁華（外國人）的一篇文章，燃起學生的自覺，但是背後其實不正是隱藏一種民族優越感；至於獻機報國運動則是典型的愛國主義所使喚。

三、1970 年代的保釣運動，國民黨政府非常巧妙的將學生的不滿轉移到美方身上，致使學生民族主義更加強烈，一種「愛國心」油然而生。這件外交事件，國民黨政府難道完全沒有責任嗎？只見藉由民族主義的煽動，學生向美國大使館抗議、拒用美國貨等，轉移了整個問題焦點，也算是民族主義發揮到最淋漓盡致的一次了。

「左翼思想」史觀則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分析學生運動的發展，以及對學運的影響；二是從左派的觀點來看學運的發展，以及對學運的影響。

這裡指的是前者，可從三個部分來看：

一、日治時期的台灣學運受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影響，卻也因為如此，導致了民族抗日的勢力分裂，甚至是日本政府鎮壓左翼學生運動的發展。

二、1940 年代的台灣，學生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相當大，其實四六事件的發生多少也是因為政府要鎮壓左翼思想的學生有關。四六事件過後，台灣開始邁入戒嚴時期，左翼的聲音從此就消失了。

三、1970 年代左翼思想再度萌芽，這些人以《夏潮》雜誌為基地，開始擴展左翼思想。但是非常弔詭的是，這時左翼思想重心偏向政治論述，以「兩岸統一」為最高目標，跟當時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所倡言的台灣獨立完全不

一。前文已提到過陳芳明的看法，畢竟打著「左翼思想」招牌，然而卻是以「兩岸統一」作為論述主軸，其實是扭曲了左翼思想的核心。但是不諱言統派的《夏潮》以及獨派的《新潮流》，對於當時的學運仍有相當大的影響。

「社會力」史觀則是借用蕭新煌對於社會力的概念，尤其是指 1980 年代以來，一股發自民間的力量，挑戰黨國機制所形成的「社會運動」，其中當然包含「學生運動」。

雖然在第五章曾分析過，1980 年代雖然社會已逐漸開放，但是國民黨政府對於校園仍強力把持住，所以校園內的學生運動與外界的社會運動其實是不同步的。直到學生開始轉向與教授、社運團體合作，走出校園針對社會議題作出批判的同時，學運與社運作了結合，挑戰的不只是校園內、社會上的種種不公不義的現況而已，而是背後一個非常龐大的黨國體制。

這個潮流一直持續著，1990 年代亦是如此，終究指向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打倒國民黨」。於是社會力所推動的整個社會運動，幾乎是在和國民黨作對抗。2000 年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執政權，使得整個社會運動開始思考他們的下一步，當然學生運動應該如何繼續發展，也是當前一個非常極為迫切的問題。

從上述「民族主義」、「左翼思想」、「社會力」的角度初步分析台灣學生運動史的發展，可以得知其實這三者是交相混雜的，並非平行發展毫無交集，而且分析學運的發展也可再從其他層面，例如「愛國主義」、「國家認同」等來探討，筆者在這邊是嘗試從影響較為明顯的層面來分析學運發展脈絡的。如此一來，其實也可發現影響學運發展的因素是相當複雜的。

貳、下一步往哪走？台灣未來學運發展的幾種可能

「惡魔黨被打倒了，然後呢？」³⁷⁴這是在第五章引用何榮幸在敘述推倒

³⁷⁴ 何榮幸，《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2001），頁 96。

國民黨之後，學運份子心中出現的一句話。的確，從來沒有人會想過有一天會真的推倒國民黨，但是這一天就真的活生生的出現在大家面前。或許是大家還沒準備好，也或許只是單純想推倒國民黨，根本沒有什麼鴻圖大志。

正如楊憲宏在更早之前所言：

從壓抑的學生運動運動恐懼症時期，到沈迷在救國團帶動唱的逸樂氣氛，到走向社會服務，而覺醒社會服務的荒謬性。我的看法是，四年前，學生運動就已步步走向不能回頭的路。幾年來蓄積的能量，已到了不能不發散的時候。……

《自由之愛》出了書，《野火戰線》也出刊，都象徵著回顧、階段性的總整理。我相信「下一步呢？」是對他們最致命的問話。因為他們從來沒想到這麼快就必須思考這個問題。

我曾經想過，當民主進步黨成為一個「反對黨」時，「黨外」會不會成為一個歷史名詞？更明白一點的說法是，我們的社會有誰會是「永遠的黨外」？當那些政黨都變得愈來愈不值得期待時，我們會有「第三勢力」來批判他們嗎？³⁷⁵

在第五章曾引用翁士杰所言指出，並不能簡化成進入阿扁內閣，就是代表喪失左派精神；留在民間監督，就是延續左派精神。應該不是這樣的！誠如本章一開頭所講，知識份子在面對不公不義的情況時，應該要勇於站出來說話，而且是抱持一種左派精神替弱勢族群發聲，不能因為政治上的因素而有所區別。學生更是要勇於追求真理，有一套判準存在心中，誠如亞理斯多德所言：「吾愛吾師甚於一切，但吾愛真理尤勝於吾愛吾師。」³⁷⁶學生運動要能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至於未來學運的發展方向，有人認為學運應該去關心台灣的未來，包括兩岸關係、國家認同、甚至是國際事務；在第五章曾引用林玉体、韋政通的看法，認為應該先行致力大學校園的自由、開放，再去從事校園外的社會議

³⁷⁵ 楊憲宏，〈呼吸著充滿反叛與反省的空氣--我看台灣學生運動的過去與未來〉，《文星雜誌》，1987.7。收於林玉体編，《師生之吼：1987 台灣教育批判》（高雄：敦理，1988），頁 104-105。

³⁷⁶ 引自林玉体，《西洋教育史》（台北：文景，1980），頁 56。

題探討。這部分其實是不相衝突的，誠如在第一章所言，大學生面對不管校園內或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都應該挺身而出才是，如此才有資格稱之為知識份子。

第三節 研究者的省思：拿筆的人哪！

楊渡在 1991 年所寫的一本書《解體分裂的年代》，開頭的序即下了這麼個標題：〈拿筆的人哪！〉，文章前半段是這麼說：

1986 年春，彰化縣海濱線西鄉的海風如此狂烈，吹襲過鄉村曲折的道路。年輕人都已離鄉謀生的村子只剩下老人穿著黑厚的老毛料大衣在曬下午的陽光，瑟縮地抽著紙菸。這樣的小村竟是捲動起「反杜邦運動」的民間力量來源嗎？我行過街道時反覆地自問著。

「年輕人，你們拿筆的是能寫的。」一個老人坐在廟裡，呷著泡得無味的烏龍茶，在講完老人對故鄉的情感與反對毒物工廠來到家鄉後，語重心長的說：「上面的人聽不到我們的心聲，只有靠你們拿筆的幫我們講話。你也知道，我們是拿鋤頭的，有話說不出來，拿筆的人要幫拿鋤頭的講話啊！」

「阿伯……。」我無言地垂首，不知道能否擔得起這一生的重負。³⁷⁷

這段感人的話在我第一次讀到時，相當感動萬分。

從很久以前到現在，有些人對於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情挺身而出，使得現況因此改變。但是隔了一段時間之後，人們可能因為過了更好的生活，因而逐漸遺忘他的事蹟。

³⁷⁷ 楊渡，〈拿筆的人哪！--代序〉，《解體分裂的年代》（台北：三民，1991），頁 1。

我是在開始看了鄭南榕的一些故事之後，才發現台灣有人竟是如此「崇高」。至少，他讓我知道言論自由的可貴。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種桀驁的知識份子精神。

當我們在接受教育的同時，其實跟社會也開始產生隔離，念得越高時，越是如此。似乎大學教授與研究生跟這個社會是完全隔絕開來的，他們關在象牙塔裡顧自作自己的研究，小老百姓仍依舊過他們自己的生活。

然而這個社會是需要改變、要變得更進步的，但是卻必須要靠這些教授、大學生來轉動，來告訴小老百姓要如何轉動這個社會。其實這不就是身為一位知識份子的責任嗎？

就像大學生面對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更是應該要挺身而出，不管是校園內、或是社會上，這是一位知識份子所應有的行爲。他們所形成的一股力量，集結成爲「學生運動」，也將會是改造社會最重要的動力之一。

在文獻閱讀的當中，看到學運呈現出令人非常溫馨的一面、也看到令人非常動容的一面、令人尊敬的一面，卻同時也有一些令人感到不齒的一面，但這都是屬於過去學生運動的一段故事，我努力地嘗試盡可能把這段故事書寫下來。

最重要的是，在我們身為學生的同時，自己反省了什麼、到底做了什麼，將來的歷史又會如何看待我們？這是在完成這篇「台灣學生運動史」的同時，亟欲思索的一個課題。